爱知大学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中文题目）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评价及制度因素分析

（英文题目）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作 者 姓 名： 陈慧慧

指 导 老 师： 高桥五郎 教授

提 交 日 期： 2013 年 8 月 1 日

目录

图目录

表目录

第 1 章 引 言

1.1 研究背景、意义及目的

1.1.1 研究背景

从 1978 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 30 多个春夏秋冬，在改革的道路上，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极大提升，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地位举世瞩目，中国的迅速和平崛起使中国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场伟大的变革贯穿了中国发展的始终，而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同时也是十分错综复杂和异常艰难的。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情与其他国家相比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改革成功的国家的经验对中国来说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的改革必须沿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不断试错，在摸索着前进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曲折式的前进；另一方面，改革是在正式制度安排下以渐进式路径不断前行的，中国要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中国的制度安排与选择也必须是符合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否则就无特色可言。国企改革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要体现出中国特色，这就需要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与选择来保障国企改革目标的成功实现。国企改革中作为重要因素的“制度”也是在摸索的过程中被不断调整和安排的，因此改革的成效也是在曲折中逐渐提高的。正确的制度安排与选择能够使得企业治理结构、产业结构调整、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分布等更趋于合理化和高效化。中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是整合社会和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资源，因此，国企改革对中国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它不仅是整个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转型的缩影和最直接体现，不仅直接涉及到中国千家万

户的切身利益，更把握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能否做出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有企业发展需要的制度安排和选择在国企改革中是十分关键的。

1.1.2 研究意义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其对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贡献，功不可没。因此政府和各界人士对国有企业的更进一步持续高效的发展赋予很大的希望，这不仅体现在国家积极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促进国有企业的良性发展上，而且表现在社会各界尤其是对国有企业命运极度关注和关心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者们积极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效做出分析研究并给予可行的政策建议。正是藉于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才使得对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的研究成为必要，其改革的成功和失败才会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它的改革之路已经走了 30 多年，回顾其改革历程及制度变迁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78 年至 1993 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调整时期。这个时期的改革，是在中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过渡，以国营企业为主体，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改革。1993 年至 2003 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创新时期。伴随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个时期的改革，是探索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为主体，以企业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从 2003 开始，是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制度完善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已经确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初步形成，现代企业制度初步建立，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以中央企业和大企业为主体，以发展混合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每个阶段在改革过程中虽然都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将通过国企治理结构的演变、改革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变化等方面来对国企改革的成效进行总结和概括，在肯定改革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对影响国企改革进一步发展的因素进行探析，指出国企改革的关键是要寻求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提出深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针对现阶段的中国国情，综合考虑中国传统观念、习俗、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因素，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对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

文综合应用制度经济学、规制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经济社会学、数量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国有企业改革制度下治理结构、产业结构、生产率变动等方面的发展要求，指出如何对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制度进行安排与选择。这一方面在理论上可以完善和拓展对国企改革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使其内容更加丰富，理论基础更加坚实可信；另一方面，在实际中可以以理论指导实践，促进中国国有企业的总体效率不断向稳定、可持续、高效、绿色的方向发展。以利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1.1.3 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评价及制度因素，是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一向备受争议、褒贬交加，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并没有取得突出的成效，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也有的人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适应中国国情、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本文的目的是在已有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在国有企业分布、生产率变动、治理结构及产业结构的转变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有利于顺应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和考察，通过考察结果来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历史性的评价，并针对这些分析结果最终提出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有利于市场经济更加完善的、符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的一套制度安排与选择。

1.2 研究方法与范围界定

1.2.1 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其作用有：能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帮助确定研究课题；能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印象，有助于观察和访问；能得到现实资料的比较资料；有助于了解事物的全貌。国有企业改

革具有历史动态性，因而是常说常新的话题，经济学家对它的讨论和研究也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和广泛，因此这方面的文献一直没有间断，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现实资料，这对于本文研究的开展具有极大的价值和帮助，因此本文在研究开展之前就通过文献研究方法总结和提炼与本研究相关的资料和观点，这些已有的理论和观点对本文分析国企制度安排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也帮助本文作者在短时间内详细全面的对国企改革相关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有助于作者在已有观点的基础上能够有所创新，研究思路也更加清晰。

二、数量研究法

数量研究法也称“统计分析法”，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规模、速度、范围、程度等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认识和揭示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借以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解释和预测的一种研究方法。本文在分析国有企业分布、产业集中度以及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时要按企业规模大小进行测量，还要衡量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程度以考察国企改革的效率，从分布情况、集中度大小、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程度等方面的变化来总结国企改革的发展趋势，从而揭示出国企改革与这些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以上几个因素的优化和提高出发，试图做出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

三、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又称对比分析法，它是按照特定的指标体系将客观事物加以比较，以帮助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对事物做出正确的评价。它通常是从数量上展示和说明研究对象规模的大小，水平的高低，速度的快慢，以及各种关系是否协调。国企改革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改革中产业集中度、分布情况、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生产率的变化都是通过对不同的发展阶段中的指标进行对比来体现的，从而才能反映出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四、描述性研究法

描述性研究方法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在科学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它将已有的现象、规律和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验证，给予叙述并解释出来。它是对各种理论的一般叙述，更多的是解释别人的论证，有对实际问题的说明；也有对某些现状的看法等。国有企业改革相关问题的研究一直备受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蕴含着大量的、相对成熟的理论和观点，在本研究开

展之前首先要对已有的相关理论和观点进行描述和分析，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开展新的研究。

五、实证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是认识客观现象，向人们提供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的知识研究方法，基本上实证研究方法是通过对案例进行调查来探究事物的本事，其重点是研究现象本身“是什么”的问题。实证研究法试图超越或排斥价值判断，只揭示客观现象的内在构成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普遍联系，归纳概括现象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本文在对国有企业生产率进行测算时首先根据研究需要搜集相关数据，然后运用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将生产率指标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效率改进和规模效率等构成部分，通过对各部分的单独考察来说明各个部分对生产率变动的贡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试图探寻生产率变动的内在规律。

1.2.2 研究范围

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寻找一种适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安排，在做出制度选择之前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加以回顾并进行总结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文的研究是希望对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出现的问题、改革实施的现状、改革的成效、现存的问题及如何解决等方面的探讨，而对这些内容的探讨必须聚焦到现实的经济指标上，又由于国企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有些问题并不能用真实指标体现出来，如改革对企业和人们意识形态和观念的影响等方面的考察没有具体的量化方式，因此侧重通过一些可量化的指标来考察，本文选取国有企业改革之后的分布情况、治理结构的转变、产业结构的优化、生产率的变动等相关指标对以上几个方面进行说明，以从现实数据中事实性的呈现国企改革在各个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通过对以上经济指标的衡量和测算可以更进一步地窥探出国企改革的制约因素和深层次的内在问题，并从制度层面挖掘引导国企改革发展方向的根本性因素，企图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弥补现存的不足，并通过制度的方式解决那些根深蒂固的“劣因”。因此本文要寻求的是一种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基本规律、满足今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中国造就一个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济形势共存的经济体，建立一个各种所有制、各种经济成分和经济形势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并能够进行相互良性竞争的社会主义竞争体系和竞争环境的制度安

排。

1.3 论文的创新之处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要求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特别是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改革，在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合理化过程中，需要把中国经济的市场结构进一步优化。也就是说，中国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中一方面要继续支持中国经济稳定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还需要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过程中，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活力的竞争性市场体系，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为建立和谐社会做出贡献。而中国经济所面临这样的一个任务是前无古人的、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走出一条治理和规制国有企业发展的新路子。针对这一思想本文提出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体现为：

其一，关于国有企业存在的基本原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与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相联系的。市场经济对资源的基本配置原则是必须坚守的。而国有企业存在的基本原因应当、也只能是由于市场经济存在的市场失灵。国有企业的存在的主要作用就是弥补市场失灵；但是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在中国目前面临的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有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又不能仅仅限于弥补市场失灵。中国国有企业还面临与发达国家的垄断和寡头垄断巨型跨国公司竞争的任务。

其二，本文论证中国产业结构目前存在低级化、分散化，总体一体化程度偏低，经济规模偏小，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环境等问题。本文提出，应当调结构，升级产业的过程中，促进对中国的市场结构的合理化和调整的过程。历史上发达国家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了今天以垄断和寡头垄断为特点的市场结构，中国也急需推进中国的这两个合理化进程。

其三，过去的政府在两个结构和两个合理化的调整进程中，存在重生产数量和经济规模，轻产品质量和升级换代；重产业政策，轻市场政策和政府规制政策的问题，总是强调国有企业保值增值任务，实际上把国有企业当成一般的

竞争性企业来看待，没有发挥国有企业在弥补市场失灵，调整产业政策，创造良好竞争环境中的作用。

其四，目前的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治理结构还不适应新时期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任务、不适应进行两个合理化和两个调整的要求，还必须从产权-宪政-意识形态的三维度进行治理结构的改革和调整。包括国有企业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调整（国企整体上市等）问题，国企分配制度的调整（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应如何认识，上交的比例等），国有垄断企业薪酬制度的改革等。

1.4 逻辑框架与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阐述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和经济背景，在此基础上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相关问题的理论观点，为研究的开展做好铺垫。其次是对国有企业改革整个历程的回顾，回顾的同时对历经 30 多年改革的国有企业在企业分布、治理结构、规制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生产率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进行考察和总结，依据考察结果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进行评价和讨论，评价和讨论的过程中提出制度因素的根本性作用，并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的制度安排和选择进行探析。本文的逻辑框架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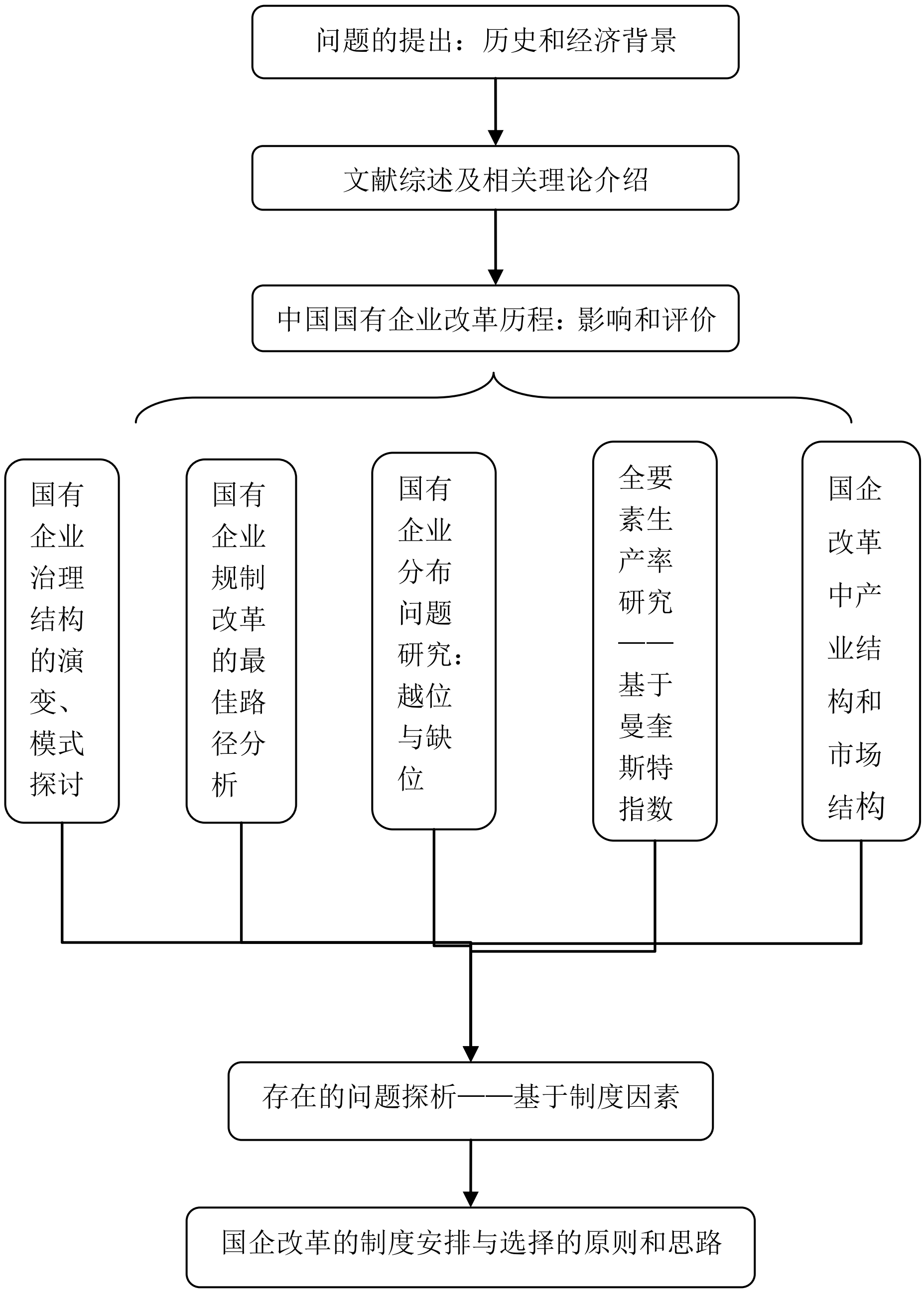
问题的提出：历史和经济背景
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介绍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影响和评价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变、模式探讨
国有企业规制改革的最佳路径分析
国有企业分布问题研究：越位与缺位
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曼奎斯特指数
国企改革中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
存在的问题探析——基于制度因素
国企改革的制度安排与选择的原则和思路

图 1-1 逻辑框架图

第二章 文献综述

国有企业是一个在现代世界各国都或多或少存在的经济现象。从 1978 年以来，中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大致经历了“放权让利”、“两权分离”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绩效的比较

国际上和国内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经济绩效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由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从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一方面，很多研究证明私有公司较国有企业更有效率（boardman and vining，1989；ehrlich，gallais-hamonno，liu and lutter，1994；dewenter and malatesta，2001）。然而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认为产品市场的竞争性较所有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效果，在竞争性条件下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绩效没有显著差别（caves and christiansen，1980；yarrow，1986；kole and mulherin，1997）。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的民营化举措都获得了积极的效果（megginson, nash and van randenborgh,1994; la porta and lopez-de-silanes,1999;frydman, 1999; megginson and netter,2001; djankov and murrell,2002; shirley and walsh,2000）。还有一些学者对转型经济体中的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一般的结论认为民营化是有效的，民营公司几乎总会变得更有效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在改革早期政府通过放权让利来提高国有企业的收益和效率，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逐步展开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国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主要是从所有制及其结构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入手来分析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部分学者使用上市公司的数据

来研究所有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许小年（1997）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国有控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绩效越差；法人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绩效越好；个人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基本无关。孙永祥（2001）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绩效进行比较，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指标均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徐晓东和陈小悦（2003）比较了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和其他股东等三类公司在公司治理、企业业绩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东的公司有着更高的企业价值和更强的盈利能力。也有一些学者运用超出于上市公司的数据来研究所有制结构改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姚洋（1998）利用第三次普查的企业资料，就非国有经济成分对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内部和外部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刘小玄（2000）以 1995 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为基础，对竞争性行业的企业进行了效率测定和比较，结果发现私营个体企业、三资企业和股份集体企业等的效率普遍高于国有企业。刘小玄和李利英（2005）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 2000 年的企业调查数据来分析国有企业改制的绩效，结果表明，产权变革取得了推动生产率提高的积极效果。胡一帆等（2006）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是否有效的问题，通过对国企民营化进程的考察来进行分析，经验研究发现绩效较好的国有企业优先被民营化；中国的民营化是富有成效的，尤其是提高了销售收入，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并最终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和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而且在获得这些收益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失业问题；由民营机构控股、彻底民营化的企业比那些仍然是国有控股、部分民营化的企业绩效表现更好。白重恩等（2006）通过对 1998 至 2003 年间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来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效果，考察了改制对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影响。结果发现，改制后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但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成本；国有控股改制社会效益较好，而非国有控股改制经济效益较好；改制效果在一定期间内持续。郝大明（2006）利用 2001 年山东省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工业企业数据资料对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效率变化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是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后的效率都有较为明显的提高，但不同经济类型公司的效率差异很大，认为提高国企改制效率的关键在于把国有企业改造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根本途径在于降低国家资本的比重。

2.2 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的问题。从早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学者经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 1978 年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并没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rawski，1986；lardy，1989；邹至庄，1984）。而中国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国外学者的结论不同。史清琪等人（1986）认为中国工业的资本产出弹性大约在 0.2~0.3 之间，只有当资本装备率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的 3~5 倍时，技术进步速度才可能是负的，而实际上资本装备率的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并没有这么大，因此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显然是正的。陈时中和桑赓陶（1986）用另一种方法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的估算结果表明，1976~1982 这六年间，中国工业的 tfp 水平平均每年提高 2.23%，在产出的增长中由 tfp 上升所提供的部分占 23.8%，之后众多的研究结果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文献认为改革之后国有企业的 tfp 增长率很高（chen et al.，1988；jefferson et al.，1992；groves et al.，1995）；第二类研究文献并没有发现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woo et al.，1994）；第三类研究的结果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先是上升，然后从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又下降了（perkins et al.，1993；wu andwu，1994；jefferson et al.，1996）。陈宽、谢千里、罗斯基等（1988）认为在早期的研究中，国有企业的 tfp 增长率的估算方法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对 1953-1985 年间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变动趋势的进行研究后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 tfp 确有增长，其差别只在于增长得快还是慢而已。中国国有企业的 tfp 增长率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停滞（缓慢增长）之后，改革以来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此之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国有企业 tfp 的增长速度还是不错的（dollar，1990; groves et al.，1994；wan，1995；郭克莎，1993）。

谢千里等与胡永泰等对这一问题存在进一步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两个相关的问题：在研究中所使用的产出和投入平减指数的可靠性，以及中国的国有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与其他国家的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的差异程度。谢千里等人（jefferson et al.，1992）选取 1984 和 1987 两个年份 293 个样本企业

的横截面数据，在对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产出、效率和趋同的研究中再一次证实了国有企业的 tfp 在改革后有了显著的提高。而胡永泰等人（woo et al.，1994）认为谢千里等人的增加值平减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之间的相反运动是反常的，与国际经验不符，所得到的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论是源于对增加值的高估。之后谢千里等人（jefferson et al.，1996）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他们把增加值平减指数的下降归因于中国制造部门特殊的生产结构。虽然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争论还将继续，但是对于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落后于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这一结论则得到了广大的认同。

日本学者大冢启二郎等人（2000）利用中国官方出版的统计数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对在 1978-1995 年中国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又做了一次估计。根据他们认为改革对国有企业的效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改革对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白重恩等人（bai et al.，1997）认为，用 tfp 的增长率作为衡量改革中的国有企业绩效的“底线”这一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他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表明当企业由于某种原因并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时，较高的生产率反而有可能事实上导致更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利润以及经济效率的恶化。因此，对于改革期间的国有企业绩效而言，单纯观察 tfp 的结果有可能产生误导的信息。

不同学者使用了各种不同的计量或非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得到的估算结果之间的差异也较大。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 tfp 在大多数年份里都确有增长，特别是在改革之后，转轨国有企业的 tfp 增长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与国有企业相比，中国的非国有企业的 tfp 增长率水平似乎更高一些。

2.3 产权与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市场取向的。企业作为真正市场主体，其基本条件或资格就是企业产权的独立。因此一部分学者围绕产权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关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内容，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归结为产权问题或所有制问题。董辅礽(1992)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

关键是产权制度改革，回避财产关系的重构是不能从根本上创造出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条件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迟迟解决不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问题，根本原因是国有企业中财产关系的模糊性，财产处于没有人负责的状态。要把国有企业真正推入市场就需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他认为，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决不只是而且主要不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体制因素决定的,首先是与国有资产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有关，因此产权制度改革是关键。王珏(1996)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产权问题。他指出，有人认为国有经济改革问题是市场问题或计划与市场问题，有人认为是企业内管理问题，有人认为是政府职能转变问题，而更多的人认为是产权问题，他持后一种看法。吴敬琏(1998)也认为，国有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不仅源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的缺陷和政企职能不分的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机制僵化。另外，还源于国有经济战线太长和布局太散。由于后者的制约，单从企业微观层面入手进行企业改革，很难取得突破。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的症结是有限的国有资本难以支撑过于庞大的国有经济盘子。为了使改革取得整体性突破，改变国有经济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必须对它进行战略性改组，同时相应地在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李和吴（li and wu，2001）利用 1980 至 1994 年间 680 家中国国有企业的数据，检验了产权改革和管理改革的相对有效性。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7)在他们合著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一书中认为，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来说，产权问题无关紧要。林毅夫等人认为，没有充分竞争的市场，产权是难以界定的，比公司内部法人治理结构更重要的是公司外部的治理结构，即通过竞争市场所实现的间接控制。假若没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能形成企业外部治理的条件，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也无助于企业效率的改进。解除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清除预算软约束的借口，建立公平、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创造评价企业经营所必须的充分信息，是作出任何产权安排和形成适宜的治理结构的前提条件。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在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预算软约束源于国家强加的各种政策性负担。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消除政策性负担、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市场竞争能提供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并使经理人员行为与国家激励相容。芮明杰(2002)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进行了分析研究，在对“产权改革中心”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市场机制优先”路径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复杂

的工程，产权改革不能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所有制问题并不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根本所在。同样市场竞争也不能将国有企业改革顺利实施到底。在经营者就是所有者的私营企业中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但企业仍有破产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说，信息充分并不能保证企业的经营绩效，对于破产的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又从何谈起。并指出，除了产权改革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外，管理创新对于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曾庆生、陈信元（2006）选择 1999-2002 年健康运营是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雇员角度研究了控股股东的所有制性质对上市公司社会性负担的影响。经验研究表明，国家控股公司比非国家控股公司雇佣了更多的员工，并且国家控股公司的超额雇员主要源自上市初的历史遗留冗员；超额雇员和高工资率共同导致国家控股公司承担了比非国家控股公司更高的劳动力成本。因此，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和避免国家直接控股对国有企业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2.4 国有企业改革的评价

在如何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理论界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三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已有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措施是可行的，因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改革遇到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发展中的困难，只有坚持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克服这些困难。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背离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政治意识形态，其理由是，非国有经济成分力量过大，国有经济的力量被削弱。因此应放弃改革，回到 20 多年前的状态中去。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不成功的改革，中国改革目前之所以遇到困难，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是“跛足”改革，即“夹生饭”式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改革目标的不确定性。长期以来探索式的改革带有浓厚的“试错”性质，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使我们丧失了建立市场主体的条件，故而困难重重；改革过程和手段出现偏差。近 30 年的改革其实质是政府主导型改革，政府的权利之手介入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权利与金钱交换，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腐败泛滥；改革方略上，单纯以追求经济发展为最高导向，忽视了社会理念的约束力和引导，结果导致了道德沦丧，而未

形成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所必需的道德支持；在改革路径的选择上，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方式的选择上，避开了产权改革这个关键性问题，采取了绕道方式，避重就轻。而绕开走的改革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带来更大的困难。

显然，上述第二种观点是不可取的，改革不能走回头路，中国不可能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第一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则对改革中所遇问题的形成原因在认识上存在严重分歧。第一种观点将改革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视改革为未到位、未深化的结果；第三种观点却将这些问题归结为改革本身的失误。

国有企业民营化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这一改革的意义主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民营化的活力在于明晰了产权，强调"一股就活"（刘小玄，2003）。然而这种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产权清晰的企业，仍然会在竞争中失败。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中，还存在股份化以后反而死掉的现象。第二种观点认为民营化的活力在于调动了员工积极性，强调"股权激励"的作用（徐明华，2002）。但是这种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员工持股的企业会在竞争中失败。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曾经盛极一时的股份合作企业，为什么基本上没有能在这一制度下持续发展和做大做强的样本。第三观点认为民营化的活力在于解决了市场竞争的约束条件，强调"硬预算约束"（斯科特•沃尔斯顿，2003）。但是这种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资源条件不错的企业，即使股份化了，进入了市场竞争的领域，仍然缺乏经济效率。

第三章 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演变

所谓国有企业是执行政府指令的生产单位，是建国初期特殊时代背景的产物，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运行重要因素，不具备现代企业的种种特征。国有企业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展示出了一定的优越性，但伴随经济的发展，其弊端不断显现。为解决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的问题，中央政府从未停止过对国有企业进行治理的尝试。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行政治理到现代企业治理理论的运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推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通过对企业治理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回顾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的治理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 年改革开放以前的行政治理阶段；1978 年至 1993 年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与两权分离的阶段；1993 年以后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和公司化改制的阶段。从总体上来看，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的演变是一条鲜明的主线。传统的行政型治理模式以“资源配置行政化、企业目标行政化、高管任免行政化”为主要特征，导致了“内部治理的外部化、外部治理的内部化”现象(1)。随着治理形式向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中国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市场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不断加深，企业的治理结构不断得到了优化，治理质量逐年提高。下面就对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变过程进行理论视角的深入分析。

所谓治理结构,就是指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责、权、利关系的一整套制度安排(2)。这些制度安排的创立、变更以及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过程即为治理结构的变迁。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 Shleifer 和 Vishny 进一步把公司治理定义为"是要研究如何保证公司的出资人可以获得他们投资所带来的收益，研究出资人怎样可以使经理将资本收益的一部分作为红利返还给他们，研究怎样可以保

(1) 李维安、武立东：《公司治理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2 页。

(2) ［美］迈克尔·詹森著，《企业理论：治理、剩余索取权和组织形式》，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 月第 1 版，第 3 页。

证经理不吞掉他们所提供的资金、不将资金投资于坏项目[3]。吴敬琏更进一步将公司治理结构具体化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4]。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的定义是："公司治理就是限制针对事后产生的准租金分配的种种约束方式的总和，包括：所有权的配置、企业的资本结构、对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公司接管，董事会制度，来自机构投资者的压力，产品市场的竞争，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组织结构等等"[5]。由上述定义我们可知：公司治理结构的涵义是有不同层次和范围的。从狭义上来看，公司治理结构就是研究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的激励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其主要着眼点在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这一层次上的"公司治理结构"以 Shleifer 、Vishny 和吴敬琏对其概念的阐述为代表。相应的，就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言，正如威廉姆森等所提出的那样，它不仅仅限于对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的研究，而且包括对关于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分析。

3.1 行政型治理特点及其弊端

始于 1956 年的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只是执行政府指令的基本生产单位，与现代化的企业有很大的区别。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上呈现出不同的治理结构，具有不同的阶段性、区域性特点，

---

(3) "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 (with R. Vishn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86.

(4) 吴敬琏，《吴敬琏经济文选》，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 年版。

(5)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M] pp11, 1985,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都与集体主义思想、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适应，属于典型的行政型治理。其最大特点就是两权不分、政企不分,从而导致企业治理中的资源配置行政化、经营目的行政化与经营者人事行政化[6]。这种行政型治理的主要特点包括：

首先，中国国有企业行政型治理结构的特点体现在政府与企业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上。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是国有企业的股东，拥有对企业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及产品销售的绝对控制权，同时对企业管理人员拥有绝对的任免权。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命令关系，呈现出高度的政治化特点,党和政府实际上成了国有企业治理的最高权力主体,拥有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委托代理关系。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行政隶属和控制关系，虽然有利于中央政府对企业政治控制，满足了建国初期稳定经济的迫切需要，但是失去了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参与经济活动的条件。政府作为委托人行使了本应有代理人（企业的厂长、经理）行使的经营权、决策权等所有权衍生出的种种权力，这势必造成作为代理人的厂长、经理缺乏积极经营企业的动力和约束，仅仅靠道德约束和宣传教育等软约束根本不能杜绝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长期的行政隶属关系导致企业功能行政化，变成了政府机构的延伸。比如：国有企业干部与职工的职位、工资行政化分级，个人升迁由政府控制，与政府公务人员没有区别[7]；国有企业的机构编制行政化，不同的职位不同行政级别，例如部级的中央国企领导、厅级的省国企领导等等；从国有企业履行的职能来看并不是简单的经济责任，还承担住房、医疗、上学、退休等社会保障任务，企业成了一个大而全的小型社会，未实现职能的分工与优化。

第二，从企业的产权制度安排上来看，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丧失了剩余控制权（the 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和剩余索取权[8][9]，完全的受制于政府。剩

---

[6] 李维安、武立东：《公司治理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94 页。

[7] 这种现象在当前仍然广泛存在，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领导任免由国资委决定，即使实现了形式上的合同制，但政府在其中起到相当大的主导作用。

[8]剩余控制权就是对纯利润的控制权,如使用,支配,处置等权能。

余控制权由产权理论的代表人物哈特（Hart）提出，并指出在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剩余控制权才是理解企业的关键，如何分配剩余控制权至关重要，哈特坚信剩余控制权天然的来自于物质资产所有者[10]。

国有企业对剩余控制权的丧失造成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必须按照政府下达的指令计划执行，包括生产、销售、扩大经营等等。企业运营所需的资金、人员与物资完全靠国家统一审批、统一划拨，企业与政府是一种要、等、靠的畸形关系，企业发展极度被动，而且传统国有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时任政府官员的个人偏好，或者是通过企业领导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来获得优先的发展条件。

从剩余索取权来看，国有企业中的工作人员没有对利润的分配权。企业利润与物资的发放按照国家的统一标准，在同一层次人群中实施平均主义。国有的这这种剩余分配模式一方面在当时体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也是当时物资紧缺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该模式也降低了企业员工的生活和福利水平，对企业管理者也缺乏激励。

第三，中国传统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是横向的、以市场交易为中介的资本委托代理关系,而是纵向的、以政治程序和行政层级为中介的财产委托代理关系[11]。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和威廉姆·麦克林（William Meckling）认为在大部分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和代理人要发生正的（货币的和非货币的）监督和保证成本，并且，在所有的代理关系中，代理人的决策和那些最大化委托人福利的决策之间存在着某些偏差[12][13]。根据詹森和麦克林的分析可知，由于理性的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即使在市场经济当中，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也要耗费大量的监督、激励和保证成本，而对于计划经济环境下的国有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来说，代理问题更是广泛存在，而且政府对企业的

[9]剩余索取权是对企业税后净利的终级所有权和分配权。

[10] O. Hart, Firm, Contract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3.

[11]张克难:《产权、治理结构与企业效率: 国有企业低效率探源》,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3 页。

[12]设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最优监督活动和保证活动一致。

[13] Michael Jensen and William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1976,pp.307.

监督缺失是硬性的制度性的，对企业的约束完全靠软弱无力的意识形态的感化和教育。激励与监督机制的双重缺位势必造成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与企业员工缺乏活力与动力，企业经济效益低下。

最后，传统国有的内部治理机制虚化外部市场治理缺乏。传统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表现为党委会、厂长和职工代表大会之间的制衡机制。这种制衡机制在党委一元化的领导下有名无实。内部治理关系成为一种一元化的行政治理关系，而非契约关系。即党委会一元化治理。首先由党委会确定厂长和工会主席候选人，再由职工代表大会完成相应的程序。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厂长经理人员任命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厂长和工会主席只对党委会负责，制衡机制虚化[14]。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国有企业缺乏外部市场治理：一是缺乏资本市场对企业的激励约束。传统国有企业所需资金全部来自政府，企业的并购和发展完全是政府行为，企业无需通过市场进行融资，不存在资本市场对企业行为的激励和约束。二是缺乏产品市场的激励和约束。由于传统国有企业产品的产、供、销完全按照政府指令进行，商品的畅销与直销及其结果全部由政府承担，企业无需面对市场，只需面对政府。三是缺乏经理人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传统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来自政府的人事任免与调动。企业只拥有人员的使用权，评价权归政府，这种责任与权利的脱节导致企业的管理者不是把企业经营管理好，争取好的经济效益，而是千方百计地与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搞好关系，争取职位的升迁与调动。管理层没有来自经理人才市场的竞争威胁，只有政府机关的人事任免考虑。

改革开放以前的行政治理结构导致了中国传统国有企业的效率极其低下，但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改革都仅仅限于行政性的放权和收权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行政机构增减的循环往复之中，只是量变，而不是质变，未触及行政型治理的深层次问题，未形成科学合理的企业治理机制与结构，反而造成了“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死”循环困境。这一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得到改善。

[14] 郭金林，论我国国有企业从行政型治理到产权契约治理的模式变迁，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3.2 经济型治理的演变过程分析

行政型治理与经济型治理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以上对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型治理进行了基于企业治理理论的分析，下面对经济型治理的演变过程展开进一步探讨。经济型治理的演变根据向市场机制转变的程度不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承包责任制下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这是企业市场化较低的阶段，处于试探性的改革阶段；二是股份制及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这是市场化较高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更具有市场化特征。

3.2.1 承包责任制下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契约式治理）

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实行行政型治理，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计划统一下达，资金统贷统还，物资统一调配，产品统收统销，就业统包统揽，盈亏都由国家负责，国有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提出，要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15]。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向，先后在国有企业推进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利润递增包干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点，调整了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强了企业活力，为企业进入市场奠定了初步基础。

到 1988 年底，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有 93％实行了承包制， 其中大中型企业达到 95％。虽然承包制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但比较起来，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通过承包合同来规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尽管政府通过干部管理条例仍对企业保持着人事控制，但实际上治理企业的主要手段已转移到承包合同上。契约关系的引入的确对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有实质性的影响。实行承包制的企业在初期也都有效率递增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改革初期市场化的巨大成就之一是把政企一家的行政领导体制转轨为政企分离的契约式治理结构。

[15] http://news.xinhuanet.com

所谓“契约”，俗称合同和合约，指当事人之间关于权利和义务的承诺[16]。但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契约范围更广，泛指所有具有实际利益的关系。例如，虽然甲乙双方并没有明确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文本，但是经济学仍然可以把他们之间的交易或者生产活动称之为一种契约。具体来讲，契约可以根据不同维度分为显性的（explicit）和隐性的（implicit）、短期的（short-term）和长期的（long-term）、完全的（complete）和不完全（incomplete）的等类型[17]。其中关于完全契约理论的研究最为完备。完全契约理论把参与博弈的各方当事人放在一个委托－代理框架下处理，把所有的交易关系和生产关系抽象为一种契约关系。

在完全契约理论的假设前提中，在当事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完全理性的委托人总是可以设计一个最佳契约，该契约充分考虑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或然状态（contingencies），并且能够无成本地被第三方强制执行。因此，完全契约理论通常认为产权结构和权威是不重要的，因为通过契约安排总可以实现最佳效果。但是在阿罗－德布鲁意义上的契约不是通常的完全契约，因为它是信息对称的，不存在激励问题。此外，完全契约理论还假设契约内容都可证实，契约目标是在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的同时，最大化委托人的利益。然而现实复杂的经济环境和人类行为的易变性决定了完全契约理论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能力有限，而且基于该理论的企业治理机制也不能很好的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相反，完全契约前提下的企业治理非常容易导致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18][19]。阿克洛夫（Akerlof，1970）最早以一个二手车的“柠檬市场”为例[20]，提出了逆向选择模型。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基于完全契约理论，所以必定会出

[16] 杨瑞龙，《企业理论：现代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一版，第 41 页。

[17] 聂辉华，交易费用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管理世界，2004 年第 12 期。

[18] 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是指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价格下降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而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

[19]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并不等同于道德败坏。道德风险是 80 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哲学范畴的概念，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

[20] 柠檬（lemon）是一个俚语，意即次品。

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后果，具体表现为真正优秀的具有管理素质的人才不能进入国有企业担任领导和担任领导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反而最大化自身效用。

综合来分析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治理效果，承包制企业从时间序列上看并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效率。经过短暂的经济增长后，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亏损额呈递增趋势。究其具体原因，是单一契约治理结构内生的缺陷所造成的。首先，在一对一的谈判过程中，承包方可能利用信息优势操纵谈判过程，从而使承包合同的条款不能反映真实的生产能力和市场潜力，造成契约失真。其次，政府主管部门的“廉价投票权”难题没有改变，加剧了承包合同失真的可能性(21)。主管部门还可能无视承包合同的约束力，随意干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作为唯一监督者的主管部门既无监督动力，又无监督能力。个人决策与集体负责的结合，不仅浪费了债权人、工人等信息资源，而且导致企业内部制衡机制弱化和经营者不负责任的现象。可见，承包合同并不能真正有效地配置决策权及选拔经营者。

3.2.2 股份制及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

中国政府在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基于完全契约的企业治理结构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于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试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发展出多种股份制的具体形式。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此，中国的意识形态转型有了明确的目标，一个连贯的向市场体制转变的战略开始出现(22)。随后在 1993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造。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同年 12 月，中国颁布了《公司法》,这就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也为被市场经济国家广泛认可的公司治理奠定了法律基础。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目标的确立与《公司法》

(21) 阮婷婷，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经验及其启示，求实，2009 年第 2 期。

(22) 斯道延・坦尼夫、张春霖、路・白瑞福特：《中国的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 页。

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开始了对经济型治理结构的探索。截止到 1998 年底，全国以国有企业为主改建或新建的股份公司已达 9200 家,公司制度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形式日益被大家所接受。从实际情况看，公司化后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率明显改观。

与承包责任制相比，股份制的明显优势在于：（1）政府与企业的谈判关系由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市场和法律关系，公司法人财产权的确立使公司可以作为一个人格化的永续实体运行下去,政府作为国有资本的代表可行使“用手投票”权和“用脚投票”权；（2）企业内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四大权力机关分工协作，相互制衡，责权利明确。一个初步的经济型治理框架已经形成，它包括外部治理机制与内部治理结构两个部分。其中，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法制基础等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治理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外在压力，并为良好的企业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法制基础。在企业治理内部结构中，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由内部董事与独立董事共同组成，他们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并对股东会负责；监事会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有权对公司董事会与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督。

虽然中国国有企业实行了股份制改造并形成了比较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但是从中国股份制改革的试点来看，公司制度化改造发生了变形，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治理结构：行政干预下的经营者主导型治理结构。这种混生的治理结构不仅保留了完全契约下政府干预、经营者缺乏激励与约束等缺陷，而且伴生了许多新的治理问题：董事与经理角色混同、监事会职能弱化等等，政府派出的董事与监事根本无法胜任决策和监督职能，形同虚设。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内外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步伐的不一致[23]。当企业的外部治理机制已从计划转向市场之后，内部治理结构却还基本没变，这使国有企业没有能力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产权改革的滞后导致了改制后政府行政干预、内部人控制和股东机会主义并存。

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企业治理水平还是很低的。2004 年，瑞士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 研究了世界上的 60 个经济体，结果是：中国的公司董事会排名第 25 位，股东价值排名第 40 位，内部交易排名第 57 位，股东权

[23] 吴金群，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变迁及其政治根源(1978～2008)，江海学刊，2008 第 3 期。

利排名第 44 位。另一项由 2003 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提出的研究成果表明，在 49 个被调查的经济体中,中国企业治理的总体排名仅列第 44 位，只是稍好于印尼,比亚洲的台湾地区、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都要差[24]。这说明,中国经济型治理结构的探索尽管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未来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大报告仍然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综上所述，在从"行政性治理"向"经济型治理"演变的过程中，企业的治理主体和治理边界逐步转化。治理主体从改革开放以前的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股东作为治理主体的"经济型"治理主体；公司治理边界也从无企业边界到法人治理边界。国有企业治理模式从以往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合、各政府部门直接监管企业运营的政企合一式的"行政性治理"，逐步向"内外治理机制协同作用"、监管部门等机构对企业监管的"经济型治理"方向演进。但是，政府作为国民经济的管理者与企业国有股东权利行使者双重身份所形成的"治理困境"，易造成"经济型治理"外壳下的"行政型治理"或其变形。总之，在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变过程中，"行政型治理"不断弱化，"经济型治理"不断强化，两种治理模式并存。

3.3 国有企业治理模式探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关于国有企业治理模式的论断、文章层出不穷，基本上都沿袭了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演变的主线，例如："行政型治理"和"经济型治理"的转化、匹配问题研究，"行政型治理"和"经济型治理"的量化问题研究，以及政府干预、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公司绩效和公司治理质量的影响研究。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分析，得出了可借鉴的政策建议。本部分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简单介绍。

[24] Liu , Qiao,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 Current Practices , Economic 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 2006.

何国华（2008）认为[25],西方国家国有企业产生的根源与中国不同：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产物，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社会的政策挽救因自由放任而导致痼疾缠身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国有企业的建立背景完全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使我们把国有企业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划上了等号。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国有企业将长期存在下去，不仅在垄断性行业，即使在竞争性行业也是如此。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应该区分竞争性和垄断性两大类，分别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对于前者，通过设计责任机制以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对于后者，通过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以达到对其进行广义资本监管的目的。

安增军，杨继国（2006）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代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性质决定的“监督监督者”的机制难于建立[26]。监督难题的解决思路应是在完善其它相关制度的前提下,对现有国有企业分类管理，将其在量上减少到必要的限度；治理机制上借鉴德、日经验,构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管理”机制，让劳动者介入企业的监督管理,成为“监督者的监督者”之一。

后小仙（2002）针对过渡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分析，以“资本雇佣逻辑”和“市场竞争逻辑”缺憾的研究为基础，提出“多边共同治理逻辑”是解决国企治理结构问题的现实抉择的命题[27]。

葛扬认为公司治理的基本制度就是委托代理制，而委托代理制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在所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权利的配置问题[28]。作者通过对同质性博弈和异质性博弈的比较分析得出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刚性的存在，导致政府与企业的异质性博弈，结果引起国有企业治理的形式化。对于同质性博弈而言，博弈本身就是一种约束，而对于异质性博弈来说，则会导致效率损耗。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进行异质性博弈时， 双方处于一种非均势的博弈态势， 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对方的异质强制力。异质性博弈表现出较多的不稳定性， 而且在双方强制

[25] 何国华，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思路的再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

[26] 安增军，杨继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监督难题及其解决，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

[27] 后小仙，多边共同治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现实抉择，财经科学，2002 年第 1 期。

[28] 葛扬，国有企业治理悖论，社会科学辑刊 2004 年第 5 期。

力支配下形成的异质性博弈往往是效率较低的。改革以来， 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进度缓慢，并发生大面积亏损，从根本上看, 就是由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刚性引发异质性博弈而造成的。

周晓光建立了一个博弈模型，对国有企业治理机制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一个机会主义行为得到有效抑制的治理博弈均衡，必须是经营者有足够的工作激励，同时监管者也有足够的监督激励，二者缺一不可(29)。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在于监督者因承担资产责任不足而缺乏监督激励，导致其对经营者约束不力。

此外，有很多学者认为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关键是要促使中国国有企业治理体系由行政型向经济型转变，建立科学决策、持续经营的运作机制，包括法人财产机制、激励机制、民主机制、监督制衡机制等，使国有企业行为必须是以市场为导向，追求通过股权、债权及其他经济性契约关系所维系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30)。还有的学者主张借鉴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经验来指导中国的国有企业治理过程，从政府定位、“强力”董事会的建立、政府与个人“双重监督机制”的运用、注重资本效率的提高等方面入手来完善中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

3.4 国有企业治理模式的新思路－国有企业内部网络化(31)

关于如何治理国有企业，即国有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论述已经很多，但是在这些理论的实际运用过程中都暴露出种种缺陷，不能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本部分内容则通过借鉴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形式的网络变化趋势，提出对国有企业内部进行网络化的独特见解，从一种全新的角度解读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网络化的企业具有灵活性强、对环境反应迅速等优势，针对国有企业内

(29) 周晓光，国有企业治理的产权博弈，《江淮论坛》2008 年第 1 期。

(30) 周立国，国有企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当代财经，2005 年第 9 期。

(31) 本部分主要借鉴了李维安的《网络组织》中关于跨国公司网络的相关论述，并结合国有企业的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

部组织结构的合理网络化必定会带来组织效率的提高。下面就对国有企业内部网络化从理论分析、特征分析、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详细深入地分析。

3.4.1 国有企业内部网络化的理论分析

国有企业内部网络化，简单地说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协调从传统的高度一体化的层级式控制向包括以资产、契约等为纽带的新型多样化控制方式转变。国有企业内部网络化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组织模式，由于这一组织中无论子公司或者子部门运作的独立性如何加强，但整个网络组织始终体现出一种共有的产权实体的形态。在这种网络化的组织模式中，要让市场“看不见的手”和科层组织“看得见的手”共同发挥效力，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好二者在组织中作用的范围和职能，也就是要选择好企业网络内市场机制和组织协调机制均能发挥作用的结合点。

伴随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企业面临的是一个多变的、快速的市场环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的经济是一种即时经济。传统的依靠公司统一决策的层级式运作方式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和发展，给企业的网络化带来极大的发展空间。企业的网络化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带进了企业内部，在各个子公司和子部门之间建立起提升效率的协作网络，这就意味着市场机制引入公司内部必须与公司的产权分割和行政协调有效的适配。这不仅是现实的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说，在组织内部同时渗透市场力量和科层组织的协调权力，将国有企业构成一种网络化的运作模式也是可行的。

从横向的组织间协调来看，实施网络化的国有企业内部分公司之间可以通过现代网络通信技术实现团队之间的协调与沟通。由于不同的子部门的工作环境、工作方式、工作目标等存在诸多差异，所以它们之间的沟通对于整个组织的绩效将产生很大的影响。现代化的网络协调方式可以实现资源的互补、优势的共享，避免浪费性的功能重置。但是，为了保证网络整体目标的实现和运作秩序，防止“部门化”等分割现象的出现，必要的权利协调也必须存在。所以网络化的关键一方面在于整体网络效率的保证，消除“搭便车”行为；另一方面又要加入市场机制的力量，以通过相互竞争的激励机制来提高各个分公司的内部运作效率。

构成总体的个体的贡献与报酬之间的微弱联系容易造成“搭便车”行为的产

生。霍尔·穆斯托姆（Holmstrom，1982）曾对"搭便车"行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32]，其基本结论是：要使一个团队有效率，就需要具有完备的监督。也就是说，由于监督的不完备或者衡量成本的高昂，往往导致团队生产的无效率，这是团队生产在实践中失败的主要原因。这就需要设计出一种激励机制使团队能够得到足够的激励。1972 年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ain and Demsetz,1972）从企业产权结构的角度也关注到团队生产的组织监督和效率问题[33]。他们认为，企业的产权可以视为为了克服团队内部各种要素所有者在生产过程中内存的偷懒和"搭便车"动机的一个解，团队生产的生产关系是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这正是难以观察和计量每个要素贡献大小的技术性原因，即要素合作的不可分辨性导致了道德风险的出现。所以要使监督有效，关键在于要有相应的组织机制和运作的规则。

实施内部网络化的国有企业监督的关键是调动和发挥构成企业整体的各个分公司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克服在资金及其他资源方面总是依赖总公司的偷懒和"搭便车"等道德行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ain and Demsetz）对"搭便车"这种道德行为的解决方法是：从制度上将企业的产权结构化，形成一种可监督的结构，尤其是使某些人的职能专业化。而且监督者不应该来自团队成员，否则监督的效果必将很差，因为这样的监督者同样拥有偷懒的动机。他们认为应该借助产权分割，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即每个网络成员以工资的形式获取劳动报酬，而监督者则获取扣除成员工资后的剩余收入。通过监督者功能的职业化、专业化和剩余索取权的赋予就可以克服成员的偷懒行为。这种机制可以同时调动监督者和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潜能，对提高团队的工作效率有很大作用。但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ain and Demsetz）剩余索取权机制的有效实施的前提是团队成员贡献的可观察性和可计量性，贡献计量的越精确，这种机制设计也就越有效。如果要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赋予各个子公司完全独立的运作权利，排除监督者的监督，是计量贡献大小没有必要，让子公司获得剩余索取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内部网络化国有企业的组织

(32) Holmstrom, (1982), Moral Hazard in Team,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3, pp.325-338.

(33) Alchain and Demsetz, (1972),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ast and Economics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62:pp.779-793.

绩效。

3.4.2 国有企业内部网络化特征分析

与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层级管理模式相比，内部网络化的国有企业呈现出独特的优势，正是这些优势的存在给网络化这种企业组织形式的生命力带来极大的提高，是网络化企业在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中能够随机应变。

一、非权力性影响对权力性影响的取代

在传统的国有企业中，等级森严，个人的收入与职位高低、权力大小密切相关，而内部网络化却能通过分化权力、下放权力改变这一现状。权力和职位诱惑力的削减能够促使员工把才能和精力专注于工作内容和工作创新。在网络化的企业内部人们更为注重的是知识和技能，权威更多的来源于知识和技能而不是传统的职位差别，这就促使人们更多地追求可以转移的、广泛适用的知识和技能财产，进而激发员工创新能力，推动公司整体的快速发展。

二、点对点的沟通方式

内部网络化可以消除传统组织结构中复杂的层级结构，减少问题识别者和问题决策者之间的距离，避免信息的失真，同样可以使网络成员自己主动地识别问题、解决问题，提高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反应速度。现代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使网络成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一线的意见和建议传递给决策层，保证了设想与实施的高度一体化。而且进一步赋予网络成员决策权和对结果的负责权，可以调动企业网络成员的主动性，防止道德风险，实现决策知识和决策权力的高度匹配，提高决策的有效性。

三、通过规则和契约控制的运作流程

传统的国有企业内部部门之间的协调主要是通过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令来实现的，这种协调方式僵化、呆板，极度限制了各个部门的主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实施权利与责任义务之间的错位，即责权分离。相反，内部网络化的企业内的协调则是通过事先制订的规则和签订的契约来进行的，保证了单向的责权链条，进而保证统一指挥系统的效率。

四、具有较强的动态特征

由于网络组织“是一种不稳定的非标准化的组织，不具有固定的结构和模

式”[34]。网络上的各个节点可以根据市场机遇的变化建立起以团队为基本单位的局部网络。网络组织边界的模糊性可以使网络化的企业针对不同的市场机遇组成不同的临时网络，进行生产。国有企业网络化的形态解决了国有企业反应迟钝这一最为社会诟病的弊端，使国有企业充满活力。

五、促进网络协调的网络中心

网络中心的重点在于制定网络的发展战略和协调各个组成单元的活动内容和范围。网络化的国有企业是一种集权和分权的结合体，说它是集权的，是因为网络中心（国企高层或专门协调部门）的战略管理作用；说它是分权的，是因为一线的网络成员可以自由的决定处理随时出现的紧急情况。网络中心的作用并不是权利的分配，而是创造一种网络协调的机制，以保证网络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共享。

3.4.3 内部网络化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35)

国有企业内部网络是随着对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适应性要求不断提高的网络经济条件下演化而来的。在这部分主要介绍根据跨国公司网络经营实践中得出的三种管理模式：分权联合体模式、协调联合体模式和集中管理模式[36]。

一、分权联合体（Decentralized Federation）模式

分权联合体模式主要是把资产分散，将更多的运作独立性和决策自由度下放给子公司，使各个子公司能够有效地关注市场的变化。整个网络化公司是由高度自治的各个子公司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如图 3-1 所示[37]。在这种组织模式下，公司总部介入子公司的能力受到限制，从而使得自成体系的分公司的独立性不断得到加强。如果二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可能会造成运作的低效，形成子公司的地方主义，导致对设备、设施的重复性投入，浪费企业有限的资源。

---

[34] 薛求知等，跨国公司新组织形态：网络组织，世界经济文汇，2001 年第 1 期。

[35] 李维安，《网络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第 298-307。

[36] 我们在此认为跨国网络公司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有企业内部网络化来说具有借鉴性。

[37] 图中黑色矩形代表拥有独立权的分公司，无色椭圆代表权力下放后的公司总部，虚线表示总部由于对分部的分权而造成的间接“松”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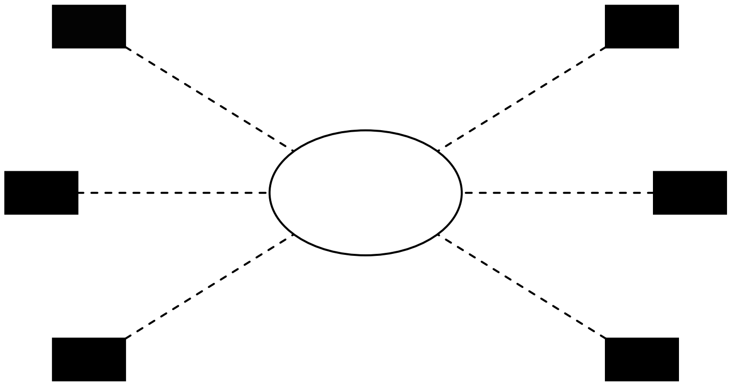

图 3-1 分权联合体模式

二、协调联合体（Coordinated Federation）模式

协调联合体模式是总公司依靠某种纽带来联结与协调各相对独立的子公司之间的活动。这种纽带通常是总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核心技术或其他财务方面的控制和支持。母公司通过掌握着这种管理的“缰绳”以控制这些自由经营的独立子公司，并指引它们的发展方向。其形式如图 3-2 所示[38]。与分散联合体模式相比，协调联合体下的分公司对总公司新产品、工艺过程及经营观念高度依赖，更易受到总部的协调与控制，包括通过计划、财务、预算以及技术、产品和生产过程等方面的控制。这种模式的组织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会抑制子公司的创造能力以及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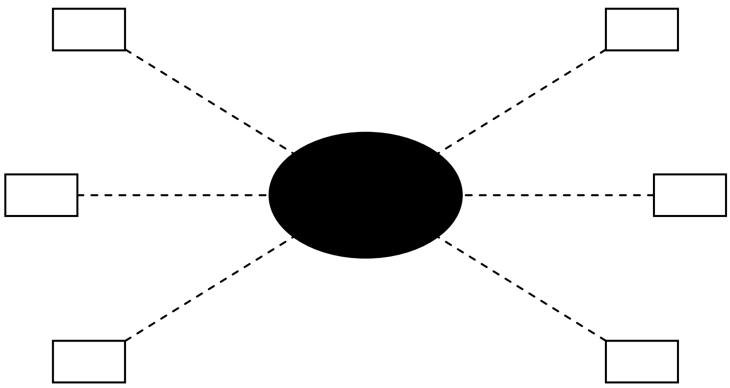

图 3-2 协调联合体模式

[38] 图中无色矩形代表被控制的分公司，黑色椭圆代表掌握权力的公司总部，虚线表示总部通过有限的方式对本部的间接“松”控制。

三、集权中心（Centralized Hub）模式

这种模式强调总公司对子公司的影响和控制，即把主要决策和控制权集中在公司总部。其竞争战略强调成本优势和质量保证，对产品开发、采购和制造进行严格控制。在这种模式的运作中，由于资源和能力集中在公司总部，它注重发掘所有活动中的潜在规模经济以实现高效。但子公司缺乏资源和责任从而不利于发挥其主动性与积极性，以致不能对市场变化做出有效反应。集权中心模式如图 3-3 所示[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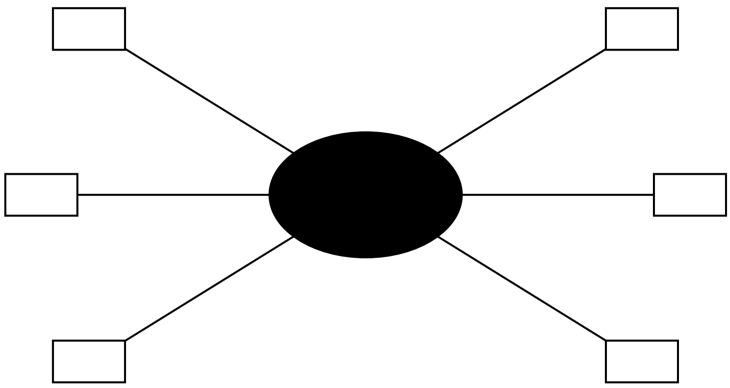

图 3-3 集权中心模式

通过对几种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分权联合体模式的好处是效率的提高，能够对市场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而集权中心模式的优势在于规模经济和控制便利。为了同时获得这两方面的好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混合型的结构，最有代表性的是巴特利特和高绍尔（Bartlett and Ghoshal，1989）提出的结构模式[40]。这种模式主张网络化公司内各项活动的配置和协调应是相互关联的，子公司应对某些业务有领导权，而对其他业务提供支持。决策建立在最大限度地增大公司的经营技巧和实力的基础上，而不考虑业务的地点和分公司所处的位置。为了快速高效的运作，公司总部与分支机构之间、分支机构相互之间的联系要适应环境的快速变化。但他们所给出的公司结构只是理想的结构而不是实际的结

[39] 图中无色矩形代表被控制的分公司，黑色椭圆代表掌握权力的公司总部，实线表示总部通过集权对本部的

[40] Bartlett and Ghoshal, （1989）, Managing Across Borders- The Transnational Soluti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构，这种结构只是作为许多因缺少其他有效方法而向此发展的一种方向[41]。

四、网络化组织模式

通过对以上三种模式的分析，我们发现每种模式都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缺陷，为了弥补这些不足，网络化的组织模式应运而生。网络化组织模式的产生解决了三大矛盾：一方面要保证整体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分公司局部利益；一方面要追求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小巧灵活；一方面要进行权力下放，使网络终端的各个经营单元具有活性决策权力，以发挥其在当地环境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要集中汇报，以实现统一协调与信息共享。在网络化组织结构中，作为结点的各单元之间是一种既非完全独立，也非完全依赖的相互依存关系[42]，其结构图如图 3-4 所示[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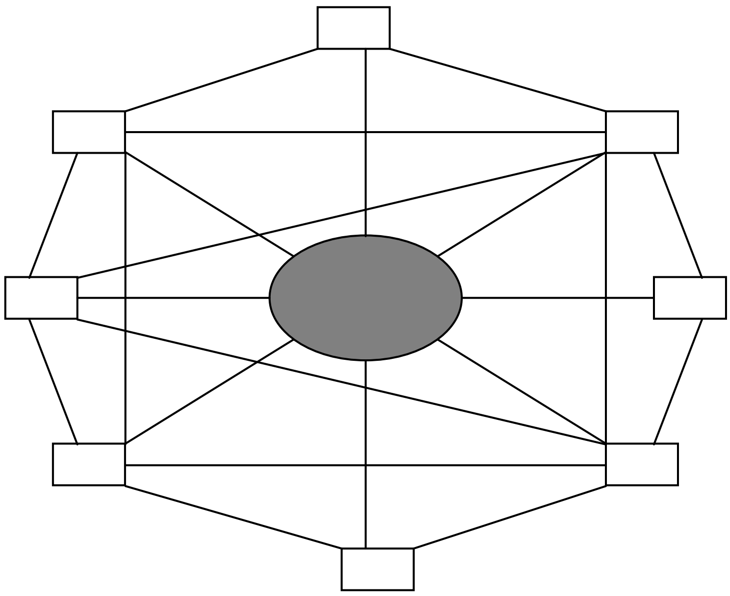

图 3-4 网络化组织模式

网络化组织结构与对称性的矩阵结构不同，它不具有组织部门的对称性以

---

(41) 包铭心，（Paul W. Beamish）等，《国际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1 页。

(42) 克里斯托弗.A.巴特利特著，（曾瑚等译），《个性化的公司》，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5 页。

(43) 图中灰色椭圆代表信息、技术协调中心（灰色代表总部控制功能的弱化），无色矩形代表专业化的子公司。

及组织的产品与地区之间的平衡，它是一种联结不同类型子公司的网络，处于网络中心结点的单位协调产品、职能和地区方面的信息。在这一网络组织中，总公司的技术流向子公司，子公司的技术也同样可以流向总公司，甚至在整个网络中共享。这一组织模式能使公司充分挖掘分散的能力和专业技能，并通过信息、知识和其他资源的频繁横向流动，将这些分散的技能联结起来。通过网络的共同目标和运作规则，通过组织的文化来培养相互信任和相互协作的理念，这也是保证网络成员紧密协作的粘合剂。这种以专业活动和能力为基础的分散化的网络配置，是基于分工协作的理论来考虑的。它通过专业化分工来获取效率和效益，而非通过极权化来实现这一目标[44]。

3.4.4 内部网络化国有企业的运作机制

一、决策机制

决策权的配置问题一直是组织管理中一个重要而永恒的话题。不论是哪种组织模式都必须考虑这一问题。中国国有企业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中，无论是宏观层次的放开搞活，还是微观层次各种制衡机制的安排，都是围绕决策权的收放调整的。在传统的层级式企业中决策权相对固定于组织的中心。运作的特征表现为信息在执行者与决策者之间的来回移动，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息扭曲和时滞而带来的信息实效问题[45]。相反，在网络化运作的企业当中，决策权的配置是向网络结点（即子公司）下移。由于各个子公司处于不同的环境当中，要想子公司能对环境做出快速反应，决策权应该分配给那些熟悉环境的子公司，因为它们最了解相关信息的变化和资源状况。如果像金字塔型组织结构那样先把所有信息传递给中央集权部门，然后再等待中央部门总结信息、发布命令，最后可能会错过最佳的市场机遇。这就涉及到决策权与知识、信息的配置问题。

哈耶克（Hayek,F.A,1945)认为，知识与决策权的配置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知识传递给拥有决策权的人；另一种是把决策权传递给拥有相关知识的

---

[44] 李维安，《网络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第 304。

[45] 李维安，《网络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第 324。

人[46]。哈耶克（Hayek,F.A,1945)是最早提出知识及其分工对经济有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家。他在《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一书中指出："社会经济问题不仅仅是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更是一个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的问题"[47]。这一深刻见解告诉网络化运作的企业如何处置决策权和知识的关系：即要发挥整个公司经济活动的效率，决策权的配置不应该仅仅赋予一个"单一头脑"，而应该发挥公司中每个成员所知道的信息与资源优势，也就是正确匹配决策权和相关的知识。

根据哈耶克的假设市场机制会自动配置决策权和知识：当转移知识的成本高于转移决策权的成本时，知识的拥有者就会高估决策权的价值，并倾向于购买它们；相反，当转移决策权的成本高于转移知识的成本时，社会就会自动把决策权分配给拥有知识的人。

"如果我们同意社会的经济问题主要是迅速适应特定的时间和环境地点的问题。那么，直接了解有关变化，并知道资源可迅速满足他们需要的人来做出决策。我们不能指望这个问题通过事先把全部知识传输给一个全能的中央委员会，并有它发出指令这种途径解决。我们必须通过权力分散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48]。哈耶克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集权与分权的区别（类似物理当中的核聚变与核裂变）。如图 3-5、3-6 所示。

[46] Hayek,　F.A,(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63(6), pp.111-119.

[47] Hayek,　F.A,(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63(6), pp.111-119.

[48] Hayek, F.A,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63(6), pp.5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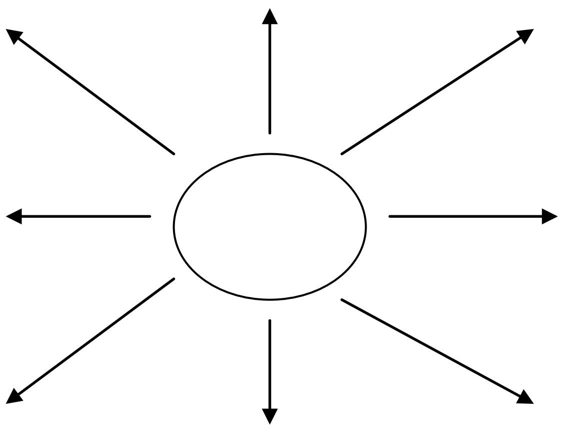

图 3-5 集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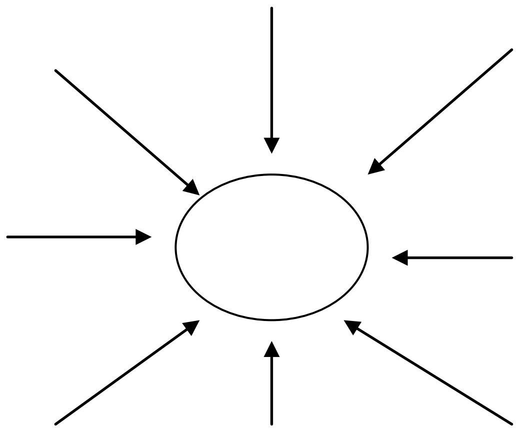

图 3-6 分权

二、协调机制

在网络化企业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并不是通过传统的权力进行沟通的，而主要是制度和规则的运用。整个企业网络要想有序地高效运行，关键在于能否采用科学的制度与规则进行控制与协调。这种协调机制的运用赋予子公司高度的运作自主权，但同时也要求子公司承担决策的相关后果，并付出相应的代价，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即总公司向下转移的不仅是权力，更有伴随的责任。通过建立科学的财务体制和制度规范，要求公司的每一项支出都必须由公司外部的会计、审计机构出具相关证明。由于基层之间的合作是以实现最大效益为基础的伙伴选择，而且内外伙伴的选择必须遵循网络规则，因此这种协调模式既可以调动网络内各个分公司的积极性，又可以提高合作的效益，对整个企业网络的效益是十分有益的。

三、学习机制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传统的生产三要素：资本、劳动和土地，已经让位于创新，创新成为价值增长的主要源泉。如何把握先进技术、先进创新成为一个企业最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作为网络化的企业，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发挥子公司之间的学习效应，通过相互之间的学习使得经验能够及时在网络组织中产生效益，所以，学习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至关重要。

在传统的组织结构中，分公司发明的先进工艺或方法，首先需要逐级上报给中央部门，经过研究决定后才能在全公司推广应用。由于经验价值与时间的弱相关性，这种做法会导致经验价值的降低，甚至消失。在工业经济时代，由

于企业的经营环境变化较慢，时间对经验价值的影响不甚明显，企业可以反复利用相关经验，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现在是网络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的是极其动荡的经济环境，经验的价值与时间的相关系数很大。若不及时推广相关经验，不仅会造成其价值的丧失，更可能会产生负面效应，对企业反而是一种负担。托夫勒曾经指出："昨日的成功将是明日的毁灭，没有比昨日更危险的东西了"[49]。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中央政府千方百计地想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国有企业的运行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经济型治理在运用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之处：制度欠缺、监督缺失、权力寻租等等。许多学者也从多种角度对国有企业的治理提出了种种建议：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职工参股等等。但是，在网络经济日益壮大的今天，国有企业内部网络化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途径。企业理论的逻辑分析、网络化特征的辨析、组织模式的选择和运行机制的建立是企业网络化的关键步骤，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的可行途径之一，其运行绩效也值得期待，国际上诸多跨国公司的成功范例便是说明。

[49] 托夫勒，（潘祖铭译），《透视未来企业-革命性的未来企业新概念》，（台湾）志文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6 页。

第四章 国企垄断规制改革：政府角色与最佳路径分析

4.1 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规制类型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原理出发，根据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得知中国现阶段能够比较好地处理垄断与竞争关系的政治经济选择是实行国家垄断和公共调节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安排。也就是说，在中国目前所处阶段和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国家垄断不可避免。但是为了把国家垄断所必然带来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中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的好处，政府还必须对国家垄断的产业和部门进行公共调节，也就是规制。

对垄断行业进行政府规制的基本内容和作用一方面要充分承认和重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获得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增长动力，加速产业的市场化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另一方面，当技术条件的原因使得垄断不可避免的时候，对垄断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进行规范化的调节，例如垄断可能造成垄断高价，导致产量低于竞争性均衡水平；垄断可能出现损坏消费者利益、与民争利的情况；垄断还可能抑制经济中的竞争性部门的发展，造成整体经济的社会竞争氛围的损害等等。

在分析政府对国家垄断的产业和部门的规制问题之前，首先就国家对企业的几种垄断形式进行说明，以根据不同的垄断形式进行有具体的规制分析。

第一种是国家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国家经济安全、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自然资源等行业和部门实行排他性的市场准入并委托国有企业代表国家进行经营，允许它们在经营和管理方面有一定的垄断地位。也就是说，对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对国家的经济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业和部门，政府可以通过授权，利用行政权力，实行排他性的市场

准入限制和一定的行政性调节措施。国家对这些行业的垄断并不是不要竞争，扼杀竞争。国家垄断也不意味着百分之百的垄断，也不意味完全的国有。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只要保留主导型控制地位即可，就像股份制企业的控制权一样；

第二种是国家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所实行的国家垄断措施和行为。例如在经济危机期间，或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国家为了对企业进行拯救和保护而将企业交给国家控制。如美国在次贷危机时把房地美和房利美两个企业收归国有；

第三种是国家对特定行业实行的垄断。如国家烟草专卖等。

第四种是国家在知识产权的行使中所进行的国家垄断，如对包括版权、专利权、商标权和其他特许经营权的垄断。

第五种是国家根据产业政策，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所实行的垄断。

与国家垄断有所不同的是行政性垄断，它是一种超经济垄断。它是利用行政权力和力量，通过限制正常市场竞争、限制市场交易、限制市场准入、设立排他性许可等形式而形成的市场势力（垄断）。经济垄断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行政性垄断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它是不是垄断，而是它违背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全面的市场干预，也即行政性干预。在目前的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正逐步建立和完善，因而出现了更多的经济垄断，同时行政性干预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在减少过程中。而国家垄断是以社会名义所进行的经济调节活动。在这三种垄断并存的经济转轨时期，国家以社会名义、为全民利益所进行的国家垄断不应当取消和反对，而应当适当加强。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在充分竞争基础上所形成的经济垄断，应当成为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结构合理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给予一定的支持，同时继续鼓励竞争，放松管制，并警惕和限制垄断企业滥用市场势力的行为，这会影响经济效率以及降低和损失社会福利。而对那些滥用行政权力形成的既不合理又不合法，而且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破坏市场经济正常竞争环境的行政性垄断必须取消和限制。

总体来所，无论是哪种垄断形式，都是政府对企业的一种规制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区分国家垄断与行政性垄断。国家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具有凌驾整个社会、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进行经济管理和社会调节的职能。经济管理职能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国家依据法律、法规等形式对各种经

济活动的调节、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调节以及对涉及全民根本利益、国家安全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进行的干预和安排等。由于市场经济中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资源配置中出现的不合理问题就不可能通过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所能得到纠正和弥补，因而就为政府的干预留下很大余地，国家也有义务通过行政性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缺陷。但是国家垄断（或政府干预）并不能是任意的，它必须具有统一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所谓统一性是指国家垄断必须从全民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做出安排，这种安排是代表国家或社会的根本利益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地方保护主义或部门利益出发所进行的调节活动则不应属于国家垄断范畴。因为他们造成人为的分割，保护的是某一部门、某一行业、某一地方或少数人的利益，是不能与国家垄断混为一谈的。其次是合理性，即国家垄断必须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竞争中具有自我经济利益的资助经济实体。在一个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下，为了取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企业必然会进行激烈的竞争，竞争导致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就会出现垄断，这是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此时一个好的国家和政府的根本任务就是创造一个适宜企业发展，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竞争性市场环境。如果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行政干预的话，那么这种干预也必须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行政性垄断恰恰是违反市场发展的规律，人为造成地区分割、行业分割，其结果是经济效率低下，对社会公平造成破坏并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损失。第三是合法性，国家垄断是代表社会利益对经济活动进行的调节和干预，但是除了符合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之外，国家垄断还应当具有合法性。也就是说它必须经过适当的授权、依法进行经济干预。当国家授权的企业取得合法的垄断地位之后，它们必须在法律给定的基础和范围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如果遇到有关全民利益或人民具有强烈质疑的事件的情况下，还必须征求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意和认可。

4.2 规制改革中的政府

由于中国特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环境，特别是中国仍然处

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转轨或转型是中国最大的制度背景。特别是，在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改革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政府的影响，中央政府在制度改革包括规制改革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其角色已由最初的制度创新主体转换为“最终裁决人”或“协调人”，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央政府的这种角色转换，不能说其已不再是博弈的参与人，中央政府博弈参与人的身份并没有因其在制度创新中角色的变化而消失，其有限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特点仍然存在。除此之外，有许多看似外生的制度都是内生于政府的行为中的。政府的认知模式、行动决策以及主观博弈结构型塑了这些制度，而政府认知的变化将会使这些制度发生变化，变化的结果既可能是有利于制度变迁的，也可能是不利于制度变迁的。因此，分析政府垄断规制改革的最佳路径选择问题，必须以政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政府的认知和主观博弈结构将影响着制度变迁包括规制变迁的进程和路径。为此，需要探讨在既定的技术、制度禀赋下以及其变化的条件下，政府应该如何从改变自身认知出发，调整自身的主观博弈结构，以更好地在遵循规制变迁的内在要求下，最小化规制变迁或规制改革的成本，为其他博弈参与人提供更有效的制度创新的激励，使他们对规制变迁的正面作用得到最大地发挥，从而使规制改革的路径趋于最优。

在规制改革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应定为“协调人”，这是中国制度变迁或规制变迁的内生结果，政府的职能应在于“协调”。其协调职能或协调内容应以降低“不协调成本”为目标，通过合意的措施来协调规制变迁中或规制改革中的不协调问题。“不协调成本”是指各种外生性规则或外生参数之间不协调导致的认知无序、秩序混乱、效率低下等不良现象（樊纲，2005）。“不协调成本”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技术进步与稳固的依存性制度间的不协调成本，这是由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冲突的核心所引申出来的命题。技术进步导致的规制变迁方向可能是彼，依存性制度影响下的规制变迁方向却可能是此，在制度变迁进程中，二者的不协调会导致“不协调成本”的产生。因此，要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有所偏颇，也不能只从技术进步角度出发而忽略制度的作用；更不能一味讲究制度的决定作用而忽略技术进度的影响作用。要将技术进步与制度的关系放在一定的研究语境中去考察，不需一味地强调二者谁决定了谁。在研究特定的规制变迁中，要具体地分析技术的作用机制和制度的作用机制。需要强调的

是，技术进步通常是制度变迁包括规制变迁的动因之一，依存性制度的变化也会是引起其他领域制度变迁包括规制变迁的动因之一，但依存性制度也会成为规制变迁的路径依赖因素。要在二者对规制变迁的共同影响的语境中去探讨规制改革，通过协调二者之间的冲突，使规制变迁朝着更有效率的方向行进。在协调二者的关系时需要注意避免两种情况的发生，一种是“瓶颈”或阻碍的情况，一种是“过激”的情况。所谓“瓶颈”主要指制度的障碍性，从某中意义上讲，技术是中性的，而制度却是非中性的。技术进步只有在封闭的经济域中才会受到遏制，在开放的环境下，技术进步具有扩散性，并且会对封闭的经济领域形成冲击，但封闭领域的制度将阻碍技术的传播与扩散，从而成为技术变迁乃至制度变迁的障碍或者瓶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通过改变制度环境来协调这一摩擦，从而消除瓶颈。而在这一协调过程中，就产生了所谓的“过激”现象，即过于从技术进步角度出发追求技术进步对制度变迁的“决定”作用，而不考虑既有制度的耐久性和稳固性，意图通过激进的制度改革措施来剔除制度瓶颈，这种过激的行为往往产生涸泽求鱼的结局。所以，需要政府来协调。

第二类，依存性制度间的不协调成本。一国的制度禀赋并非仅仅有一种制度组成，而是由不同领域的不同制度组成的一种整体性制度束。在这种制度束中的各种制度很难是相互一致和互相协调的，因此，就会因各种制度间的不协调而产生“不协调成本”，这种不协调成本是影响制度变迁的主要障碍，特别是由于制度自身的耐久性和稳固性，使得各个制度相互协调时产生的成本更高。关于制度间的协调，科尔奈在研究体制转轨中曾最早注意到这种现象，并明确提出了“体制之间相互协调（coherence）”的概念。科尔奈认为“一个经济体系中各种体制之间的相互兼容和相互协调，是一个稳定的体系性的重要保证，也是这个体制有效运行的基本保证。各体制之间相互不协调，就会出现混乱，从而破坏效率，使经济增长率下降。”

这种制度间的不协调成本，在转轨国家的转轨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在旧有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摩擦和协调，各种制度间形成了比较稳固的关系。当旧的制度框架要进行调整时，即使不是整体制度的一同调整，仅仅是某一或某几种制度的调整，也会对原有稳固的制度关系造成冲击。这样，制度间的不协调问题就会更加突出，不协调成本也会更加显著，严重时会产生阻碍制度变迁或制度改革的各种因素。

因此，对于这种“制度间的不协调成本”，作为协调人的政府应该进行有效的协调，同样在协调中要注意避免“瓶颈”和“过激”两种现象的发生。

第三类，效率与租之间的不协调成本。规制机制设计的本质就是效率与租的权衡（拉丰，1993），因此效率和租之间天然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改革的红利或制度创新的收益包括“利润”或“效率改进”与“租”，“租”对于效率改进或制度创新来说是具有正面作用的，但是当“租值”过大时就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特别是当“寻租”和“创租”出现时，对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来说就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但负面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条件下，“寻租”具有正面的作用。特别是在转轨国家的转轨过程中，各种制度不健全甚至处于真空时，寻租就是一件能够带来效率的事情，如果伴随着给社会带来利润的制度创新的话，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并非一定是坏事（Roumasset and Laine，1992）。但是，当制度不断健全，并且可以通过制度来行事时，寻租就是一件有危害的事情，此时，就要通过“寻租”的存在，反思制度中的问题。

作为协调人的政府应该“审时度势”，区分“好租”和“坏租”，并对其进行协调。对租和效率的协调，就是对其它制度创新主体特别是利益集团创新激励的调整。合意的协调会对其形成正的创新激励，从而推动制度创新活动的开展和制度变迁的进程；非合意的协调就会形成负的创新激励，利益集团就会阻碍制度创新的出现，阻挡制度变迁的进程，扭曲制度变迁的路径。

由以上分析可知，对政府或改革者来说，如何在变化形势下让社会各个利益集团通过博弈内生出最优目标和路径，才是其应该思考和需要付诸行动的重要事情，而不是外生地、主观地和刻意地设计出一条改革的最优路径。因此，政府或改革者的职责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调整行动决策规则，来顺应规制变迁的内在要求，协调变迁中的成本和冲突，使规制变迁的路径能按照一条最佳的路径行进。

4.3 平行推进的动态改革路径

最佳的规制改革路径的前提是一个“相对理性”的中央政府，在具体的规制改革中，中央政府应该成为一个“协调人”的角色，把其职能定为：通过合意的

措施来协调规制变迁中或规制改革中的不协调问题，以降低“不协调成本”，从而使规制变迁沿着自发演化的路径行进。从协调的角度出发，一条合意的或最佳的改革路径应该是平行推进的动态路径。

首先，自然垄断规制改革的路径应该是动态的。

从技术、制度等外生性规则变化的环境出发，设置动态的规制目标和规制措施，走一条动态的规制改革路径。这条动态的规制改革路径应该由放松规制、适度规制和退出规制交织组成，这三者之间有时是依次进行的，有时又是并行进行的。放松规制的逻辑起点在于技术的不断进步、国内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以及依存性制度的变迁。适度规制的逻辑起点在于新技术出现所导致的垄断强化（如三网融合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本地市场网络的垄断性）、市场失灵的存在、国际竞争的冲击、依存性制度的稳固以及利益集团对制度变迁的阻碍。退出规制的逻辑起点在于尊重博弈均衡的自发演化，以演化的内生规则为规制变迁的核心，发挥个体社会成员的制度创新作用，使其成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在规制变迁中，政府的力量过于泛用时，规制变迁的内在良性机制就会被打乱，均衡也就不一定是有效率的。

其次，自然垄断规制改革的路径应该是平行推进的。

规制变迁受到各种依存性制度的影响，不同制度间的不协调问题，将影响规制变迁的速度和路径。除此之外，规制制度安排并不能完美地解决自然垄断的诸多问题（如信息不对称问题等）。因此，无论从不同制度间的协调出发，还是问题的解决出发，都要走平行推进的改革路径，即在推进规制改革的同时，对其依存性制度也进行一致的改革和协调，即进行相关的配套改革，诸如对政治权力制度、所有制、法制以及金融制度等的改革。

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的自然垄断规制改革是市场化改革的内生物，市场化改革是整体经济制度的改革或变迁，因此，应该从整体制度的整体变迁中推动规制改革。改革的出发点可以是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改革措施的具体安排必须以相关联的依存性制度为参照系。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自然垄断规制改革不同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制改革，过于追求放任自由的纯市场化改革不适合中国的转型国情。规制变迁的制度起点和原有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规制变迁的路径和成效。由于依存性制度的存在使制度变迁的进程比较缓慢，在实践中表现为渐进式的改革。因此，从中国特有的依存性制度出发，就不能

对改革操之过急，规制改革更是如此，只有随着相关领域依存性制度变迁的实现，规制改革的目标才能更合意的实现。因此，不要盲目地批评规制差强人意的绩效，改革既要着眼于规制本身的效率，还要着眼于规制与其依存性制度相互间的协调一致，更要着眼于规制对于整体制度效率的影响。

本章也只是从理论上提出了一条最佳的规制改革路径，但鉴于政府的有限理性和规制自身的复杂性，具体的实施效果如何，将不得而知。这是本文无力解答的问题，这也构成了本文需要进一步努力研究的方向。

第五章：中国国有资本产业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改革重点，而当前阶段深化国有企业的重点在于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即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大做强，加大国有企业的控制力使国有资本的产业分布呈现合理布局。特别是从 1999 年十五届四中全会以来，明确了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加大了国有企业战略调整和重组的力度，使国有资本产业的分布逐渐趋于集中和合理。

十年改革实践，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同时也推动了理论的发展，结合改革经验总结现有国有资本产业分布的理论，关于国有资本产业分布的影响因素大致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产业特征，这些产业特征主要包括自然垄断性、网络经济性、产业外部性和产业主导性；第二部分为外部制度，包括市场化的程度、政府的行为和企业的行为。本章我们将提炼出五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并运用 30 个行业 2000—2012 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它们对于中国国有资本产业分布的解释力。

5.1 关于国企分布决定的五种假说

第一种理论称之为自然垄断假说，即：国有资本应该集中在固定资产规模较大、资本密集程度较高、自然垄断程度强的产业；第二种理论称之为产业外部性假说，即：国有资本应该集中分布于知识和技术外溢性较强的产业中；第三种理论称之为产业主导性假说，即：产业的主导性越强，国有资本越倾向集中；第四种理论称之为市场化假说，即：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国有资本比重会趋于下降；第五种理论称之为政府支出假说，即：随着政府支出的减少，国有资本比重会相应的下降。

一、自然垄断假说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引入国有资本的原因就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

题，因此，从理论上讲国有资本的边界应该被限定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内。而自然垄断是造成“市场失灵”诸多原因中重要的一个，因此，国有资本应集中分布于自然垄断属性比较明显、自然垄断程度比较高的产业，因为进入这类产业需要高昂的沉没成本，投资风险比较大——私人资本无力承担。

二、产业外部性假说

关于外部性，从马歇尔的内部性和外部性的两分法、到庇古的灯塔、后到科斯的科斯定理，都在探讨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办法，但至今也没找到满意的答案。而就产业外部性来说，如果某产业具有强的外部性，特别是具有明显的产业“关联效应”或“溢出效应”，由于产权界定问题导致科斯定理现实中的不易实现性，这类产业不宜由私人资本进入，而应由国有资本进入。从而，为其他产业提供生产要素和技术支持，进而稳定产品市场价格，避免经济波动。相应地，产业外部性强，尤其是知识溢出效应强的产业，国有资本的比重就会比较高。

三、产业主导性假说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华尔·惠特曼·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对主导产业的定义，所谓主导产业是指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那些本身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且能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的产业。主导性产业是一国经济增长的牵引力，也是一国经济的稳定剂。为此该假说认为，一国政府会倾向于利用国家资本来培育主导性产业，一方面有助于政府通过其调节宏观经济稳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一国产业竞争力的培育和提高，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主导性产业决定着一国的综合经济竞争力。相应地，产业主导性强的产业国有资本的比重会比较高。

四、市场化假说

市场失灵是公有制企业存在的理论基础。因此，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公有制企业将丧失其存在的基础，相应地，国有资本的比重也会不断下降。Cao 等（1999）对该假说进行过描述，Li 等（2000）、田国强（2001）以及 Su 和 Jefferson（2003）则正式提出了这一假说——市场化减弱了政府对于当地国有企业的影响力[50]，因而增强了政府对它们进行改制的激励，进而会减轻产业中国有资本

[50] Li 等（2000）的研究表明，产品市场的竞争性会促使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田国强（2001）证明，当市场变得更具有竞争性时，公有制企业就会逐步减少。Su and Jefferson（2003）证明，投入品市

的比重；李敏波、王一鸣（2007）用动态优化理论论证了：随着资本品市场的市场化深入和（或）计划性定价对资本品价格扭曲程度的降低，在国企部门与私人部门互补的领域里会出现均衡资本存量均下降的现象，而在国企部门与私人部门相互竞争的领域里会出现"国退民进"现象。

五、政府支出假说

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往往对改制进程和速度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影响政府行为的诸多动机中，政府支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府的目标函数。因为在改制前政府的收入多来自国有企业，因此在对国有企业实行改制时，政府要根据对其收入的影响来做出决断。政府支出过多使政府必须维持一个较高的支出水平，为此，政府需要持有更多的国有资本以提供高额的开销，而这也使国有企业"被承担了"政策性负担，缺乏自生能力和盈利能力。因此，减少政府支出会利用国有资本的退出，同时支出减少也会使政府把更多的费用投入到生产上，使总产出增加、生产效率提高，从而使政府在维持总效用不变的情况下推行更快的转轨速度。林毅夫、李志赟（2005）认为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是导致国有企业自生能力差、盈利低和存在"软预算约束"的主要原因，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解决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是实现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根本之道；解明（2007）提出了政府支出假说，并用 Matlab 进行了数值模拟。

现存文献中关于国有资本分布影响因素的经验检验并不多，不过也有了一些对上述假说的经验检验。如 Li 等（2000）就市场化对国有企业改制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郭凯、姚洋（2004）对影响国有企业改制的五种因素进行了检验，其中包括市场化假说和财政负担假说（与本文提到的政府支出假说有相似之处）；郝书辰、蒋震（2007）对影响国有资本分布的四种因素进行了检验等。本章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使上述五种假说能够同时得到检验，并对其他决定因素进行控制。由于数据缺陷，现有的研究往往存在缺失变量的问题。特别是它们往往只检验一个或几个假说，因此是不完备的。惟一可以和本文进行比较的研究是郝书辰、蒋震（2007）的文章。他们研究了四种影响国有资本产业分布的因素。但是，他们的理论模型中缺乏对和政府行为以及非国有部门

场的竞争性也会使经营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接受改制。

激励相关的假说进行检验[51]。在本文的模型中，不仅考虑了影响国有资本产业分布的产业特征，还考虑了外生制度变量，并把政府的行为以及对非国有企业的激励制度因素考虑了进去。本文认为，国有资本的调整既受到产业自身特征的影响，也受到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更受到政府效用目标和非国有企业效用目标的影响。只有从产业特征出发，协调好政府效用目和非国有企业效用目标，努力推进市场化进程，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使国有资本在一些领域顺利退出的同时注入非国有资本，才能使国有资本在另一些领域集中发挥其应有职能，最终形成合理的国有资本布局。

5.2 数据和变量的选取、处理

5.2.1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的数据主要根据 2001—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整理、计算所得，其中 2003 年的数据选自《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04》。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连续性，本文选取了 30 个行业中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同时，为了防止出现估计有偏，本文对选取的数据剔除了价格因素影响（按 1995 年不变价格）。

这 30 个行业包括：（1）煤炭开采和洗选业；（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3）有色金属矿采选业；（4）农副食品加工业；（5）食品制造业；（6）饮料制造业；（7）纺织业；（8）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9）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10）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11）家具制造业；（12）造纸及纸制品业；（13）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行业；（14）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5）医药制造业；（16）化学纤维制造业；（17）塑料制品业；（18）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9）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0）有色金属冶炼及

[51] 郝书辰、蒋震（2007）的文章首次对中国国有资本产业分布的影响因素做了比较系统的实证分析，对本文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文章在诸如数据选取、变量设定和计量方法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本文选取了更为详实的数据，设定了更全面的变量，运用更严谨的计量方法对影响中国国有资本分布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更具客观的结论。

压延加工业；（21）金属制品业；（22）通用设备制造业；（23）专用设备制造业；（2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25）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26）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7）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28）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29）燃气生产和供应业；（30）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2.2 变量的选择和描述

一、国有资本的分布

对国有资本分布的衡量，这里用产业内国有资本比重来表示。产业内国有资本比重 $SSOE_{i,t}$ 的衡量有多种方法（i 代表第 i 个产业，t 代表第 t 年），其可以采用一个行业内国有企业的产出、销售和就业占行业总数的百分比；也可以采用国有企业占 GDP 比重、国有企业占总投资额的份额和国有企业在就业当中的份额。本文选取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占该行业总产值（包括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作为衡量产业内国有资本比重的变量，用 $SSOE_{i,t}$ 表示。通过数据整理，我们计算出了 2000—2012 年 30 个行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产值比重。

二、自然垄断程度

1、沉淀成本。自然垄断的必要条件之一即是高沉没成本，因此，沉没成本的高低可作为衡量自然垄断程度强弱的条件之一。而沉没成本不能直接从统计数据获得，这里用产业的平均企业固定资产规模来衡量[52]，等于产业的年度总固定资产规模与产业年度企业数量的比值，用 $Sc_{i,t}$ 表示。我们据此计算出了 2000—2012 年 30 个行业的平均企业规模数据。

2、需求收入弹性。在自然垄断理论的新近发展中，理论界有种观点认为网络经济效应的强弱是衡量自然垄断的关键指标，而网络经济效应的强弱可以由固定成本（也称初始成本或沉没成本）的大小以及需求弹性的大小来衡量。固定成本越大，需求弹性大则相应的网络经济效应就越大。从另一方面讲自然垄断行业的产品当属资源性稀缺的产品，该类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理论上讲应该

[52] 白重恩（2004）和郝书辰、蒋震（2007）都用这一指标对规模经济和沉没成本做了衡量。而用产业的平均企业规模数据来衡量规模经济是不妥的，为此，本文只用这一指标近似替代沉没成本。

比较高。为此，需求收入弹性可以作为沉没成本 $Sc_{i,t}$ 之外的又一衡量自然垄断程度的指标。需求收入弹性系数=某一产业产品的需求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其中的需求增长率用该产业销售额增长率近似替代。相应地，定义需求收入弹性为 $Ei_{i,t}$，表示第 t 年第 i 个产业的需求收入弹性。据此，我们计算出了2000—2012 年 30 个行业的需求收入弹性数据。

3、规模经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视规模经济为自然垄断存在的必要条件，尽管之后的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成本劣加性才是自然垄断存在的充要条件，但由于成本劣加性的不可衡量，为此，此处依然沿袭规模经济是自然垄断存在的必要条件的论点。关于规模经济的测量，这里用“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分解法（具体方法参见 Fare etc.1994）获得，用“规模效率的变动” $Sech_{i,t}$ 表示[53]，运

[53] 具体方法如下：在假定每个行业为一个决策单位的前提下，用 (x^t,y^t) 和 (x^{t+1},y^{t+1}) 分别表示某一行业在 t 时期和 t+1 时期的投入产出量，借鉴 Fare 等（1994）的方法，基于投入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可以表示：

$$M_i^t = D_i^t(x^t,y^t)\Big/D_i^t(x^{t+1},y^{t+1}) \quad ①$$

$$M_i^{t+1} = D_i^{t+1}(x^t,y^t)\Big/D_i^{t+1}(x^{t+1},y^{t+1}) \quad ②$$

这两个指数分别测度了在 t 时期和 t+1 时期的技术条件下，从 t 期到 t+1 期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的变化程度。这里的 $D_i^t(y^t,x^t)$ 是混合距离函数，它是技术效率的倒数。为了避免因时期选择不同而造成的影响，可以使用两个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的几何平均值来表示。因此，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从 t 期和 t+1 期的变化程度可以表示为：

$$M_i^{t+1}(x^t,y^t,x^{t+1},y^{t+1}) = \left\{\frac{D_i^t(x^t,y^t)}{D_i^t(x^{t+1},y^{t+1})}\times\frac{D_i^{t+1}(x^t,y^t)}{D_i^{t+1}(x^{t+1},y^{t+1})}\right\}^{\frac{1}{2}} \quad ③$$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还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化（EFFCH）和技术进步的变化（TECH），其定义如下：

$$M_i^{t+1}(x^{t+1},y^{t+1},x^t,y^t) = TECH(x^t,y^t,x^{t+1},y^{t+1})\times EFFCH(x^t,y^t,x^{t+1},y^{t+1}) \quad ④$$

$$TECH_i^{t+1}(x^t,y^t,x^{t+1},y^{t+1}) = \left\{\frac{D_i^{t+1}(x^{t+1},y^{t+1})}{D_i^t(x^{t+1},y^{t+1})}\times\frac{D_i^{t+1}(x^t,y^t)}{D_i^t(x^t,y^t)}\right\}^{\frac{1}{2}} \quad ⑤$$

用包络分析 DEA 方法我们计算出了 30 个行业的规模经济值(54)。

三、产业外部性

国有资本的特性和双重目标决定了其应该进入强外部性产业，Marshall 认为存在三种体现外部性的渠道，包括支持产品供给的专业化、鼓励专业化要素市场的产生以及促进支持知识的溢出效应(Krugman,Obstfeld,2000)。外部经济性主要是原料提供商、劳动市场和知识溢出效应，对于原料提供来说，原材料关联存在于所有产业之中，所以，这种外部性并不是国有资本分布产业的固有特征；产业外部性主要是体现于劳动市场和知识溢出效应中。这里选取劳动市场

$$EFFCH_i^{t+1}(x^t,y^t,x^{t+1},y^{t+1})=\frac{D_i^t(x^t,y^t)}{D_i^{t+1}(x^{t+1},y^{t+1})} \quad ⑥$$

这里的技术效率的变化（EFFCH）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的变化（PECH）和规模效率的变动（SECH），在假定 CRS 和 VRS 分别为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可变后，其定义如下：

$$EFFCH(x^{t+1},y^{t+1},x^t,y^t)=PECH(x^t,y^t,x^{t+1},y^{t+1})\times SECH(x^t,y^t,x^{t+1},y^{t+1}) \quad ⑦$$

$$PECH_i^{t+1}(x^t,y^t,x^{t+1},y^{t+1})=\frac{D_i^t(x^t,y^t/\mathrm{VRS})}{D_i^{t+1}(x^{t+1},y^{t+1}/\mathrm{VRS})} \quad ⑧$$

$$SECH_i^{t+1}(x^t,y^t,x^{t+1},y^{t+1})=\frac{D_i^{t+1}(x^{t+1},y^{t+1}/\mathrm{VRS})}{D_i^{t+1}(x^{t+1},y^{t+1}/\mathrm{CRS})}\times\frac{D_i^t(x^t,y^t/\mathrm{CRS})}{D_i^t(x^t,y^t/\mathrm{VRS})} \quad ⑨$$

因此，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分解成纯技术效率的变化（PECH）、规模效率的变动（SECH）和技术进步的变化（TECH）三个部分，即：

$$TFPCH=TECH(x^t,y^t,x^{t+1},y^{t+1})\times PECH(x^t,y^t,x^{t+1},y^{t+1})\times SECH(x^t,y^t,x^{t+1},y^{t+1}) \quad ⑩$$

其中，TFPCH、TECH、PECH 和 SECH 的值大于 1，分别表示从 t 期到 t+1 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改善和规模经济，反之则反是。这里的规模经济就是本研究中意欲主要考察的指标，并且，通过计算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可以得到额外的好处，那就是顺带考察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的利用情况。

(54) 这里的规模经济值，本文采用的数据是基于 DEA 方法计算出来的规模效应变动率。具体数据计算时，定义 1999 年的规模经济值为 1，计算出 2000—2012 年的逐年相对规模效应变动率，以此值作为此处的规模经济值。

和知识溢出效应两个变量来对产业外部性进行衡量。

1、劳动市场溢出效应。根据 Dumais(2002)、Rosenthal and Strange(2001)的研究，使用一个产业中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数量占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代表产业的外部经济性。这里借鉴这一变量来代表劳动市场的溢出效应，用 $Et_{i,t}$ 表示第 t 年第 i 个产业中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占该产业总职工人数的比例 [55]。通过对《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的整理，我们计算出了 2000—2012 年 30 个产业的劳动市场溢出效应数据。

2、知识溢出效应。在产业外部性中，产业间的知识溢出效应最为明显。而研发密度也是一产业知识溢出效应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这里用研发费用除以销售额表示研发密度，定义其为 $R\&D_{i,t}$，表示第 t 年第 i 个产业的研发密度。由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从 2003 年才开始公布分行业的 R&D 费用支出数据，之前公布的只是分行业的科技费用支出。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连续性，本文用科技费用支出作为研发费用的替代变量。在此基础上，计算出 2000—2012 年 30 个行业的研发密度。

四、产业主导性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主导性产业有助于政府通过其以调节宏观经济稳定，同时也有助于一国产业竞争力的培育和提高。因此，一国政府都会倾向于利用国家资本来培育主导性产业，继而产业主导性的强弱也就影响着国有资本的分布。

按美国经济学家华尔·惠特曼·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对主导产业的定义，所谓主导产业是指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那些本身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且能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的产业。因此主导产业具有高创新率、高增长率、明显的市场需求规模、效益突出、产业关联效应和带动力较强的特征。而产业主导性强弱的主要衡量指标有：需求收入弹性、产业发展潜力、生产率上升率。

1、需求收入弹性。所谓需求收入弹性是指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前提下，某一产品的需求增长率与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之比。需求收入弹性系数

[55] 白重恩（2004）和郝书辰、蒋震（2007）都曾用这一变量作为劳动力市场溢出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的衡量指标。但是用这一指标衡量知识溢出效应欠妥，所以，本文只用这一指标来衡量劳动力市场的溢出效应。

=某一产业产品的需求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需求收入弹性高的产业体现了该产业产出需求增长对收入增长敏感程度高，也表明该产业具有强劲的市场需求动力和社会发展动力。这里的需求增长率，用该产业销售额增长率近似替代。相应地，定义需求收入弹性用上文的 $Ei_{i,t}$ 表示。

2、产业的发展潜力。产业的发展潜力可由其盈利能力来衡量，而在盈利能力指标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工业成本利润率，其能很好地反映产业的发展潜力。这里把工业成本利润率定义为 $Pro_{i,t}$，代表第 t 年第 i 个产业的工业成本利润率。该数据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可以直接获取。

3、生产率上升率。这里的“生产率”是指全要素生产率，即产出对全部投入要素之比。造成生产率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技术进步速度。而主导产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技术进步率高，为此，用技术进步率这一指标来作为主导产业的一个衡量指标。这里的技术进步率仍然采用“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分解法获得，用 $Tech_{i,t}$ 表示，代表第 t 年第 i 个产业的技术进步率 [(56)]。

五、要素市场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行业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则国有资本的比重将趋于减少。而市场化程度通过一系列指标体系进行衡量 [(57)]。而要素市场化的程度是衡量市场化程度的一个显著指标，其也是影响国有资本产业分布的重要因素。这里选取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来衡量要素市场化。

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借鉴樊纲，王小鲁（2003）的研究，采用较易取得的金融机构短期贷款中向非国有经济部门贷款(包括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私营企业贷款、外资企业贷款)的比例来近似反映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相应地，定义其为 Cl_t [(58)]，表示第 t 年金融机构短期贷款中向非国有经济部门贷款的比例。

六、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

---

(56) 此处的技术进步率计算方法同上文规模效应变动率的计算方法。具体数据计算时，定义 1999 年的技术进步率为 1，计算出 2000—2012 年的逐年相对技术进步率。

(57) 详见樊纲、王小鲁（2003）。

(58) 指标 Cl_t 和 Ge_t 只能获取年度数据而无法获取不同产业的年度数据，为此，同年度每个产业的数据都选取该年的年度数据。

一定时期内，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减少，将有利于国有资本退出，即与国有资本产业分布比重呈负相关关系，定义其为 Ge_t[9]，表示第 t 年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这里用国家财政支出除以国内生产总值，从而计算出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同时，由于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与国有资本分布比重间可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为此，在模型中我们引入了 Ge 的二次项作为解释变量，以检验因变量和解释变量间是否存在 U 型或倒 U 型关系。

表 5-1 变量的定义和符号

变量	定义	符号
1、产业内国有资本比重		
1a 产值比重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产业总产值	$SSOE_{i,t}$
2、自然垄断程度		
2a 沉没成本	总的固定资产规模/企业数量	$Sc_{i,t}$
2b 需求收入弹性	产业产值的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	$Ei_{i,t}$
2c 规模经济	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出的“规模效率”	$Sech_{i,t}$
3、产业外部性		
3a 劳动市场溢出效应	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数量/产业就业总人数	$Et_{i,t}$
3b 知识溢出效应	研发费用/总销售额	$R\&D_{i,t}$
4、产业主导性		
4a 需求收入弹性	产业产值的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	$Ei_{i,t}$
4b 产业发展潜力	工业成本利润率	$Pro_{i,t}$
4c 生产率上升率	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出的“技术进步率”	$Tech_{i,t}$
5、要素市场化		
5a 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	向非国有经济部门贷款/金融机构短期贷款	Cl_t
6 政府支出比	**政府支出/国内生产总值**	Ge_t

表 5-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2000—2012 年）

变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观测值	样本数
SSOE	0.329891	0.257673	0.988994	0.004942	240	30
SC	2.378045	0.275478	70.73464	0.005548	240	30
EI	2.523238	2.420544	7.055720	-2.632573	240	30
ET	0.000822	0.000354	0.013659	3.17E-06	240	30
R&D	0.000373	0.000121	0.004995	2.44E-06	240	30

PRO	7.882964	5.020000	102.7600	-1.404975	240	30
TECH	1.072146	1.063500	1.366000	0.882000	240	30
SECH	1.002363	1.000000	1.368000	0.719000	240	30
CL	0.244278	0.242533	0.269734	0.222884	240	30
GE	0.129601	0.127898	0.149003	0.104487	240	30

5.3 模型的构建和计量结果

5.3.1 模型构建

根据上文中给予的变量设定，构建如下模型：

$$\mathrm{SSOE}_{i,t}=\alpha+\beta_1\mathrm{Sc}_{i,t}+\beta_2\mathrm{Ei}_{i,t}+\beta_3\mathrm{Et}_{i,t}+\beta_4\mathrm{R\&D}_{i,t}+\beta_5\mathrm{Pro}_{i,t}+\beta_6\mathrm{Tech}_{i,t}+\beta_7\mathrm{Sech}_{i,t}+\beta_8\mathrm{Cl}_{i,t}+\beta_9\mathrm{Ge}_{i,t}+\beta_{10}(\mathrm{Ge}_{i,t})^2+\varepsilon_{i,t}$$

在我们的模型中，把市场化程度和政府支出额度列为外生制度变量，因此在做检验时首先不把这两个变量引入，而是只做了产业特质对国有资本比重影响的估计。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引入市场化程度和政府支出比重这两个变量，以进一步检验其对国有资本比重的影响。

关于面板数据模型的选取。考虑到各个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希望截距项能够反映一定的个体特征，因此我们采用变截距模型。又截距项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再加上考虑到数据集的特点[59]，从定性的角度出发，固定效应更适合本模型的估计。似然比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结果也支持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同时，为了减少由于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我们进一步选择截面加权（Cross Section Weights）的固定效应模型，即使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相关变量参数的估计。

在进行回归之检验之前，我们先将各个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分别采用了 LC 和 ADF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各个变量都通过了单位根检验。

5.3.2 计量结果及分析

表 5-3 国有资本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2000—2012 年 固定效应模型）

[59] Heckman and Macurdy(1980)认为当年数据足够长时（例如超过 8 年），固定效应模型估算值的非一致性不很严重，而我们数据集的时间跨度刚好为 8 年。

因变量国有资本分布比重 SSOE						
模型	1	2	3	4	5	6
Sc	-0.0031 （0.191）		-0.0018 （0.379）		-0.0030 （0.113）	-0.0020 （0.289）
Sc 滞后一期		-0.0107 （0.0003）		-0.0087 （0.002）		
Ei	-0.0088 （0.0004）	-0.0094 （0.0020）	-0.0089 （0.002）	-0.0074 （0.008）	-0.0047 （0.186）	-0.0075 （0.0047）
Et	19.4913 （0.000）	9.2153 （0.027）			13.0455 （0.004）	0.1871 （0.050）
Et 滞后一期			14.0091 （0.000）	13.2290 （0.0001）		
R&D	38.2373 （0.0001）	48.5096 （0.0006）			14.7882 （0.078）	4.3357 （0.049）
R&D 滞后一期			25.8178 （0.002）	22.4957 （0.007）		
Pro	-0.0045 （0.002）	-0.0080 （0.000）	-0.0020 （0.128）	-0.0064 （0.0005）	-0.0020 （0.101）	-0.0038 （0.0006）
Tech	-0.0350 （0.133）	-0.0659 （0.100）	-0.0679 （0.094）	-0.0877 （0.029）	-0.1081 （0.022）	-0.0213 （0.0735）
Sech	-0.0569 （0.082）	-0.0242 （0.609）	-0.0612 （0.217）	-0.0466 （0.349）	-0.0968 （0.062）	-0.1112 （0.006）
Cl					-1.6331 （0.000）	-2.1439 （0.000）
Ge						71.2984 （0.000）
Ge 的二次项						-213.1413 （0.000）
Adjusted R-squared	0.978	0.975	0.975	0.975	0.965	0.975
F-statistic	297.195	231.682	224.916	229.293	181.016	245.097
Obs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注：小括号内为 p 值。

我们的基本检验结果如上表。模型 1 旨在检验产业特征对国有资本产业分

布比重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

一、产业平均企业规模对国有资本分布的比重呈较显著的负效应，这说明国有资本分布比重比较高的产业中企业规模并不大，即沉没成本比较高的产业中国有资本所占的比重并不高。这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国有资本的自然垄断假说。

二、需求收入弹性对国有资本分布的比重呈显著的负效应，这与自然垄断产业中产品具有比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相矛盾。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可能有：当前国有资本分布比重比较高的产业的自然垄断属性并不强，多是基础性产业；也可能是因为当前国有资本控制的资源性垄断产业中产品的价格多受政府的管制，导致价格一定程度扭曲不能很好地反映真实的市场需求。

三、规模效应变动率对国有资本分布的比重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说明国有资本分布比重较高的产业其规模经济效应或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不明显，进一步证实国有资本分布比重比较高的产业自然垄断性不强。这和上述两点一样，一定程度上都没有证实中国国有资本分布的自然垄断假说。但这并不能说明自然垄断假说不成立，只是证实了中国国有资本分布比重高的产业并非自然垄断程度高的产业，有相当部分还在竞争性领域，这需要进一步的退出和集中。这也应是当前和未来中国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方向。

四、当期劳动力市场的溢出效应和知识或技术溢出效应对国有资本的比重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在具有较强外部性的产业，国有资本的比重是比较高的。这样基本验证了外部性假说，说明当前中国国有资本承担着弥补市场失灵的责任。

五、成本利润率与国有资本的比重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这说明当前国有资本比重高的产业盈利能力并不强，也进一步说明这些产业的产业主导性不显著。这与国有资本调整战略中“做强”的目标有一定的距离，这也应该成为下一步国有企业调整和发展中着重考虑的问题。当然，另外一种解释也具有合理性，即当前国有资本多分布在关乎国计民生的资源性行业，这类行业具有显著的产业关联性和外部性（我们的检验也证实了这点），他们不把盈利作为第一目标，而是追求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

六、技术进步率以及规模效应变动率对国有资本分布的比重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之所以出现这种负效应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率和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从而使得国有资本比重比较高的产业其技术进步率

和规模经济效应不显著；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当前国有资本比重比较高的产业中主导性产业占的比重不高。

再结合需求收入弹性对国有资本分布的比重呈显著的负效应，进一步说明，国有资本分布比重比较高的产业多是基础性产业或其他，主导性产业占的比例比较低。未能验证产业主导性假说。这表明，中国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下一步的方向应该是朝着产业主导性强的产业进入和集中。

模型 2 用 Sc 的滞后一期替换 Sc，即使用滞后一期的平均企业规模作为自变量，检验的结果显示出有趣的现象：滞后一期的平均企业规模与国有资本比重呈显著的负相关性，我们继续以滞后二期的平均企业规模为自变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和滞后一期相似[60]。这一检验结果与郝书辰、蒋震（2007）的检验结果相似，即产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越大，国有资本分布比重越低，退出越充分。这种现象可能的解释是："对于平均固定资产较高的产业，大部分属于制造业产业中垄断程度较大的产业，与其他竞争性小规模企业相比，这些产业改制时间较早，而且退出渠道较多，那么，国有资本退出较充分。市场结构越集中的产业越可以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退出，而竞争性强、市场结构分散的产业反而无法实现有效退出，这种态势是和中国的转轨特征密切相关"[61]。

模型 3 同时引入了 Et 和 R&D 的滞后一期，以进一步检验外部性对国有资本分布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劳动力市场溢出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对国有资本分布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政府在国有资本调整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产业的外部性因素。进一步验证了模型 1 中外部性假说的成立。

模型 4 同时引入了 Sc、Et 和 R&D 的滞后一期，检验结果同模型 1 相近。进一步说明，沉没成本、外部性对国有资本分布具有长期影响。

模型 5 以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主体的短期金融贷款比例为控制变量，结果表明该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金融部门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短期信贷额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国有资本分布的比重，其原因在于，信贷额度的增加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这证实了市场化假说，即市场化程度越高，国有资本分布的比

---

[60] SC 滞后二期替换 SC 检验的系数和 p 值为-0.0045（0.0036）。同时，为了保持足够的样本量，我们并未做滞后三期的检验。

[61] 这一解释引自郝书辰、蒋震（2007）。

重就越低。同时也说明，当政府给予非国有经济主体的激励程度较高时（如降低短期贷款利率），会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国有资本的退出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市场化假说。

模型 6 以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例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该系数显著为正，Ge 的二次项检验结果显著为负。说明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例对国有资本分布的比重呈显著的正效应，但这种效应是递减的，即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与国有资本比重呈倒 U 型关系。这是因为，对于政府来说，政府支出过多使政府必须维持一个较高的支出水平，为此，政府需要持有更多的国有资本以提供高额的开销，而政府高昂的支出费用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国有资本的退出，不利于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的优化。因此，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府支出，这样有利于国有资本的退出，但不能过度的减少政府支出。这验证了政府支出假说。

5.4 中国国有企业的"越位"与"缺位"

中国的国有企业既存在越位的问题，又存在缺位的问题。

根据中国的宪法，中国应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市场当事人进行分散决策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国有企业的存在应当主要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因而国有企业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绝不应当国有企业"包打天下"。所以国有企业不能把自己等同于市场经济中一般的企业，完全受利益和利润的驱动。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垄断企业还必须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是它们必须作为国家战略规划的部门发挥作用，成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对外部失灵进行调节的主要依靠力量、反危机的重要力量、抗击国外垄断势力的重要力量以及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等。中国国有大型垄断企业改革过程的主要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尽量减少政府利用国有企业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实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策。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国有企业存在的越位现象。例如在 2008 年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反危机中做出重大贡献，显示了国企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部分国有企业也和其他一般民营企业那样，涌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被社会认为是"与民争利"，

同时增加了宏观调控的困难，国有企业的这种利益和利润导向做法，使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压制，社会“国进民退”的反应非常强烈。

国有大型垄断企业还存在“缺位”的事实。中国国有企业应当在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发挥独特、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到，在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前途的新型产业的发展方面，在关乎经济稳定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公共产品等等方面，中国的国有企业却显露出严重不足的局面。

根据上面的论述和建议，在国有企业的分布问题上的政策建议

一、国有企业应严格进入管理 在市场准入中，凡是非涉及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等行业和部门，国企不宜进入。现在有“凡是国家没有明令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的行业和部门，都应当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说法，因此应当清楚国有垄断企业的行业和部门限制。

二、在市场准入方面，应尽力促进竞争，努力保持对在位企业的压力。

三、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赋予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任务的同时，必须强调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目标问题，突出过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全民属性。

四、密切注视科学和技术进步迅猛发展过程中对国有企业分布的影响问题。因为，科技进步可能把原来的属于自然垄断的行业和部门变成更具竞争性的行业，从而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应受到重新检验和调整。并且国家规制机关应当因应技术变革创新所带来的市场变化和竞争格局的变化，努力保持竞争格局，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形成更为积极的竞争性市场。

五、在新的技术革命和技术变化中，在增量改革中打破沉闷的部门封锁，行业封锁。

六、在经济发展中促进部门和行业间的竞争，进一步促进竞争，打破垄断，提高经济效率。例如在铁路打破垄断发展高铁中，铁路与公路和航空之间的竞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如何因应这些新的变化，促进新的竞争格局，新的市场准入，调整国有企业的分布就成为重要问题。

5.5 小结

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是中国政府当前和今后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环节。因此，分析影响国有资本产业分布的因素在当前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的研究表明，国有资本的调整既受到产业自身特征的影响，也受到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更受到政府效用目标和非国有企业效用目标的影响。只有从产业特征出发，协调好政府效用目标和非国有企业效用目标，努力推进市场化进程，营造公平、开放的竞争环境，才能使国有资本在一些领域顺利退出的同时注入非国有资本，才能使国有资本在另一些领域集中发挥其应有职能，最终形成合理的国有资本布局。

关于本文的不足。作为计量分析，本身就存在着样本范围、变量选择和计量方法等诸方面的局限，本文也不例外。文中选取了影响国有资本分布的五个方面因素，这五个方面的因素是在既有理论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挖掘而来的，可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事实上，影响国有资本分布的因素应该并不仅限于本文所列举的五个方面，本文也只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对其中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因素进行了检验，对国有资本分布的经验研究进行了初步尝试。随着国企改革实践的进展，国有企业改革理论必将有新的突破和发展，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认真思考、不断研究。

第六章 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对国有企业发展现状的研究和总结，不仅包括考察国有企业在组织管理效率、市场竞争化程度、技术创新等方面是否取得了极大改善和进步，而且包括对国有企业生产活动相关指标如何变动的衡量。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指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时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销售总额与投入要素的成本之比。从本质上来说也就是产出投入的比值。这个指标蕴涵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是否存在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改善、规模经济和纯效率改善。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在只考虑“好”产出（例如工业总产值）的情况下大于 1，那么基本说明企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在同时考虑“好”产出和“坏”产出（例如废气废水的排放）的情况下就不能盲目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大于 1 是好还是坏，就要根据具体情况和所选取的指标进行具体分析。

随着生产率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关于它的测算方法也在不断的被修正和改进。在生产率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学家们在对其进行测算时所使用的方法也不相同，其中使用比较普遍的有生产函数法、索洛余值法、利润函数法、超越成本函数法和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测算法。这些测算方法虽然在生产率理论中受到广泛推广，但是每种方法所选用的生产活动的指标存在差异。所以在对生产率进行测算时可以根据实际测算的需要和研究侧重点的不同选取恰当的测度方法。

本文在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测算时根据研究的需要选择了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的测算方法。在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测算时，根据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和相关行业的数据可靠性和可获得性，选取了国有企业中的 36 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并选取这 36 个行业 2001 年至 2013 年之间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其中 2013 年的值为预测值）。在此基础上分别考虑了只存在“好”产出和“好”产出“坏”产出同时存在两种情况下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状况。本研究中的“好”产出选取每个行业的工业总产值作为衡量指标，“坏”

产出选取每个行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衡量指标。然后根据数据包络分析软件运行得出实证结果，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对已得数据进行统计性描述，并按生产率变动幅度大小对这些行业进行分类。便可以得出在两种情况下（即只考虑“好”产出和“好”产出“坏”产出同时考虑的情况下）36 个行业中生产率变动的具体情况。

6.1 研究方法——基于 DEA 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

6.1.1 基本概念

在对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阐述之前，首先对几个关键性的概念予以说明：

决策单元

在生产活动中经常会对同类的行业、部门或者单位进行评价，其中每个部门或者单位称为一个决策单元或者叫做决策单位（Decision Making Unit，简记为 DMU）。在本文中将研究中所选取的 36 个样本行业中的每个行业视为一个决策单位。

二、距离函数

在生产活动中表示实际生产状态与能达到的最优生产状态之间差距的函数。距离函数可以分为面向产出的距离函数和面向投入的生产函数。面向产出的距离函数是在既定的投入成本下实际产出水平与所能达到的最优产出水平之间的差距；面向投入的距离函数是在既定的产出水平下实际的投入成本与所耗费的最低投入成本之间的差距。本文研究主要采用面向投入的距离函数方法

三、生产率分解

本文在对生产率进行测算时需要先将其进行分解，然后通过考察各组成部分的变动来测算生产率的变动。在本文中将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部分。而技术效率又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也即是生产率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三个部分。

6.1.2 基本思路

我们在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测算时选取一些行业，并假设每个行业为一个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简记为 DMU），用（x ,y ）来表示某个行业的生产活动，其中 x 表示输入，y 表示输出，则 (x^t,y^t) 和 (x^{t+1},y^{t+1}) 分别表示该行业在时期 t 和时期 t+1 的输入和输出量，如果参考 Fare 等（1994）提出的生产率的测算方法，采用面向投入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则：

$$M_i^t = D_i^t(x^t,y^t)/D_i^t(x^{t+1},y^{t+1}) \quad ①$$

$$M_i^{t+1} = D_i^{t+1}(x^t,y^t)/D_i^{t+1}(x^{t+1},y^{t+1}) \quad ②$$

其中 $D_i^t(x^t,y^t)$ 和 $D_i^t(x^{t+1},y^{t+1})$ 称为距离函数，分别表示第 i 个行业同时以 t 时期的技术水平为参照的条件下 t 期和 t+1 期的距离函数，同理 $D_i^{t+1}(x^t,y^t)$ 和 $D_i^{t+1}(x^{t+1},y^{t+1})$ 分别表示了在 t+1 时期的技术水平下 t 期和 t+1 期行业 i 的距离函数。M_i^t 和 M_i^{t+1} 分别表示从 t 期到 t+1 期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的变化程度。考虑到不同时期相关因素会发生变化，从而会对生产率指数产生影响，我们会采取通过计算不同时期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的几何平均数来表示。根据这一思想，，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从 t 期和 t+1 期的变动为：

$$M_i^{t+1}(x^t,y^t,x^{t+1},y^{t+1}) = \left\{\frac{D_i^t(x^t,y^t)}{D_i^t(x^{t+1},y^{t+1})} \times \frac{D_i^{t+1}(x^t,y^t)}{D_i^{t+1}(x^{t+1},y^{t+1})}\right\}^{\frac{1}{2}} \quad ③$$

按照之前对生产率所做的分解，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又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化（EFFCH）和技术进步的变化（TECH），也即是：

$$M_i^{t+1}(x^{t+1},y^{t+1},x^t,y^t) = TECH(x^t,y^t,x^{t+1},y^{t+1}) \times EFFCH(x^t,y^t,x^{t+1},y^{t+1}) \quad ④$$

$$TECH_i^{t+1}(x^t,y^t,x^{t+1},y^{t+1}) = \left\{\frac{D_i^{t+1}(x^{t+1},y^{t+1})}{D_i^t(x^{t+1},y^{t+1})} \times \frac{D_i^{t+1}(x^t,y^t)}{D_i^t(x^t,y^t)}\right\}^{\frac{1}{2}} \quad ⑤$$

$$EFFCH_i^{t+1}(x^t,y^t,x^{t+1},y^{t+1}) = \frac{D_i^t(x^t,y^t)}{D_i^{t+1}(x^{t+1},y^{t+1})} \quad ⑥$$

进一步地，把技术效率也进行分解：纯技术效率的变化（PECH）、规模效率的变动（SECH），用公式表示为：

$$EFFCH(x^{t+1},y^{t+1},x^t,y^t) = PECH(x^t,y^t,x^{t+1},y^{t+1}) \times SECH(x^t,y^t,x^{t+1},y^{t+1}) \quad ⑦$$

$$PECH_i^{t+1}(x^t,y^t,x^{t+1},y^{t+1})=\frac{D_i^t(x^t,y^t/VRS)}{D_i^{t+1}(x^{t+1},y^{t+1}/VRS)} \quad ⑧$$

$$SECH_i^{t+1}(x^t,y^t,x^{t+1},y^{t+1})=\frac{D_i^{t+1}(x^{t+1},y^{t+1}/VRS)}{D_i^{t+1}(x^{t+1},y^{t+1}/CRS)}\times\frac{D_i^t(x^t,y^t/CRS)}{D_i^t(x^t,y^t/VRS)} \quad ⑨$$

综合可知，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表示为：

$$TFPCH=TECH(x^t,y^t,x^{t+1},y^{t+1})\times PECH(x^t,y^t,x^{t+1},y^{t+1})\times SECH(x^t,y^t,x^{t+1},y^{t+1}) \quad ⑩$$

如果经过测算公式中各个指数的值均大于 1，则反映出从 t 期到 t+1 期的发展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在增长、技术在进步、纯技术效率得到改善和规模经济也得以实现。反之如果各个指数的值均小于 1，则说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技术没有进步、纯技术效率恶化和规模不经济的存在。

6.2 数据说明

由于相关数据还存在残缺，而且一些数据存在不可获得性，所以本文在进行生产率测算时所选择的数据是 2001-2013 年的国有企业中 36 行业的相关数据。数据主要是通过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搜集获得，之后根据本文需要进行分类、整理和计算。在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为了研究的需要和基于数据可靠性的考虑，本文对有些行业的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剔除。

6.2.1 样本行业的选取以及变量的构造

一、样本行业的选取

在搜集数据的过程中发现中国统计部门对于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分行业数据的统计和发布较晚，直到 2000 年才在《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相关数据，并且工业部门两位数行业中的其他采矿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和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这三个行业的数据直到 2004 年才开始公布，因此本研究剔除这三个行业，选取以下 36 个行业：（1）煤炭开采和洗选业；（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3）黑色金属矿采选业；（4）有色金属矿采

选业；（5）非金属矿采选业；（6）农副食品加工业；（7）食品制造业；（8）饮料制造业；（9）烟草制品业；（10）纺织业；（11）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2）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13）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14）家具制造业；（15）造纸及纸制品业；（16）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行业；（17）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18）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9）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0）医药制造业；（21）化学纤维制造业；（22）橡胶制品业；（23）塑料制品业；（2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25）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6）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7）金属制品业；（28）通用设备制造业；（29）专用设备制造业；（30）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1）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3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3）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34）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35）燃气生产和供应业；（36）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62)]。

二、构造相关变量

生产率指数是直接反映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值，因此对生产率指数进行测算时必须要明确所研究企业的投入和产出情况以及以什么作为投入和产出的衡量指标以便带入到生产率公式中进行测算。

首先，关于投入指标的说明。在本文的研究中综合考虑了工业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时虽然生产了大量的产品，能够实现一定的工业总产值[(63)]，但工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废弃物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将工业的产出分为两种，一种是“好”的产出，选取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作为衡量指标；一种是带来环境破坏的产出即“坏”产出，选取每个行业的二氧化硫作为衡量指标 [(64)]。

[(62)] 在每个行业前面有一个数字代表该行业，在以下篇幅中，将用该数字代表该行业，以此来节省篇幅。

[(63)] 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每年的工业总产值根据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 1995 年的不变价格进行平减。

[(64)] 选取 SO_2 指标，是因为该污染物主要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生活中的排放量相对较小，该污染物和工业化生产过程密切相关且具有连续统计性。并且，由于我国并未公布分行业国有及其国有控股企业的 SO_2 排放量，但由于国有企业及其国有控股企业在 SO_2 的排放上和行业的排放高度相关，并且本研

其次，关于投入指标的说明。本文的投入要素选取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两种，其中资本投入选取按行业分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作为衡量指标，并根据历年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按照 1995 年水平进行平减；劳动投入在理论上来说应该选取劳动时间作为衡量指标，但由于数据的不完整性，本文选取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作为衡量指标。

最后，关于样本区间的选取。由于在 2001 年，中国对于二氧化硫排放量的行业统计方式发生了变化，数据的统计模式缺乏统一性，所以本文决定选取 2001 至 2013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行业分析。

6.2.2 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一、产出和投入变量总体统计性描述

表 6-1 产出和投入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观察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工业总产出（亿元）	252	1911.476	2984.9	22.11	20853
SO2 排放量（万吨）	252	46.790	165.2	0.03	1204.1
资本投入（亿元）	252	1154.367	2631.7	5.60	22044
劳动投入（万人）	252	57.484	69.1	1.25	335.3

二、分行业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好”产出——工业总产值

由于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同行业间的变量值大小差别较大，因此可以根据变量值的大小分为两组。图 6-1 是工业总产值较大的第一组，根据起始年份工业总产值的大小，包括（34）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 18 个行业，读者可以根据上文中样本行业前的代码确定具体的行业名称。图 6-2 则是包括（15）造纸及纸制品业等 18 个较低工业总产值的第二组。

通过图 6-1 和图 6-2 可以看出，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 36 个行业的工业总产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34）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27）金属制品业；（35）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上升速度最为显著；也有 5 个行业的工业总产值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它们是：（3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究涉及的规模经济等变量的研究是 t+1 年对 t 年的相对变化程度，因此，用分行业的 SO_2 排放量进行近似计算并不会带来太大影响

电子设备制造业；（10）纺织业；（11）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2）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17）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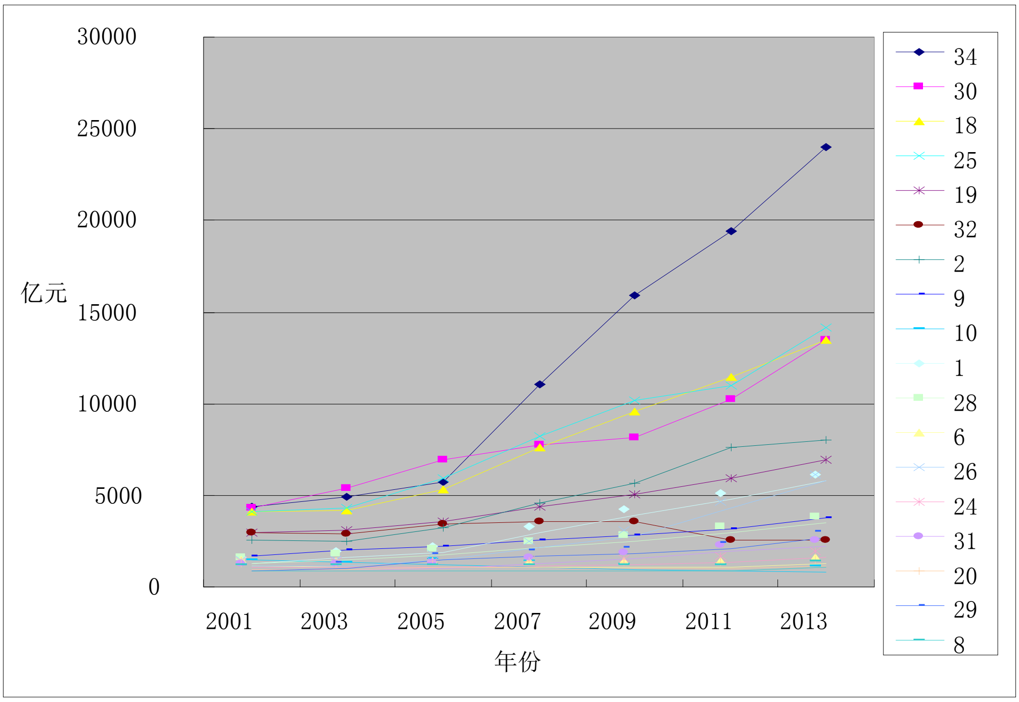

图 6-1 高工业总产值的 18 个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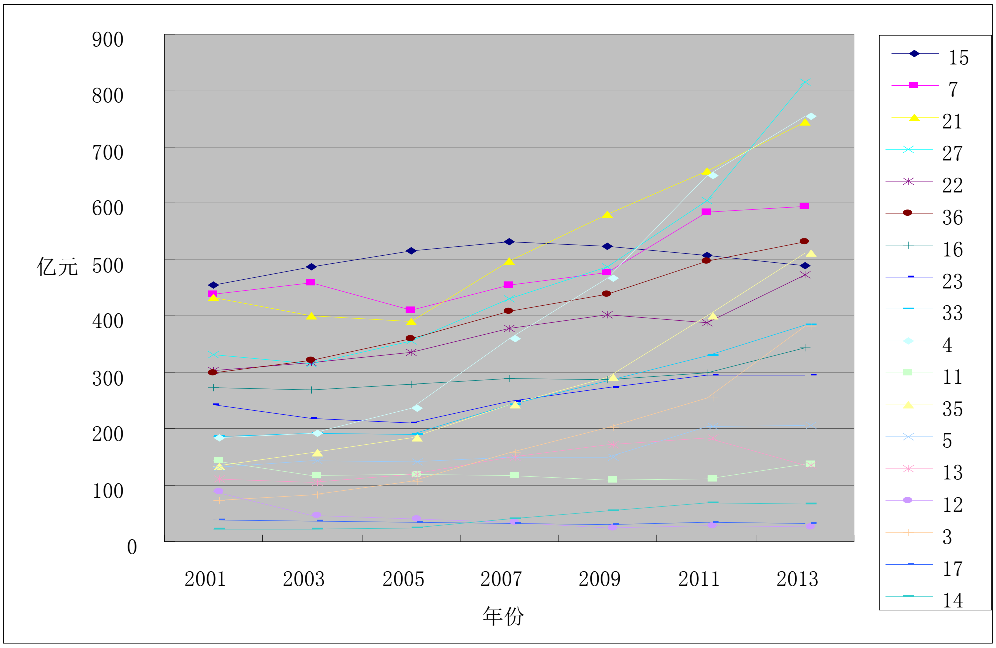

图 6-2 低工业总产值的 18 个行业

三、分行业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坏”产出——SO_2 排放量

根据作图的需要，将分行业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 SO_2 排放量分为 3 组。通过图 6-3、图 6-4 和图 6-5 可以看出，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 36 个行业的 SO_2 排放量在样本年份间的波动较大，总体呈现先急剧上升，后略微下降的态势，这中急剧抬头的原因是由于工业部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略对于环境的保护，后期的略微下降态势则是由于中国政府的逐步严格的环境规制带来的。总体而言，在样本年份期间，2013 年比 2001 年 SO_2 排放量增加的行业有 20 个，按照增加比率从大到小分别是以下行业：(22)、(10)、(32)、(26)、(15)、(24)、(11)、(20)、(12)、(5)、(19)、(13)、(6)、(34)、(7)、(27)、(23)、(18)、(25)、(4)；剩余的 16 个行业则是 2012 年和 2001 年相比，排放量有所降低，根据降低比率的大小依次为：(36)、(17)、(16)、(31)、(33)、(8)、(9)、(3)、(14)、(30)、(29)、(2)、(21)、(28)、(3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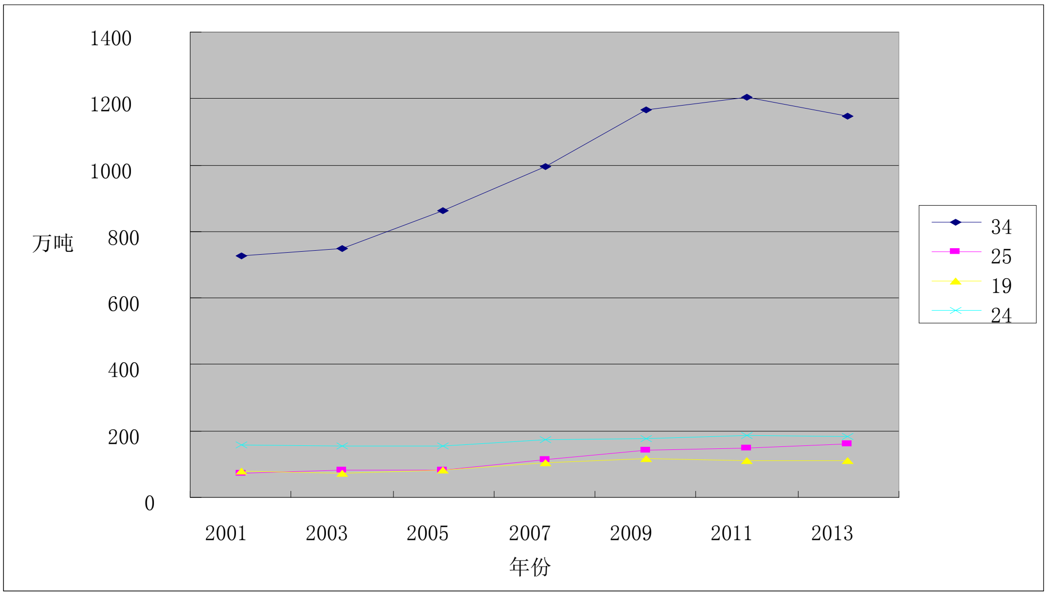

图 6-3 最高 SO_2 排放量的 4 个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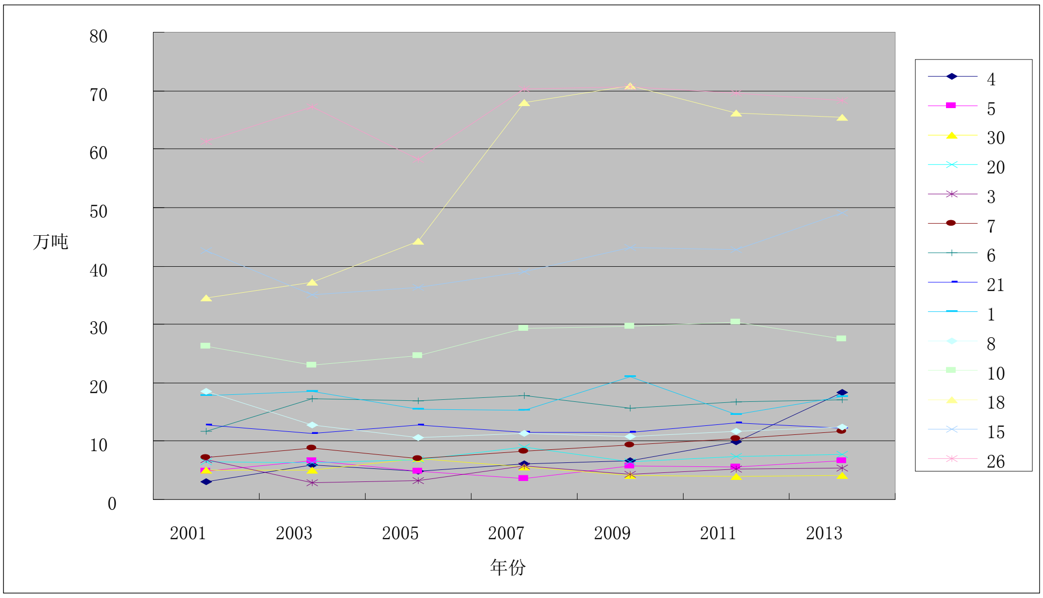

图 6-4 较高 SO_2 排放量的 14 个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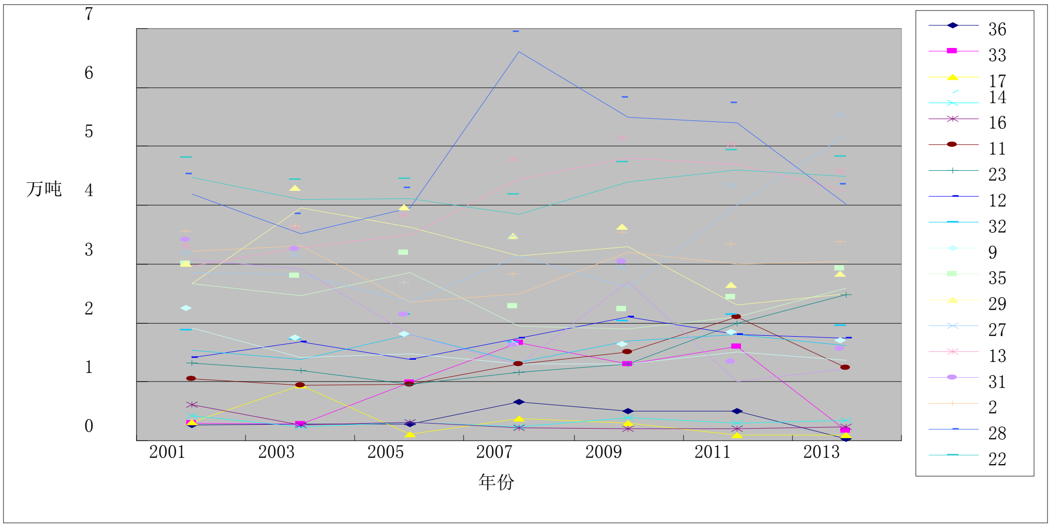

图 6-5 低 SO_2 排放量的 18 个行业

四、分行业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投入

根据作图的需要，将分行业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分为 3 组。根据图 6-6、图 6-7 和图 6-8，可以看出样本年份期间分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呈现分化趋势，起始年份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接近或高于 2000 亿元的行业，在样本年份期间均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起始年份固定资产净值

年均余额在 300-1300 亿元区间的行业，在样本行业里大部分呈现下降趋势；起始年份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在 300 亿元以下的行业，几乎全部呈现持平或者下降趋势。其中，增长比率最大的 5 个行业依次是：（34）、（1）、（3）、（25）和（36），下降幅度最大的 5 个行业则是：（12）、（5）、（10）、（6）和（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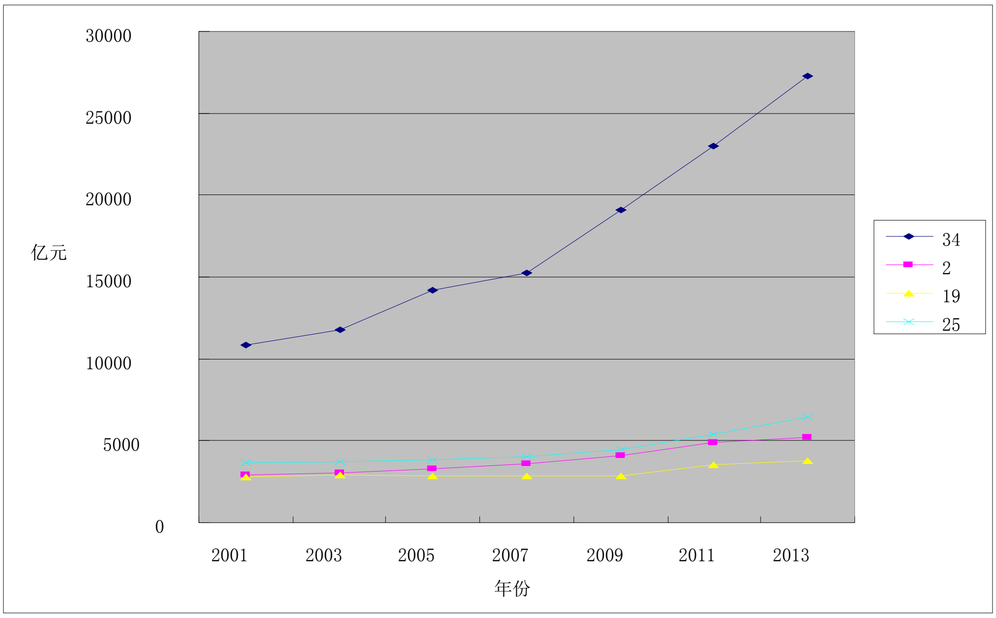

图 6-6 最高固定资产净值的 4 个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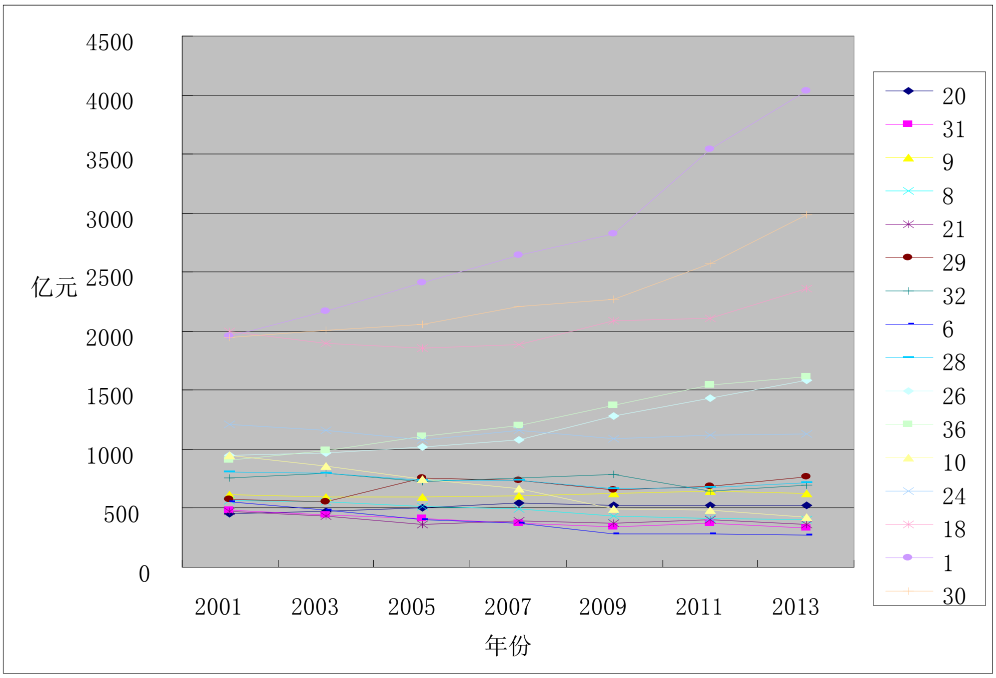

图 6-7 较高固定资产净值的 16 个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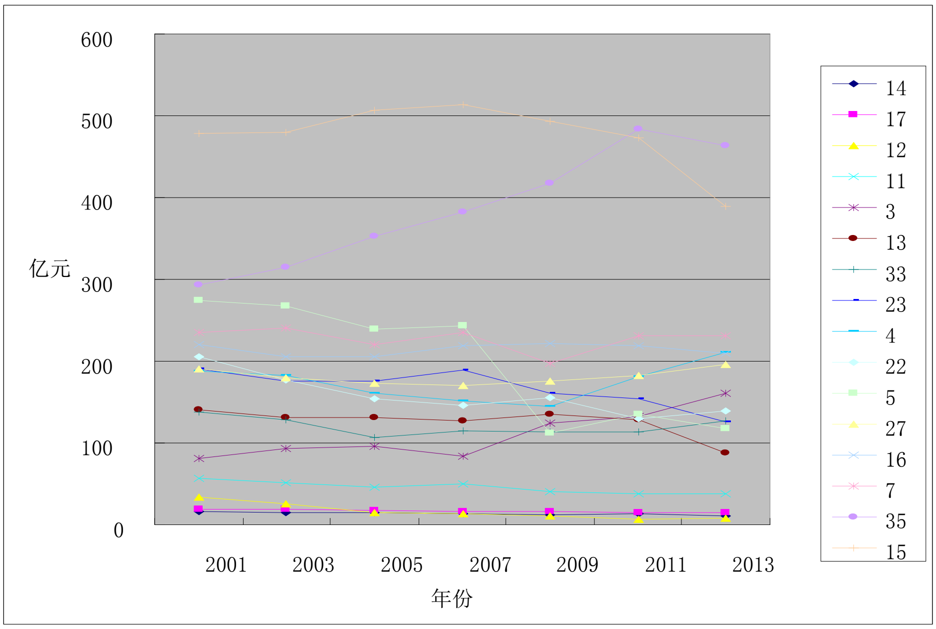

图 6-8 低固定资产净值的 16 个行业

五、分行业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劳动投入

根据作图的需要，将分行业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从业人员分为 2 组。

从图 6-9 和图 6-10，可以看出，工业的 36 个分行业中，仅有行业（2）和（34）的从业人员有所上升，剩余 34 个分行业的从业人员数均持下降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 5 个行业依次为：（12）、（10）、（15）、（6）和（17）。分行业从业人员的总体下降说明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自样本年份开始一直在精简人员，逐步提高劳动者的效率，降低劳动者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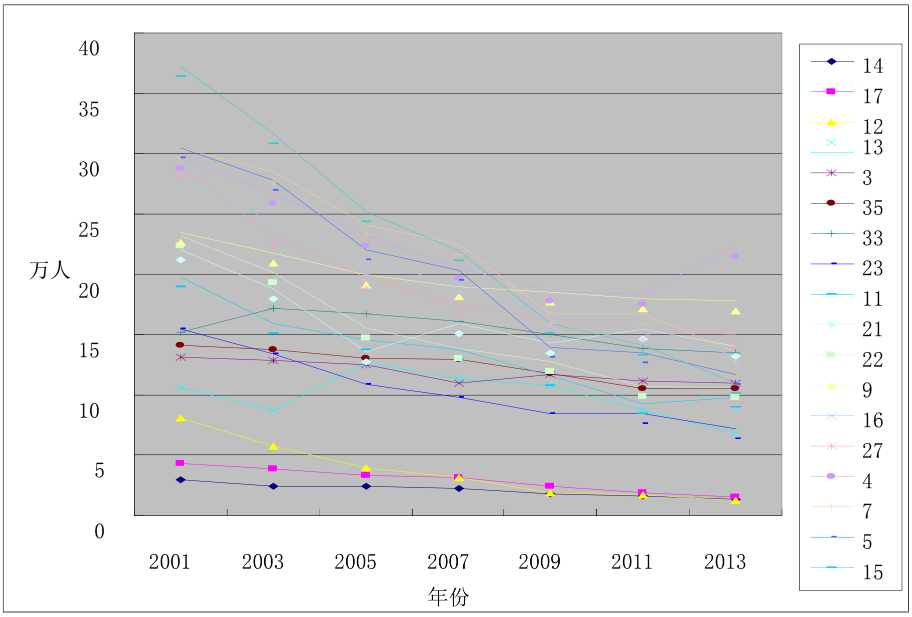

图 6-9 高从业人员的 18 个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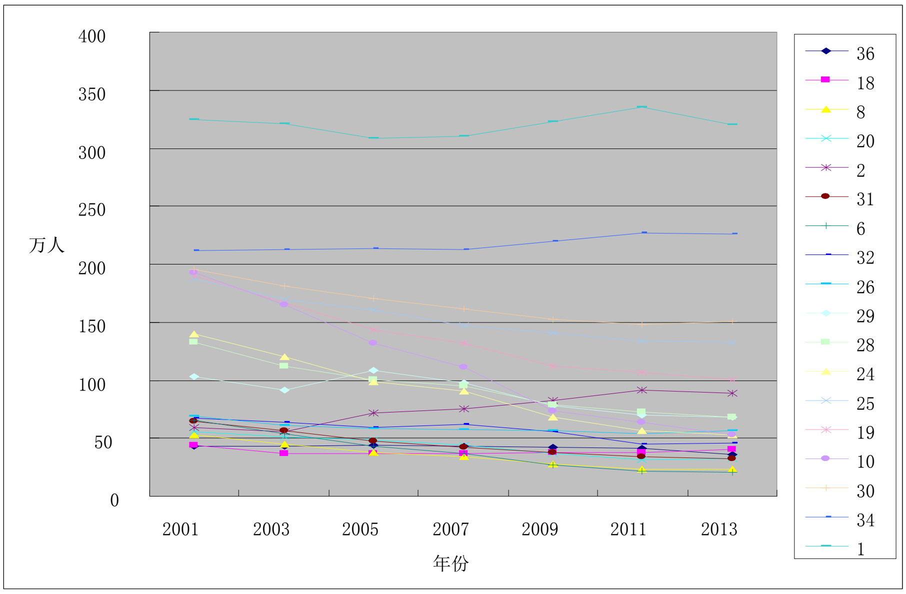

图 6-10 低从业人员的 18 个行业

6.3 实证分析

通过 DEAP2.1 软件对 2001-2013 年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 36 个行业数据进行计算。在计算步骤上，考虑两种情况：

第一中情况：仅仅考虑工业总产值这一个产出，及资本、劳动两个投入，得出相应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纯技术效率的变化(PECH)、规模效率的变动(SECH)、技术效率的变化(EFFCH)和技术进步的变化（TECH）。

第二种情况：同时考虑工业总产值和 SO_2 排放量两个产出，及其资本、劳动两个投入，得到 TFPCH、PECH、SECH、EFFCH 和 TECH。

并对两种情况的相应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6.3.1 一种产出、两种投入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

下表 6-2 为仅考虑“好”产出——工业总产出时的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可以看出，中国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年均全要素生产率除了行业（3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小于 1 以外，其它 35

个行业的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均大于 1，大于 1 的行业表明这些行业的生产率有所上升，小于 1 表明该行业的生产率有所下降；全要素生产率（TFPCH）的分解变量中，技术进步的变化（TECH）全部大于 1，说明所有行业均有较为明显的技术进步，且所有行业的 TECH 均值为 1.094，远大于技术效率的变化（RFFCH）的 1.024，这说明，中国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相对于技术效率的利用来说，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致的。通过把 EFFCH 进一步分解，得到纯技术效率的进步（PECH）和规模效率（SECH），其中，纯技术效率的进步是指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投入要素之间配置效率的变化，总体来说这一指标有所上升，根据指标 SECH 显示，36 个行业中有 25 个行业实现规模经济，3 个行业规模效率不变，8 个行业为规模不经济。实现规模经济的 25 个行业从大到小依次为：（14）、（3）、（13）、（30）、（5）、（35）、（11）、（23）、（4）、（33）、(16)、(22)、(27)、(7)、(21)、(8)、(20)、(31)、(9)、(15)、(24)、(6)、(26)、(29)、(10)；规模经济不变的为：（2）、（18）、（32）；规模不经济的行业从大到小依次为：（19）、（28）、（1）、（17）、（36）、（12）、（25）、（34）。

表 6-1 中国工业部门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分行业的年均 TFP 及分解（单一产出）

行业		TFPCH	TECH	EFFCH	PECH	SECH
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146	1.073	1.068	1.077	0.992
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049	1.179	0.89	0.890	1.000
3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161	1.071	1.084	1.008	1.076
4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202	1.076	1.117	1.085	1.030
5	非金属矿采选业	1.210	1.076	1.125	1.072	1.049
6	农副食品加工业	1.129	1.071	1.054	1.052	1.002
7	食品制造业	1.065	1.069	0.996	0.984	1.012
8	饮料制造业	1.084	1.079	1.004	0.999	1.005
9	烟草制品业	1.150	1.143	1.007	1.002	1.004
10	纺织业	1.029	1.076	0.956	0.955	1.001
11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1.081	1.076	1.005	0.966	1.040
12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1.144	1.076	1.063	1.078	0.986
13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118	1.089	1.027	0.955	1.076
14	家具制造业	1.253	1.076	1.165	1.000	1.165
15	造纸及纸制品业	1.075	1.104	0.974	0.970	1.003
16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行业	1.056	1.070	0.986	0.965	1.022
17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046	1.076	0.972	0.982	0.990

18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177	1.177	1.000	1.000	1.000
19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109	1.108	1.001	1.003	0.997
20	医药制造业	1.013	1.070	0.947	0.943	1.005
21	化学纤维制造业	1.088	1.128	0.965	0.953	1.012
22	橡胶制品业	1.125	1.072	1.049	1.030	1.019
23	塑料制品业	1.119	1.099	1.019	0.980	1.039
2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82	1.069	1.012	1.009	1.003
25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139	1.121	1.016	1.075	0.946
26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180	1.103	1.070	1.067	1.002
27	金属制品业	1.151	1.072	1.073	1.055	1.017
28	通用设备制造业	1.199	1.076	1.115	1.121	0.994
29	专用设备制造业	1.137	1.075	1.057	1.055	1.002
30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135	1.071	1.059	1.008	1.051
31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194	1.075	1.111	1.106	1.005
32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998	1.080	0.924	0.924	1.000
33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108	1.076	1.030	1.002	1.028
34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1.256	1.188	1.057	1.245	0.848
3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166	1.126	1.036	0.990	1.046
3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003	1.125	0.892	0.903	0.988
平均		1.120	1.094	1.024	1.012	1.012

6.3.2 二种产出、两种投入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

在现实中，仅仅考虑工业总产值这个“好”产出是不够全面的，因为，企业在提供“好”产出的同时，也在生产“坏”产出。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在研究企业的投入、产出问题时，应该综合考虑企业的“好”产出和“坏”产出。下表6-3中，就是在考虑双产出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通过将表6-3和表6-2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工业部门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所有行业的年均TFPCH和单一产出时的该值相比上升了0.014，其中有14个行业的生产率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下降[65]， 22个行业的生产率有所上升[66]。从总体上来说，中国

[65] 这14个行业按照降低幅度从大到小依次是：（12）、（14）、（11）、（25）、（7）、（13）、（1）、（15）、（30）、（32）、（9）、（20）、（19）、(35)。

[66] 这22个行业按照提高幅度从大到小依次是：（36）、（17）、（21）、（2）、（26）、（4）、（5）、（31）、（22）、（34）、（18）、（16）、（29）、（3）、（8）、（6）、（28）、（24）、（10）、（33）、（23）、（27）。

工业部门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在污染减排上是有一定成绩的，因为在同时考察“坏”产出排放量时，使得年均 TFP 增长率有所上升。这一结果和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忽略“坏”产出可能会低估实际 TFP 的结论一致。

通过进一步考察 TFP 的分解变量，发现：所有分行业的 TECH 全部都有所上升，全部行业的年均 TECH 上升了 0.022；而分行业 EFFCH 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全部行业的年均 TECH 下降了 0.008；通过把 EFFCH 进一步分解，发现 PECH 总体上下降了 0.010，而 SECH 总体上上升了 0.002.这里的 SECH 就是规模经济，36 个行业中有 20 个行业呈下降趋势[67]，3 个行业的规模经济保持不变[68]，剩余的 13 个行业的规模经济有所上升[69]。在绝对值上，在分行业的年均 TECH，有 15 个行业规模不经济，按照规模不经济的程度排列，它们分别是：（2）、（36）、（32）、（20）、（21）、（10）、（13）、（16）、（11）、（15）、（23）、（17）、（7）、（35）、（8）；规模经济不变的是行业：（14）、（18）这 2 个行业；实现规模经济的有 19 个行业，按照规模经济的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是：(34)、(28)、(31)、(4)、(12)、(1)、(25)、(5)、(26)、(29)、(27)、(6)、(22)、(24)、(30)、(3)、(19)、(33)、(9)。

表 6-2 中国工业部门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分行业的年均 TFP 及分解（双产出）

行业		TFPCH	TECH	EFFCH	PECH	SECH
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138	1.085	1.049	1.062	0.989
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087	1.189	0.915	0.913	1.001
3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174	1.086	1.081	1.013	1.067
4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233	1.088	1.133	1.106	1.024
5	非金属矿采选业	1.237	1.089	1.135	1.081	1.050
6	农副食品加工业	1.139	1.082	1.053	1.050	1.003
7	食品制造业	1.053	1.080	0.976	0.966	1.010
8	饮料制造业	1.096	1.086	1.009	1.003	1.006

[67] 这 20 个行业按照降低幅度从大到小依次为：（14）、（12）、（16）、（11）、（23）、（3）、（4）、(9)、(27)、(13)、(1)、(22)、(7)、(28)、（35）、（26）、（29）、（15）、（20）、（31）。

[68] 这 3 个行业分别是：（18）、（24）、（32）。

[69] 这 13 个行业按照提高幅度从大到小依次是：（34）、（33）、（25）、（36）、（21）、（17）、（19）、（10）、（8）、（5）、（6）、（2）。

9	烟草制品业	1.146	1.146	1.000	1.000	1.000
10	纺织业	1.035	1.087	0.951	0.950	1.002
11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1.060	1.101	0.963	0.941	1.023
12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1.057	1.117	0.946	1.017	0.930
13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107	1.105	1.001	0.933	1.073
14	家具制造业	1.226	1.226	1.000	1.000	1.000
15	造纸及纸制品业	1.067	1.107	0.964	0.962	1.002
16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行业	1.070	1.114	0.960	0.957	1.003
17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220	1.220	1.000	1.000	1.000
18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194	1.194	1.000	1.000	1.000
19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108	1.109	0.999	0.998	1.001
20	医药制造业	1.011	1.080	0.936	0.932	1.004
21	化学纤维制造业	1.142	1.129	1.011	0.989	1.022
22	橡胶制品业	1.145	1.084	1.057	1.040	1.016
23	塑料制品业	1.120	1.118	1.001	0.976	1.026
2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89	1.079	1.009	1.006	1.003
25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123	1.122	1.001	1.025	0.976
26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212	1.104	1.098	1.096	1.001
27	金属制品业	1.152	1.084	1.062	1.049	1.013
28	通用设备制造业	1.207	1.087	1.110	1.119	0.992
29	专用设备制造业	1.151	1.086	1.059	1.058	1.001
30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127	1.080	1.043	0.978	1.066
31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221	1.086	1.124	1.119	1.004
32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990	1.085	0.912	0.912	1.000
33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112	1.117	0.995	0.887	1.121
34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1.276	1.202	1.062	1.000	1.062
3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165	1.141	1.021	0.978	1.044
3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220	1.215	1.004	1.000	1.004
平均		1.134	1.116	1.016	1.002	1.014

6.3.3 小结

经过研究发现不仅分行业的年均生产率存在差异，而且不同行业在同一年份之间的生产率也各不相同，为了更加详细的了解所选取行业的生产率变动情况，本文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对 36 个行业 2001 至 2013 年之间每年的生产率进行详细的比较，由于这一部分的研究方法与本文以上章节关于生产率年

均值的研究方法相似，为避免重复，不再赘述，

本章利用工业部门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 2001-2013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数据包络分析，考察了仅仅有一个“好”产出——工业总产值时的 TFP 及规模经济等分解变量，同时也考察“好”产出和一个“坏”产出——SO_2 排放时的 TFP 及规模经济等分解变量。实证结果表明：（1）两种情况下的 TFP 及其分解变量全部大于 1，表明 2001-2013 年间，工业部门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在总体上实现了 TFP 增长、技术进步、效率的改善和规模经济。（2）当考察 2 种产出时，TFP、TECH、SECH 指标和单一产出相比有所有提高，但是 EFFCH 和 PECH 变量则有所下降。不过，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工业部门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在 2001-2013 年间的减排效果是明显的，因为在考察 SO_2 排放之后，发现 TFP 是提高的。（3）36 个行业在不同年份间的 TFP 及其 SECH 等分解变量不仅在行业间有较大差距(70)，即使是同一行业在相同年份也有较大差距 (71)。

这些实证结果给予我们三个涵义：（1）在用投入产出的相应数据来分析 TFP 等指标时，必须考察污染排放量变化，毕竟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会给人类的生存效用带来变化；（2）在推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应当进一步重视节能减排、建设生态文明，追求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3）无论是政府考察还是学者研究企业和行业的经济效益，都必须进一步重视对于污染物减排的考察，全面衡量一个企业、行业的产出变化。

(70) 由于详细的 TFP 及分解变量结果规模较大，在此不一一列出。

(71) 例如，在考察双产出的情况下：行业（36）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在 2006-2007 年间的 TFP 及其分解变量有很大的变动，原因就在于该行业在 2006 年的 SO_2 排放量为 0.5 万吨，而它在 2007 年时 SO_2 排放量仅为 0.03 万吨，如此巨大的变化，反应在衡量指标上就是 TFP、effch、tech 和 pech 的大幅度增长，但是该行业的 sech 却出现了显著下滑，这表明该行业的 TFP 增长主要是有技术的进步和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引致的，和规模经济无关。

第七章 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变动的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实证结果

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国有企业在改革的进程中是向着有利于为其自身创造良好前景和提高自身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的方向发展的。这主要是依据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在整体上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其分解部分，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也循着逐渐改善的路径变动。生产率及其分解部分之所以得到提高和改善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的，这不仅来源于改革进程中投入要素的增加，还依赖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源的开发、要素禀赋结构的优化、资源有效利用和治理结构的合理化。

7.1 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影响的机制分析

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技术进步被称为是活的推动力，它对企业扩大生产，提高生产效率起着其他因素和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来说，它对生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力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物的方面。

首先，人力方面——人力资本对于生产率的作用。

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对员工进行培训教育，包括在学校接受教育、对在职员工进行的培训、人员的合理调动、对员工的身心健康所做的各种有益活动和人力信息的获得等都属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些投资都可以极为有效的提高人的生产能力，从而提高生产率以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人力资本的增加能够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的增加能够提高劳动者在工作时操作的熟练性，能够为企业的生产带来新思路、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模式以实现更高效的生产要素的组合和合理有效安排、计划工作内容。同时由于员工接受过教育或者获得过相关的培训，所以在一定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能够边干边学，不断的吸取新知识，根据“学习曲线”理论可知这将有利

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产出投入比，也就是提高企业的生产率。

随着科技进步，尤其是高新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生产自动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力资源，尤其智力资源已经对生产活动越来越具有关键性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制造过程，更体现在设计、开发、管理等环节。这些环节极大的影响着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企业的发展前途。正是如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教育和培训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对提高生产率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从深层次来理解，一切生产过程都是生产要素的组合过程，在这一生产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生产设备，就会要求与之相适应（即操作熟练）的劳动者。即便是生产同样的产品，运用的生产方式也是不同的，所以，生产所耗费的劳动的性质也是不同质的，只有教育和培训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使之达到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

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之后不难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近些年来人们的受教育意识的提高是分不开的。从接受教育的角度来说，中国统计部门所披露的相关统计数据表明从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受教育人数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而且从社会中的“考研热”“在职教育热”“进修热”等一些广受人们关注的词眼可以看出人们的受教育意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受教育人群也逐渐扩大，这无疑提高了人们的整体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修养。而且在学习新知识和不断积累已有知识的过程中，有利于创新意识的激发。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员工也正是这些人群中的一部分，所以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的提高和员工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上升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从在职人员的接受培训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十分注重员工业务能力的培养和与时俱进的思想意识，随着技术进步和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的进行，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导向越来越明显，为了使国有企业融入市场当中接受市场的检验，也为了在市场竞争中保持强有力的地位，国有企业积极鼓励和支持其员工接受新思想和新技术。这不仅表现在国有企业积极为其员工配备先进的设备，还表现在通过办理培训班为其员工提供学习新技术和操作新设备、新机器的机会。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本是在提高的。

其次，物质资本的改善与生产率的提高。

人力资本的改善和物质资本的改善时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提

高能够使得新机器、新材料、新工艺的发明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物质资本的提高有利于为生产提供新的生产设备、先进的生产方式，这将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实现。物质资本的改善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新材料，主要是指生产产品时所投入的原材料的材质、规格、质量、价格、大小等品质的改变，以满足特定的生产工艺的要求，采用新材料的目的是获得更低的投入成本；新工艺，也即是新的生产方法。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可以将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以实现资源节约；新产品，这主要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产品功能更加齐全和产品外观更加满足消费者偏好。

新材料的采用可以实现资源节约，资源得到节省也就直接节约了投入要素的数量，所以新材料的采用对生产率的影响是直接的。企业运用新的生产工艺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实现更快、更精准、更高效的生产过程和更高的自动化水平，不仅节约了劳动人员，而且节约了劳动时间，因此对生产率的作用也是极其明显的。新产品由于其新潮的外观和齐全可靠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这将帮助企业开辟新的市场，占取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率。

最后，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改善

由以上分析可知，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改善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这两者的改善又取决于技术进步。因为所谓技术进步其实就是人类在知识领域内的进展，而知识的进展还是要归结于技术进步和科学发现的推进，正是由于技术进步给予人们更宽阔的视野和更恰当的视角才使得科学知识的发现成为可能。这正如丹尼森所认为的那样，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最基本原因是由于知识进展。

7.2 技术效率对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不仅取决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即技术进步，还取决于企业对其已有技术的使用和发挥状况（即技术效率），这二者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都是不可忽视的。如果从长期来分析，技术进步作为企业发展的恒久推动力，是生产率变动的主要来源。如果以企业的短期影响因素

为分析的重点，则作为反映生产潜力发挥程度的技术效率的变动最能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变动。技术效率的高低更多的受管理方法 、经济体制、市场结构、所有制制度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企业现行的相关制度对企业目前拥有的技术适应性越强，越有利于完全释放现行生产技术的潜能，从而提高生产率。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自身的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时密切相关的。所以有必要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首先，所有制度对技术效率的作用。

中国国有企业在与私营企业、混合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进行比较的过程中一直被归为是效率相对低下的企业，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改革以前一直是归国家所有，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和经营权，这种所有制结构导致了信息失灵、委托代理问题、寻租和官员腐败、员工工作态度消极怠慢等一系列问题。但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再到公司制，国家逐渐将权利下放给企业自身，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和经营权不断加强，国有企业逐渐被塑造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这将激励经营者去积极努力的寻求科学有效的管理以使得企业能够科学发展和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而寻求的过程就是对现有技术水平进行科学运用和组织协调的过程，也即是技术效率提高的过程。

其次，规模效率的作用。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内部结构就越来越复杂，企业层级就逐渐增多。如果不能很好的处理好内部复杂的交错关系，将会导致信息传达的速度减慢，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和协调工作失效。而国有企业一直以来被视为层级化色彩相对深重的企业类型，但是在实证研究中依然发现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规模效率得到了改善。这主要归因于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建立了相对之前来说较为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使得企业内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共享，并进行积极有效的劳动分工，进一步突出了国有企业的资金优势，这能够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而且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有利于企业经营者和员工发挥个人积极性，这促使企业内部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实现了国有企业规模效率的改善。

最后，市场结构的影响

在哈佛学派的 S——C——P 分析范式中认为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

行为决定绩效，市场结构是市场绩效的最终决定因素，垄断的市场结构不利于竞争的实现，存在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导致资源配置失效。因此应该建立竞争的市场结构，在竞争的过程中企业具有危机意识和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因此会在生产过程中积极发挥企业已有技术的水平，使得现有技术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和运用，从而提高技术效率。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市场主体的角色将会逐渐建立。国有企业已经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了市场竞争过程中，这使得国有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不再是无忧无虑的完全受国有保护的对象，而是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残酷的成败之争。这种无形但巨大的竞争压力迫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员工努力发挥和运用已有技术条件，减少非效率和技术浪费，这无形中改善了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

总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给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宽阔的发展道路，虽然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企业类型相比在效率方面的表现还不是很突出，这主要是由于一些“遗留”问题的负面影响根深蒂固。国有企业为了寻求发展虽然在不断的改革，但是仍然有一些羁绊国有企业发展的因素存在，从客观来说这些因素的存在改革过程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要看到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从改革的成效来看国有企业在整体上是向前发展的，前进的步伐是矫健的，而且通过改革国有企业的活力确实得到了激发，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显著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上了新台阶，国有企业员工在接受培训教育方面积极主动，一改改革前的懈怠和消极态度，对提高自身素质和职业能力的意识增强，这些现象无疑将会给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这同时也说明了在上一章的实证研究结果是可以用国有企业的现实情况来解释和说明的。

7.3 提高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对策

虽然经过前面章节的分析得出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在整体来说是在上升的，但是与其它企业类型相比，国有企业生产率依然存在着极大的上升空间，这说明国家和国有企业自身可以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实现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更进

一步提高。本章将从国有企业发展的现状出发，针对国有企业当前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存在的问题给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7.3.1 提高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对策目标

再回到生产率是产出投入比这个本质概念上来，我们就可以将提高生产率这样一个对策目标具体分为降低成本或者提高产出这两个子目标，这两个子目标又可以分为降低生产所耗费资源的价值、减少所耗资源数量、提高所销产品的价格或者增加所销产品数量这样 4 个可操作性目标。如果要实现这 4 个目标就需要使企业的生产系统达到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在这种理想状态下能够实现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理清理想状态和非理想状态以为建立具体可行的实践目标做理论指导。

首先，最理想的状态是可使生产率大于 1 的状态，主要包括降低成本（所耗费资源的价格或者数量）提高产出（产品的价格和数量）、降低成本（所耗费资源的价格或者数量）保持产出（产品的价格和数量）、保持成本（所耗费资源的价格或者数量）提高产出（产品的价格和数量）、缓增成本（所耗费资源的价格或者数量）速增产出（产品的价格和数量）、速降成本（所耗费资源的价格或者数量）缓降产出（产品的价格和数量）五种情况。这种理想状态可作为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的对策目标。

其次，非理想状态，也就是使生产率等于 1 的状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提高生产率应避免的对策目标。这种状态包括两种情况：成本（所耗费资源的价格或者数量）与产出（产品的价格和数量）同时上升和成本（所耗费资源的价格或者数量）与产出（产品的价格和数量）同时下降。

最后，当生产率小于 1 时就是企业经营或者生产的极不理想状态，也是国有企业在企图提高生产率时应该极力避免的对策目标。这种极不理想目标体现在以下几种情况中：成本（所耗费资源的价格或者数量）速增产出（产品的价格和数量）缓增、成本（所耗费资源的价格或者数量）上升产出（产品的价格和数量）不变、成本（所耗费资源的价格或者数量）缓降产出（产品的价格和数量）速降、成本（所耗费资源的价格或者数量）不变产出（产品的价格和数量）下降、成本（所耗费资源的价格或者数量）上升产出（产品的价格和数量）下降。

在分析了生产率提高的理想状态和非理想状态及各种状态下的生产情况时，就有助于建立一个清晰、具体、可操作性的对策目标。但是在生产的实践中，企业生产活动的理想状态是很难实现的。实际上，由于国有企业中生产系统的内部影响和外部因素作用的不稳定性，加之与其他企业类型相比国有企业自身仍存在着低效、资源配置不当、信息传达非完整性、委托代理困境的问题，所以企业的整个生产过程很难达到一个完美的理想状态。虽然如此，国有企业仍然应该将这些理想状态作为可想象的对策目标以便激励自己去向着最佳的产出和投入结构努力调整和促进资源整合和技术效率改善。

7.3.2 基于投入的生产率提高对策

按照生产率提高的对策目标将提高生产率的对策分为从两个方面分别阐述。针对目标中的降低成本一项提出能够使得投入要素得到节约的相关对策；针对目标中的提高产出一项提出能够使得产出得到增加的相关对策：在本节中首先阐述与投入相关的一些建议。

一、继续提高国有企业员工的素质，健全在职培训体系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的员工在继承历史优良传统的同时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企业员工应该具备改革意识、竞争意识、服务意识和法制意识，以达到热爱企业、热爱本职、服务大局、忠于职守、遵纪守法、严以律己和务实高效的敬业精神。虽然国有企业员工的素质较之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时代是不断进步的，社会文明是不断发展的，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是不断涌现的，所以社会中的人也应该与时俱进、积极参与到接受文明思想、社会进步元素的学习当中去，以便保持较高的长远素质。这就要求国有企业：

一方面，要根据企业发展及财力状况，逐步增加企业员工的教育投入，为企业员工接受先进思想和新技术提供更多的渠道，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和再教育组织。这就需要企业逐步建立健全多形式、多层次、多样化的职业培训体系。这不仅包括对已有业务进行熟练操作和岗位技能强化的培训和教育，还包括对企业引进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方式的学习和掌握的培训和学习，以及新设备的熟练操纵和职业道德的培养。

另一方面，企业应该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需要适时地实施人才引进计划，因为国有企业自身的员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自身业务方法的惯性依赖和

对已有工作模式的下意识套用，所以在接受新思想和技术时容易出现“穿新鞋走老路”的尴尬局面。这时就需要采取引进新型人才的策略，通过新型人才的引进能够真正的给企业注入新的元素和新的思想，而且能够对老员工起到示范作用，这无疑对提高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有很大的影响力和促进作用。从而能够使得企业员工成为具有高文化素质、高思想素质、高身体素质、高职业素质的优秀劳动力。

二、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劳动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劳动质量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能否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劳动者“三性”的发挥又受劳动目的和动力等激励机制的直接影响。国有企业如果要进一步提高劳动质量，就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在内的激励机制。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一）建立科学有效、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

中国国有企业目前在收入分配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公平不足，这表现在中国国有企业不同级别之间的员工的年薪水平差距比较明显。不同领导层之间的收入也存在显著差距。其二是国有企业的福利保障体系缺乏规范性，由于对企业经营者在位时的报酬和退休后的福利待遇之间存在较大差别，导致国有企业的一些领导和很多员工不愿退休，通过更改年龄等方式来延长自己的工作年限，这导致了“59 岁”现象频频发生。而这些现像不利于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应该建立科学的薪酬制度，处理好各层级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以促进员工“三性”的发挥。

（二)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应逐步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

激励机制的建立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物质激励的建立，国有企业应该在企业得到发展、企业财力增加的同时通过工资和奖金等方式提高职工收入来改善职工的生活水平、提高职工的购买能力，这样，职工的满足程度也即是物质效用水平将会提高，这不仅能够让企业的员工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活，而且有助于为员工奠定夯实的物质基础，能够尽量满足职工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职工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工资、奖金、奖品的提高或增加等方式来实现。

（三）在加强物质激励的同时，精神激励不可忽视。

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是相辅相成的，精神激励对职工的激励作用是物质激

励不可替代的。如果企业在对职工的物质激励不断强化的同时忽视对员工的精神激励，企业职工的身心健康将会逐渐受到损害。因为职工除了追求物质奖励以外还希望个人价值得到承认、才干得到发挥、得到同志尊重、能使领导满意，能够被给予提升的机会等精神激励。如果忽视这些方面的激励，企业职工的精神和工作斗志将会受到打击，这不利于劳动力“三性”的发挥。

三、注重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一个企业进步的源泉和企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技术创新能够带来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能够为企业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和更加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方法，这将会使企业的生产要素实现相对合理的配置、相对优化的要素投入结构，这些合理和优化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中国国有企业目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自主经营权，但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行政性垄断，市场竞争程度有限，这不利于国有企业自身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也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因此国家应对国有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为了将技术进步机制引入企业，所以企业应该进行经营机制的改革，能够真正成为具有引进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实力的主体。

四、积极参加对外交流，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本文已经分析过技术进步能够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优化，进而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所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努力采取包括对外交流在内的多种方式去获得技术进步。由于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国在企业的经营、生产、销售等方面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水平也存在显著的差距。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对外交流也日益频繁，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对外交流和合作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积极分享对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有良好促进作用的知识和技术资源，根据实际发展需要去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并吸取他们失败的教训，使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少走弯路，能够实现高水平的资本利用率。

7.3.3 基于产出的生产率提高对策

基于产出的生产率提高是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如何对产出进行调整使得在成本不变的前提下产出水平相对提高。这与之前提高的生产率提高的对策目标是相符的。一般影响产出的因素包括产品的价格、消费者偏好、产品的质量、

替代品的价格和产品的功能等。本节将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并根据他们对生产率的不同影响程度和不同影响方式提出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一些建议。

一、鼓励新工艺的发明和创造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该积极采用新工艺也即是新的生产方法。企业进行生产活动时所采用的生产方法是否先进对企业的产出水平有直接关系。实践已经证明落后的生产方法只能使企业的发展陷入败局，落后的生产方法体现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生产方式的相对过时、笨拙和低效。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新的生产方法由于其对先进技术的采用和劳动分工的更加合理化，这使得新的生产方法能够比落后的生产方法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已经得到证实，因此企业如果想提高自身的产出水平，应该鼓励新工艺的发明和创造。

二、开辟新市场，占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如果企业的销售渠道和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是始终不变的，那么也就说明企业为市场提供的产品的数量是一定的，企业的产出水平就没有增加的必要，如果企业的投入成本不变的话，最终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也不会得到提高。所以企业要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开辟新的市场，新市场的开辟有助于增加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为了满足这些增加的需求，企业将会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产出规模，提高产出水平，这就直接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行政制约和控制，在市场供给方面也受到政府的相关政策的影响，所以政府应该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性垄断方面进行相关调整，以便赋予国有企业自身更多的参与市场竞争的自由。这样，国有企业才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去开辟新市场。

三、开发新产品

新产品是指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完善产品功能、增加新品种和美化产品外观来提高原有产品的竞争力。市场上各种产品进行竞争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程度的消费者偏好，通过吸引消费者，赢得消费者青睐来提高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市场需求量的提高会刺激产出的增加，从而整体产出水平得到提高。所以满足消费者偏好是一种有效的市场竞争方式。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时候会考虑产品的价格是否合理、质量是否可靠、功能是否齐全、品种是否多样化、外观是否漂亮等几方面的因素。所以为了吸引消费者，企业应该对新产品的研发和扩大投入以便不断推出满足消费者偏好的新产品。

四、加强环保意识、减少污染物排放

中国工业类国有企业在生产出产品的同时排放了大量的废气和废水，这些污染物的排放造成了环境破坏，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长期威胁。因此，近些年来国家的不断的提出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以缓解工业生产中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自从"十一五"规划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以来，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开始加强节能减排力度，通过采用新的工艺、新设备和节能技术改造大大降低了生产过程中排污物的数量。例如武钢在 08 年投入 2 亿元实现了废水的全部回用。作为最大的煤炭集团，神华在 08 年发布的报告中提出将投入 30 亿元节能减排专项资金。至"十一五"末，完成国家发改委累计节能 30.9 万吨标煤的节能考核指标。虽然已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但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还要继续做下去，并且要加大力度。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机制保障、推进绿色转型、淘汰落后产能、加强旧技术的改造和新技术的推广。

第八章 国企改革中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调整

本章根据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提出两个备受关注的问题：通过国企改革，中国的各个行业是否已经形成了合理的市场结构？国企改革是否促进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针对这两个问题本文从实际现状出发，通过对工业部门以及国有企业产业集中度的考察、与美国等相关部门产业集中度的比较，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仍存在不合理的成分，除了石油天然气等行业集中度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之外，大多数行业存在着集中度过低的现状，本文通过对该现象的深入分析，给出了调整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具体思路和原则，指出了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应注意和重视的问题。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是这一改革进程中的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内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具历史意义和最成功的部分。中国的市场结构调整与国有企业改革密切相关。中国垄断行业的改革过程以及市场结构和市场竞争体系的建立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特点是与国企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虽然中国的改革成果显著，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改革攻坚任务还远未完成，中国经济结构中所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或隐含的结构性矛盾还没有解决，其中垄断行业的改革将成为国企改革的重点。

第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各个行业是否已经形成了合理的市场结构？在中国的工业企业 500 强中，国有企业占 70%，资产总额占 73%，分行业来看，一些自然垄断的行业中，特别是在资源类行业，国有大型企业仍占据垄断地位，而非公经济的发展却遇到种种制度性障碍。进入许可难、融资难等问题严重。中国的这种国企独大的市场结构使得市场竞争环境差，未能形成一个多种所有制结构和多种经济结构并存的竞争性的环境，进一步造成了企业效率低，创新能力差，社会福利影响坏，总之，行业绩效很低。

第二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中是否已经形成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一方面中国经济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因而行政性垄断严重，

特别是在资源性行业中的排他性垄断和在基础设施部门中的自然垄断行业，因而企业效率不高；但是另一方面，与西方跨国企业相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普遍规模偏小，产业集中度不高，同构化严重，相当产业存在过度竞争、甚至恶性竞争的问题，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从而有可能会最终导致中国刚从国际金融危机的“乌云”中走出，又步入“二次探底”的陷阱。

结合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可以说，中国经济存在着两种问题交织恶化的现状，在中国大多数行业存在着集中度过低的现状时，少数垄断行业内国有企业又占据着高垄断地位。这就需要在认清中国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国有企业的占比及其效率，从而为进一步深化国有行业改革、优化市场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可能。

8.1 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8.1.1 中国行业的产业集中度相对偏低

在不同的行业，市场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是因为一部分产业属于竞争性行业，另一部分则属于相对垄断性行业。行业本身具备的技术特征决定了不同的市场结构。为了为相应研究提供基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度量市场结构的方法，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以企业规模分布为基础的计量方法——产业集中度，产业集中度也有许多度量方法，如，如 CRn 指数、HHI 指数、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熵指数等，不过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CRn 指数是一种最基本和有效的衡量方法。一般来说，国内外文献中选取某一行业中在产出、收入、从业人员数等指标上排名前四和前八的企业总值占行业对应所有企业总值的比重衡量，即所谓的 CR4 和 CR8。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工业部门除了石油天然气行业等少数行业维持了相对较高的集中度以外，大部分行业的集中度较低。单纯考察中国的产业集中度可能还不能得出更多信息，通过对比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集中度水平，则能更为直观地做出对比分析。总的来说，在多种经济、社会因素的作用下，西方各国市场结构模式经历了一个从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为主体到以垄断市场结构为主体的转变过程，在西方，这些垄断结构主要是经济垄断。表中给出了美国部门年份的 CR4 产业集中度指标，

可以看出美国在上个世纪制造业的集中度普遍来说是逐步提高的。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可以对比美国 1997 年部门行业和 1996 年中国对应行业的 CR4 产业集中度水平，发现在列举的六大行业中，美国的产业集中度水平远远高于中国。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 19 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曾经在追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的过程中经历过一段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调整过程，经过调整后产业结构对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意义重大，奠定了后来西方国家经济的产业结构基础，初步形成了这些国家经济中的重要产业的以垄断和寡头垄断为主的市场结构。正是在那些垄断企业和寡头垄断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完成了历史上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然而，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总体而言还没有经历像美国等发达国家在 19 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历的那种改变或调整。以资本为龙头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整合在中国至今尚未完成，其结果是中国产业整体发展不足，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都没有获得充分的体现。中国虽然在某些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但是另一方面在很多产业和部门中，不公平竞争、过度竞争，甚至恶性竞争却非常普遍。中国的产业集中度现状迫切需要对此做出反思，适度提高产业集中度，不仅有利于优势资源的整合，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还有利于解决产业过剩问题，提高中国在国际中的产业竞争力。

8.1.2 国有企业在行业中的占比和效率比较

自 2005 年至 2009 年，中国工业部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总体来说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占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则并未呈现一致性的变化，所有行业加总后的比重整体呈现了下降趋势，由 2005 年的 0.333，逐年下降至 0.267，下降了 0.065。具体到每个分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占比亦有所差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四个行业在 2009 年的比重和 2013 年的对应值相比有所上升，分别上升了 0.041、0.003、0.124 和 0.023。剩余的 35 个国有及国有控股行业在 2009 年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下降最快的是其他采矿业。

从工业部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平均工业总产值来看，总体来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平均工业总产值在样本年间呈现了上升趋势，但食品制造等行业的动态趋势是呈现了倒“U”型，虽然这些行业2009年的平均工业总产值高于2005年，但在扣除价格因素之后，这种上升的趋势可能并不显著。至于这些行业普遍在2008年之后处在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则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有关。同时，通过数据显示可以看出三资企业的平均工业总产值数据，三资企业的平均工业总产值总体上也出现上升趋势，并且部分行业也呈现了倒“U”型趋势。对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三资企业在平均工业总产值上的大小，我们发现总体上来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平均工业总产值上是大于三资企业的，但在农副食品加工业和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行业上的平均工业总产值小于三资企业。在大部分行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平均工业总产值上的优势地位随着时间推进越发显著，但仍然有少部分行业的优势地位在逐步缩小[72]。

受数据所限，我们并未比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平均工业总产值上的大小。但可以推断出，从总体上来说，国有企业在平均工业总产值上是具备一定优势地位的，从而为国有经济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现创造了可能。然而，国有企业虽然在平均工业总产值上具备一定优势地位，但和国际跨国公司相比，仍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和美国相比，数量上远处于劣势地位。

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在效率指标上，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但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应该可以做的更好，在集中众多优势资源的国有企业中，应当能够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起到主导企业的作用，通过前向效应、后向效应和水平效应，带动相关企业和产业的进步和发展。

总之，通过以上描述，中国市场结构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在市场集中度上，各个行业的产业集中度指标相对较小；其次，在相对较小的产业集中度中，部门行业存在着高国有化比重，但高国有化比重并未真正有效地在高水平上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现存的种种进入壁垒和移动壁垒反而限制了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第三，虽然在部分竞争性行业中国有比重相对较低表面

[72] 受篇幅所限，相关数据并未列出，如需要，可与作者者联系。

上符合了所谓的“国退民进”政策导向，但事实上，民营企业规模的普遍偏小，严重的同构化现象，以及相当程度存在的过度竞争甚至恶性竞争，让我们有理由怀疑过分的降低市场集中度是否真正合理。事实上，国外学者已经逐步认识到垄断结构和竞争并不是矛盾的，美国240位经济学家在1999年的联名上书[(73)]、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尖锐表述以及弗里德曼的深刻反思都无疑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定程度上的垄断有利于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74)(75)]，从而为我们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优化市场结构时提供一个思路和方向。

8.2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

自 2009 年 5 月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进入一个非常诡谲的时期。工业信息化部、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报告表明，中国工业经济已经初步遏制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下滑势头。接着国家统计局发表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前景不断相好的势头明显。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并不显著，而虚拟经济的快速膨胀十分引人瞩目。中国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和中国沪深股市突破 3000 点等等事实都显示，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在新形势下进行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这个形势下的重要特点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中获得了最大份额的投资，但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得到的资金有限，反弹乏力；中国经济中的实体经济投资整体环境未得到根本改善，甚至恶化，而虚拟经济、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价格却逆向暴涨；在房地产价格的逆势暴涨中，大型国有企业在房地产地标竞价中表现抢眼。以上情况显示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在新一轮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价格的调控中，

[(73)] 这些经济学家上书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请求有关当局撤销对微软等公司的反垄断起诉。

[(74)] 格林斯潘认为：“这个国家的整套反垄断法，是经济无知和冲动的大杂烩。”

[(75)] 弗里德曼指出：“多年来，我对反垄断法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刚入行的时候，作为一个竞争的支持者，我非常支持反垄断法。我认为政府能够通过实施反垄断法来推动竞争。但多年的观察告诉我，反垄断法的实施并没有推动竞争，反而抑制了竞争，因为官僚总舍不得放弃调控的大权。我得出结论：反垄断法的害处远远大于好处，所以最好干脆废除它。

没有起到良性积极的作用，相反在一个时期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结构的优化过程中起到了反向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继续大规模进入竞争性行业，会加剧经济的失衡，加大股市泡沫。此种现象虽然是在这一时期呈现的比较明显，但足可以反映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改革攻坚任务还未完成，还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8.2.1 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

1．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

一方面，由上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绝大多数工业产业的 CR4 都低于 30%，甚至有 64%的工业产业的 CR4 低于 10%，即是一种低集中度的市场结构(76)，企业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水平低，这不仅使大、中、小企业无法获得丰厚的分工效益，而且还引发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相互之间争夺原材料和市场的过度甚至是恶性竞争行为，产品实现日益困难，其结果既造成了有限资源的浪费，又抑制了企业采取大规模、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方式，削弱了技术创新的动力，从而影响了产业组织整体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大量的实证资料也证明, 某一行业内企业数量越少, 市场垄断力量就越大, 垄断企业在不存在市场竞争机制约束的状况下, 就会放松内部管理和技术创新, 从而导致生产低效率; 垄断企业也不会自觉按照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制定价格, 而往往会制定垄断价格, 从而导致社会分配低效率。而在中国的垄断行业中，恰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等不利于社会福利增加、社会技术进步、行业市场竞争力提高的现象。

2．市场结构不合理

尽管改革以来国有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有了显著的下降，但并没有完全改变由改革前后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国有经济比重过大的局面。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在中国企业 500 强中所占的比重虽然在不断下降，但是

---

(76) 贝恩最早运用绝对集中度指标对产业的竞争和垄断程度进行了分类研究，他根据前 4 位企业市场占有率(CR4)将集中类型分为六个等级，即极高寡占型(CR4>75％)、高集中寡占型(65％<CR4<75％)、中(上)集中寡占型(50％<CR4<65％)、中(下)集中寡占型(35％<CR4<50％)、低集中寡占型(30％<CR4<35％)、原子型(CR4<30％)。

依然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私营大企业的竞争力虽然不断增强，所占比重呈上身态势，但是与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2008 中国企业 500 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有 331 家，较去年减少 18 家，占全部企业总数的 66.2％；实现营业收入 18.2 万亿元，占全部收入的 83.1％；实现利润总额为 1.2 万亿元，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 86.6％。而 500 强中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有 98 家，较上年增加 9 家，占企业总数的 9.2％。实现营业收入总计 2 万亿元，占全部企业的 9.2％；实现利润总额为 1055.6 亿元，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 7.7％ [(77)]。这主要是因为在一些垄断行业中，国有企业仍占据垄断地位，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却因为各种制度性障碍而不能得到顺利的发展。

8.2.2 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亟需调整

由此看来，中国市场结构远未形成一个合理的集中度状况和所有制结构，这些不合理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垄断行业的改革目标不能彻底实现。因此，中国迫切的需要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消除这些不合理因素是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垄断行业改革的思路：促进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优化和升级的不能单纯地强调引入竞争，更不能一拆了之，而必须是以系统化的思路来面对垄断行业的改革问题。进一步的阐释这一思路的话，我们可以具体解释为：一方面，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过程中不能过度强调竞争，过度强调竞争就会出现过度竞争甚至是恶性竞争，这会对集群品牌和竞争优势带来严重的侵蚀和危害，其结果必然会对社会福利造成损害；另一方面，反垄断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一味地依靠打破垄断格局来推动改革的步伐，而是要兼以充分发挥垄断行业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特性。由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是在企业具备一定规模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的，因此对那些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的行业中的垄断企业不能一拆到底，在拆分的过程中要注意这一行业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优势的保持；最后，要进一步扩大非公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放宽市场准入，建立宽松

[(77)] 数据来源于 http://news.QQ.com。

的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市场环境，实现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进一步提升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

说到底也就是深化国有企业垄断行业改革（1）必须继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从竞争性行业退出或收缩，而不是以利润为导向在竞争性行业中大力投资。（2）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应当扮演“基本依靠力量”的角色，国家采取政策时应当依靠国有企业的力量，引导经济发展方形。（3）中国的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应当利用自身的经济实力，在实体经济的创新性发展中做出表率，增强创新，增强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4）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应当在新能源和节能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加大投资力度。这些新兴工业项目是中国经济促进消费，增加投资，稳定出口，环境保护，加大创新的一个重要的结合点。

另外，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迫切需要升级，那么我们如何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过程中推动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升级呢？需要遵循以下的战略指导思想。

8.3 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

1．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必须寻求在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平衡

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必然影响合理的市场结构的形成，其中包括产业一定程度的集中，甚至垄断。反过来讲，市场结构也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例如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过去比较重视产业政策，忽视市场政策，但是现在似乎又出现单纯重视市场政策，忽视产业政策的现象。或者换一种说法，过去政府比较重视产业政策，而另外一些人可能对市场化政策更重视。其实是必须保持一种比较平衡的观点：在产业政策的调整过程中促进市场化的进程；通过市场化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隐含的结构性问题，牵涉到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甚至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是中国新阶段改革的攻坚战，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持续、高效的深入发展问题。

2. 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阶段出发，把中国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合理化放在重要位置上。

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进行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和继续深入的市场化改革。由于过度竞争的市场结构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培育，因此中国应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充分考虑到现代产业发展的技术经济特点，特别是充分利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完成中国某些产业和部门的集中化甚至垄断进程。国有企业应当实现有进有出，集中在国有企业最有优势的部门和产业中，推动国有资本向支柱、优势、特色产业及行业的龙头企业集中。而在其他规模经济效果不显著的部门则应当放开市场、鼓励竞争，以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放大国有经济的功能，才能更好的发挥国有经济的支撑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3．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合理化的调整必须与过去的产业政策有所区别。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合理化进程必须有深刻的经济基础。1）不是设置“人为的”的障碍来限制市场机制的配置功能，而是必须依靠企业自身的能力来取得他们自身的地位。避免人为的画地为牢的产业政策降低效率或形成大而不强的局面。2）它是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而在生产、销售和管理方面进行的巨大投资，从而取得巨大的竞争优势为基础的。换句话说，投资效率的标准在于能否取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3）它是以扩大市场和市场份额在相应设施上和技能上进行投资，从而取得市场份额和市场利润的基础进行的。所有这些要求政府既要有一个清晰的产业政策，又必须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系统的规制政策。

另外，在中国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合理化进程中，尤其要注意到自然垄断属性的变化。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应进行重新认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经济条件的变化，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的自然垄断边界正在发生变化，这些行业中的某些生产环节和业务的自然垄断属性正在弱化，或者已经消失。例如电信产业，它属于传统的自然垄断产业，但是随着技术的革新，已经从原来的有线网络发展成为当今的有线和无线兼而有之的网络布局，也就是实体网络向虚拟网络的转变，这一转变使得它的生产和销售通讯设备、利用长途网络提供长话服务、利用有线网络提供寻呼通信，移动通信以及提供各种增值服务，例如可视图片等环节的自然垄断属性逐渐弱化，对这些环节可以适当地放松管

制，合理地引入竞争。对于那些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行业或者行业中的某些环节，既没有必要也也难以打破这种垄断，应该允许其客观地存在以发挥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优势。因此，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并不排斥对自然垄断行业中的非自然垄断业务、环节实行规制放松，关键是要区分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而不能简单、盲目地照搬自然垄断理论和政策，来对待这些产业和部门。

4. 在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合理化进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规制理论。

根据改革的需要和实际发展情况和不同阶段的特征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规制理论。从这套理论中能够建立一个在形成较大程度的集中和垄断的情况下，又形成一种既能利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同时又能提高效率，防止利用市场势力进行反社会剥夺的前后一致的政府规制体系。可以在可竞争市场理论框架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导致市场失灵的传统认识，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提供一些新的管制政策设计，意识到规制关键在于加强沉淀成本与风险管理，特别是强调没有沉淀成本的自由进入与自由退出机制的重要性，挖掘市场制度自身蕴藏的力量，防止自然垄断行业利用自身垄断地位扩展其对市场控制能力，这对于体质转型时期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来说，其借鉴意义十分巨大，从而不再被限制于企业规模的大小和企业数目的多少，而是根据可竞争市场理论进行民营化和国有化之间的取舍，这就需要对价格制度和价格制度以外的其非市场制度进行完善，同时需要政府相关的管制政策，从而创造出一个自由进入与自由退出的可竞争市场环境，使沉淀成本、产权和信息不完全管制之间形成互补关系，更好地应用于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实践中 [78]，最终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规制理论。

总之，产业政策和市场政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市场结构的合理化的有机结合是进行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合理化进程中的主要指导思想，其中心在于政府的规制政策，在一个清晰的框架下深化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规制结构改革。

---

[78] 汤吉军.可竞争市场理论及其对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启示.[J].产业经济评论，2010 年 6 月，第 9 卷，第 2 辑

第九章 中国垄断、竞争的制度安排与选择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其垄断与竞争制度的安排与选择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和条件，即便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规制思想和规制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 Milton Friedman 提出了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及公共调节三种调节和控制垄断的形式，但对中国的垄断与竞争制度来说，依然没有一个可以选择的标准和条件，实际上从各个主要经济学家的理论来看，都认为如何对待垄断行业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而并没有适合所有国家的统一方案，每个国家需要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各自的国情出发进行自己的选择。

关于垄断与竞争的制度安排与选择问题虽然没有统一的答案和标准，但无论进行怎样的选择、实行怎样的政策，这种关于垄断与竞争的制度安排与选择的基本要求和标准是不能改变的，这实质是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待经济体系运行的问题。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竞争性均衡理论，市场经济经济体系是能够达到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但这种关于最优和最大化的所有结果的理论论证均是在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和假设基础之上实现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下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然而现实的经济确是在各种市场条件下进行的，包括垄断、寡头和垄断竞争等市场环境中运行的，纯粹的完全竞争条件在现实中很难满足。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可以被否定的，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性均衡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衡量经济效率的一个标尺，仍然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对在进行垄断与竞争制度的选择和安排时，虽然不能完全实现竞争性均衡所达成的帕累托最优，但可以以其为目标并向其无限逼近，这也是中国深化垄断行业改革首先要确立的理论目标。

9.1 制度安排的基本要求——帕累托最优的无限逼近

从实现无限逼近帕累托最优的理论目标出发，垄断和竞争制度的安排应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具体体现为：

1、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垄断和竞争政策的选择上必须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基本规律。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最本质的目的应该是改革所想要实现的市场结构和形态必须有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要求，他所体现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中所选择的垄断和竞争制度必须适应中国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沿着中国经济继续深入进行的市场化进程、适应中国经济今后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换代、顺应中国经济面临的发展方式的转换以及中国经济总体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如果不能实现这些目标，那么所选择和安排的制度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的作用就不是一种促进作用，而且如果这种制度安排不合理甚至还会出现不进则退的后果，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有阻碍作用，因此，选择出一种合适的、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需要以及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基本规律的制度是十分困难和异常关键的。

2、对垄断与竞争制度的选择和安排同时也必须满足今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关于垄断和竞争的诸多基本原理和观点中，人们的基本共识之一是：垄断与竞争问题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实际地影响整个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影响社会的政治和民主。因此作为经济社会一项基本的选择，垄断和竞争制度安排必须把这一层面放入一个基本的方面加以考研究和考虑。因此这要求所作出的关于垄断和竞争制度的安排不仅需要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必须适应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中国目前面临的、世界经济新近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以符合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需要。这一要求包括符合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经济民主发展的需要；效率目标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制度的安排也应当有助于中国今后的社会变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需要。

3、深化垄断行业改革中所进行的制度选择和安排必须有利于中国造就一个多种所有制、多钟经济成分和多种经济形势共存的经济体，建立一个各种所有制、各种经济成分和经济形势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并能够进行相互

良性竞争的社会主义竞争体系和竞争环境。试图造就一个既有强大经济实力，同时又生机勃勃；既有高度的经济效率，同时又有公平和公正；既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同时又有利于增进人民福利的、各个经济体各得其所的、充分发展的大好经济局面。

以上的一些基本要求也充分说明了有关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中垄断与竞争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它不仅涉及到经济安排，也涉及到政治安排和社会安排；不仅要满足各个市场经济中各个生产厂商对于公平和公正的要求，也要求顾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各个阶层人民的感受和需要，更要充分考虑到国家的性质、国体和政体的要求；不仅要考虑到目前的经济需要，也要考虑到长远的经济发展。因此可以明确的说，对垄断和竞争制度的安排决不只是从单纯的经济学考虑出发，而是需要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考虑。

9.2 制度安排与选择的维度——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

制度安排和选择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从现有的制度约束下，如何取得最高的制度效率和经济效率的问题，现有的制度约束是进行以后制度安排的基本条件，也是后续制度安排和选择的基本出发点，制度经济学考察制度安排有三个维度，产权维度、国家维度、意识形态维度。

第一，产权维度。这是考察和研究垄断与竞争制度安排的重要方面。制度经济学中制度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在设立的一些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规则下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为竞争和合作确立基本的经济秩序，使人们的个人选择与所面临的制度约束相一致，只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才能保障制度选择的有效性和可实施性。人们在追求更低的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过程中才形成了各种所谓的制度安排以防止“经济人”本性下各种无序和冲突的无效结果发生。产权制度安排实际上处于经济制度安排的核心，只有经济主体的行为约束被明确了，人们才能按照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去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也是确保有效性和有序性的主要方面，因此，有关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的垄断竞争问题，产权维度是首先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第二，国家维度。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在其制度变迁理论中强调，政府是

国家的管理者和统治者，产权关系的调整必须通过政府或国家以整个社会的名义通告大众并贯彻执行，所以国家维度是制度安排和选择时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国家维度的定义中不仅包括许多经济社会中长期形成的正式的或正规的制度，还包括国家的宪法、宪政制度、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的总结和综合，这些构成了重要的制度约束，也从根本上反映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关于垄断和竞争的制度安排和选择必然不能把这些带有根本性质的制度安排排除在选择范围之外，必须给以足够的的重视和充分的考虑。

第三，意识形态维度。这是垄断与竞争制度安排与选择需要考虑的第三个方面，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各组成部分所共同持有的一系列信念的组合。既包括一些规则，如宪法、法律法规等，又包括一些非正式的规制，如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风俗习惯、人们行为的道德标准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还必须包括对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博大的历史传承，以及建国后的历史发展、解放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中国政府的一贯意识形态考量等方面。

表 9-1 制度安排的三个维度

	中央计划经济时期	规制制度变迁的第 I 阶段（1978 年末到 1994 年）	变迁的第 II 阶段（1994 年到 2003 年国资委建立）	规制变迁的第 III 阶段
I、产权维度				
	政府全面把握和掌控企业，实行全面得国有化，产权关系表面上非常明确，实际上却比较模糊。企业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	自上而下的供给型制度变迁，是原有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的结果，从根本上改变僵化的产权结构	制度变迁的主体已经由政府主动供给过渡到由不同部门利益群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而改变主观博弈结构，进而自发开展的博弈过程（如电讯改革中联通公司的成立）	反垄断法的出台使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进入法制化阶段，在推进国有垄断企业的重组和产权改革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效
产权管理措施	僵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官僚体制下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政府对企业的全面	国企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核心，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引入竞争机制是中国垄断行	提出国有经济调整应当采取“抓大放小”的方针，要求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	国资委的定位受到质疑，国资委作为企业的出资人与履行国家公共管理的职能之间存

	监督和直接管理	业改革迈出的第一步	用，其中特别提出，国有企业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要“有进有退” 对垄断行业进行分类深入改革	在矛盾。
市场结构	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的作用几乎完全抹杀，国有企业缺乏真正的竞争压力，缺乏进取心，经济缺乏活力。	以“分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改革的矛头直指政企不分的行政管理体制，放松进入规制成为引入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引进新的市场主体，鼓励和引导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存在和发展	政府意识到，仅仅强调改善管理、有限的自主权和有限放松规制等，很难提高垄断企业的经营效率，除非深入改革外部环境，引入竞争	政府作为垄断行业规制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在规制改革中处于一种力不从心的地位。国有垄断企业的市场力量加强，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诸多掣肘。
制度变迁的组织集团	没有真正意义的企业家或企业家集团	制度变迁的主体或领军人物基本上是缺位	新成立的国资委承担起改革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的任务。规制制度变迁的过程变成了政府与企业两家的博弈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作为比较强势组织的利益得到充分的表达，然而作为改革的最大利益相关者公民的诉求得不到充分的体现。	规制制度变迁越来越变成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与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之间的一种博弈过程，在规制制度变革中公民缺位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改革的总体评价	没有竞争，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成本高昂，	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的竞争格局，总体而言	对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采取的一系列的调整和	现行的制度安排下执行政府规制任务的实

	经济效率低下	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规制措施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战略调整，在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和战略性调整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从而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持续增长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制度性基础。人民在改革中也得到了实惠。但是要求进一步变革的呼声强烈，处于制度非均衡状态。	际上是一个“多龙治水”的局面，由于改革中公民缺位，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出现动力不足问题。
II、国家及宪政维度				
改革和规制中政府的地位和作用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盘国有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没有竞争的全面的行政性垄断，是政府对经济的全面控制。	中国政府不但扮演了主要发动者和推动者的作用，中央政府还规定了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让企业成为自我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的竞争者的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方向	企业的自主经济地位逐步确立，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的自我经济意识和既得利益也逐渐得到加强。企业的自我经济意识的强化和政府的行政权力弱化几乎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和地位	政府对企业的“父爱主义”和企业对政府的过度依赖	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企业结成了一个利益高度一致的生存的共同体，政府作为先知先觉的权力中心，一直牢固保	企业以越来越以一个市场经济的自主的商业生产者之间的平等关系来看待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和改革政策，同时在	随着各种经济主体竞争的加剧，国有企业自身的既得利益也逐步强化，并希望在制度变迁和改革的进

		持着改革的大方向，并且使中国的改革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的成功。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博弈中，政府的自我意识也获得了加强	程中得到反映。政府的规制改革动力不足。
宪政角度	没有给民营企业留下发展的余地。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从政府到各级权力机关开始承认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在经济中的合法地位。	承认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同时第一次明确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反垄断法的公布。国有企业必须实行有退有进，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企业的活动范围应当限制在一定的范围。
III、意识形态维度				
	中国历史上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模式的传统，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根深蒂固。企业中建立了比较严格的行政层级制度，国家统一经济概念，集体的概念，强调集体互助，而弱化经济单位和每一个个人个体的个性	中国改革的成功使人们的认知和信念体系彻底改变，一元化的思想认识体系逐渐向着开放的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适应市场化分散决策的、更为强调差异、更强调个性的多元化思想意识体系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严格的下级服从上级行政管理制度逐步地、更多地被利益原则、产权原则、新的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代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无偿占有，内部交换体制已经越来越被摒弃和边缘化。	人们不但越来越关心整体宏观经济的生产效率问题，更关心整个经济的分配效率问题，不但关心整体经济的绩效，更关心在这个经济制度下是否充分发挥了经济单位的个体的积极性和主动能动性的问题。对于所谓的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似乎给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注意力。
规制结果评价	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	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的三	总体上的帕累托改进，出现不平衡的 W-W 局面	从 W-W 局面逐步向零和博弈的方向发展，规

	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生产力发展比较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赢局面		制改革动力不足，垄断行业改革步履维艰。

从以上三个维度总结和考察中国面对垄断与竞争问题所做出的制度安排和选择出发，能否概括出中国在该问题上的制度变迁轨迹，并且对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方面起到有力的启示作用呢？

从中国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对垄断行业进行规制的历程上看，中国当今在垄断与竞争问题上的制度安排绝不是一种偶然的、随机的选择。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传承，植根于中国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实践，也植根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目前现存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人民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约束下，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自身的切身经验所做出的选择。实际上这三重约束是中国的选择受到中国经济发展产权的、宪政的和意识形态的三维制度约束条件的制约，也即是中国具体国情的约束。规制制度选择的关键就是，如何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取得社会整体经济收益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在中国的规制变迁过程中，处处看到这三重制度约束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中国垄断与竞争的制度安排的影响。例如，中国工业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从当时占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开始的。中国工业行业改革开放的内容最初就是如何对国有企业简政放权，这与其他国家反垄断形式和内容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只是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的各个经济主体的自主经济地位和自主经济意识完全建立之后，中国的垄断与竞争问题才逐渐突显出来。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阶段和中国国有垄断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并不讳言中国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重点主要是针对国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一些垄断行业和部门的，这又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特点。正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制度约束，中国才采取了国家垄断的形式来处理中国的垄断与竞争问题。但其实国家垄断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弗里德曼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面对垄断有三种备选方案来控制垄断对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国家垄断、私人垄断和公共调节。

可知，中国今天面对垄断与竞争上的难题不可能从西方经济学或西方法律

中寻找到答案，而是需要从中国的具体经济发展条件、具体的国情出发，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和面临的外部环境，参照各国先进的经验做出自己的选择。实际上，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在垄断与竞争问题上的制度安排都是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所做出的选择。各个国家的国情各不一样，国家的具体制度安排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又是差别十分显著。例如美国基于其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对政府的长期怀疑态度，政府控制私人部门资源的使用时十分慎重。根据美国《第五修正案》（最初的权利法案）："在没有相应补偿的情况下，私人财产不能被公共使用"，所以在美国私人部门有着高度广泛的经济自由。当美国出现自然垄断的情况时，为了避免产生浪费，最基本的解决办法是在政府制定发挥的基础上，允许垄断经营。美国对垄断行业规制的重点是对价格的管理，同时美国联邦设立的各种管理垄断的委员会在给予企业基本的特权、批准资金计划，建立统一的会计制度、审计、有效的成本、审核价格降低政策、监督相关的安全、充分的服务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等各个方面都进行干预。在给予特许经营权方面，美国把主要的权利给与了私人企业。例如，美国的私人电力企业提供全美国四分之三的发电量，联邦提供的占十分之一，剩余的份额则由州以及地区的电力机构和电力合作社提供(79)。美国是国有企业最少、国家干预最少的国家。但是即使是这样，据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世界最富有的发达国家的总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都很高。比如在瑞典，这个比例超过50%。这么高的税收比例中除了进行社会支出（即政府在退休金、健康保险、贫困项目、失业保险及教育方面的支出）之外，主要还用于公司管理、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的支出。这后一方面的支出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政府干预修补市场经济中由于市场失灵所导致的效率损害。所以在一般国家中用于这种政府经济活动的支出占到整个经济体的40%以上。而美国尽管在所有的经合组织国家中的国家干预最少，但是据认为，考虑到美国各州及地方税收系统的税收，美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占有整个经济体的比例也超过30% (80)。更重要的是，当美国经济处于经济危机的紧急关头，美国政府历来都有把一些私人垄断企业暂时收归国家所

(79) 转引自《全球市场中的企业与政府》，[美] 默里·L.韦登鲍姆著，张兆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42页。

(80) "美国分配公平的迷局"，[美] J. E. 罗默，《中国经济》，2009年8月，总第8期，第91-92页。

有的做法。所以政府或国家对经济生活得干预在美国往往超过 30%的程度。实际上，即使是在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模式并不一致，每个国家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都有一条不同的界线。例如法国由于其中央集权的传统，法国的国有企业和政府支配的国家资本的份额就比较高，而美国就相对更低。正如我们开始时强调的，中国今天选择了一种垄断行业规制改革的国家垄断的制度安排形式，并不是根据国外或某种经济学理论的教条来由政府规定的，而是中国根据自身的特殊国情所做出的历史选择。

9.3 制度改革的方向和趋势

中国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中国垄断行业的改革其实往往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中的主要内容，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成败关系到中国经济继续深入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一）随着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发展，中国规制变革的发动者逐渐从政府向垄断企业转移。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企业只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所以中国传统国有企业还没有产生真正意义的企业家或企业家集团，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变迁理论中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变迁的主体或领军人物基本上是缺位的，那个时候的改革只能是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变革。然而当改革经过逐步的经济放权和行政放权、中国经济引入竞争实行分散改革之后，各种所有制和经济成分的经济主体得到逐步成长和发展，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方面改革使经济效率提高，企业自主意识加强，另一方面政府的控制减弱，企业开始和政府斤斤计较，并且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相比集中计划经济体系下的政府，其权威也开始下降。到后来规制改革的第三阶段，改革甚至逐步向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方向发展。这也就是在政府与企业关系上的“诺思悖论”的表现。

（二）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进程中，政府为了自身财政的最大化，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有逐渐趋于加强的趋向；但是另一方面，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率，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又呈现出进一步分散化的趋向。这双重趋向在中国深化垄断行业改革中很明显。我们可以这样结论，随着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发展，

政府将不得不把原来直接的国家垄断向着逐步市场化和间接管理的方向发展。也就是，中国还需要在采取国家垄断的具体形式外，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垄断企业的规制，也就是公共调节。这将成为今后中国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一个方向。

（三）在中国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近期，由于中国现存的关于垄断与竞争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即公民的利益没有得到完全的代表，从而使改革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因而，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改革可以使各个经济主体，包括国家、政府、公民、企业各方面多赢结果的改革项目越来越少（改革阻力比较小的改革项目都已经进行），遗留下来的改革项目已经从原来改革中的双赢结果向着现在零和博弈的方向发展。由于可以使各方受益的改革阻力比较小的改革项目越来越少，进一步需要改革的项目都是遗留下来的困难项目，所以改革的阻力逐渐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改革的利益相关者公民不能参与到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进程当中去，中国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就会越来越失去动力。

结束语

中国垄断行业改革的最重要的内容首先是明确国有企业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性质、作用和各项基本职能，研究关于国有企业分布的理论，制定相应的调整国企分布的政策和建议。关于国有企业存在的基本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与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相联系的。市场经济对资源的基本配置原则是必须坚守的。而国有企业存在的基本原因应当、也只能是由于市场经济存在的市场失灵。国有企业的存在的主要作用就是弥补市场失灵。但是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在中国目前面临的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有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又不能仅仅限于弥补市场失灵。中国国有企业还面临与发达国家的垄断和寡头垄断巨型跨国公司竞争的任务。根据上面的标准，中国国有企业其实一方面出现“越位”的情况，同时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缺位”的问题。

首先，本文论证了中国产业结构目前存在低级化、分散化，总体一体化程度偏低，经济规模偏小，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环境等问题。并提出应当在调结构、升级产业的过程中，促进对中国的市场结构的合理化和调整的过程。历史上发达国家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了今天以垄断和寡头垄断为特点的市场结构，中国也急需推进中国的这两个合理化进程。

其次，本文指出了过去的政府在两个结构和两个合理化的调整进程中，存在重生产数量和经济规模，轻产品质量和升级换代；重产业政策，轻市场政策和政府规制政策的问题。总是强调国有企业保值增值任务，实际上把国有企业当成一般的竞争性企业来看待，没有发挥国有企业在弥补市场失灵、调整产业政策、创造良好竞争环境中的作用。

再次，本文提出目前的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治理结构还不适应新时期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任务、不适应进行两个合理化和两个调整的要求，还必须从产权-宪政-意识形态的三维维度进行治理结构的改革和调整。包括国有企业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调整（国企整体上市等）问题，国企分配制度的调整（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应如何认识，上交的比例等），国有垄断企业薪酬制度的改革等。

最后，本文说明了中国采取的国家垄断加公共调节的方式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所做出的最适当的选择。在许多情况下，垄断产生式一种必然的过程，几乎是无法完全根除的，垄断既有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一面，也有阻碍经济发展的一面，所以对垄断不一定要完全消灭垄断，而是应当顺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势利导，采取适合自己国情的对垄断的实现方式的选择，并对国有垄断行业进行政府规制，力求把垄断对经济的危害降低最低。既得到垄断带来的好处，同时又把垄断的危害降低最低。同时指出调整国有企业的分布式是对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进行规制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国有垄断企业既有越位的问题，也有缺位的问题。有时缺位甚至比越位还严重。这关系到中国生产方式转变、产业的升级换代、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问

未来的研究思想及展望：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体制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济方式中的竞争力量之一。中国不能完全依靠国有企业发展经济和繁荣市场，否则中国经济就等于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了。中国应当实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体制的理想格局应当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包括私营经济、国有经济、外资企业等它们在中国经济中各自发挥其作用，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繁荣兴旺，形成一个公平合理、生气勃勃的大好的竞争性体制和局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世界经济所能忍受的程度，而中国国内的需求尚不能充当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和动力，因而中国经济感到国内和国际的双重挑战。为此中国只有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扩大内需，减少对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和压力，这就需要更深层次的政府规制结构改革，也是未来研究需要解决的方面之一：目前的关于政府规制结构的研究还纠缠在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两种规制思维定式中，应当跳出固定的思维定式，强调通过政府规制规范国有企业的行为。

为了完成该毕业论文写作，作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阅读文献资料和搜集相关数据，但由于作者在处理文献方面还未达到理想的高水平，因此对文献资料的把握并不是完全准确的，有可能漏述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加之相关数据的不可获得性，使得本文的研究表现出一些不足之处，这也是作者以后需要努力提高和改进的方面。

参考文献

1. Berger．A．N，Humphrey．D．B，Efficienc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urvey
2. Berger．A．N，Humphrey．D．B，The Dominance of Inefficiencies Over Scale and Product
3. Bernard, A .B. and J. B .Jensen. Exporting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USA.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4, 20(3):343-357.
4. Boardman Anthony E,Vining Aidan R.Ownership and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A Comparis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Private, Mixed,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 1989
5. Cal,Hongbin.Fang Hanming.Xu,Lixin Colin Eat,Drink,Firms and Government:An Investigation of Corporation from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NBER Working Paper 11592,2005.
6. Cao,Yuanzheng; Qian, Yingyi and Weingast, Barry. From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o Privatization, Chinese Styl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1999,7(1),pp.103—131.
7. Cavallo．L，Scale and Scope Economies in the European Banking Systems[J]．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2001（11）：515-531．
8. Chen, E.K.Y.The Tattoo Factor Productivity Debat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in East Asia.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 11(1):18-19.
9. Coase．R．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1937．
10. David DOLLAR.Economic Reform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in China's State-owned Industry[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0,39(1):89-105.

11. Dewwenter,Kathryn and Paul H.Malatesta.State-Owend and Privately-Owend Firm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ofitability,Leverage,and Labor Intens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r,(2001)91:320-34
12. Djankov, Simeon.Murrell,Peter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Transition:A Quantitative Survey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3), pp.739-792.
13. Douglas W CAVES,Laurits R CHRISTENSEN.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Public and Private Firms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he Case of Canadian Railroads[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0:958-976.
14. Dumais,G.,Ellison,G., Glaeser,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as a Dynamic Process.Review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2（84）,pp.193—204.
15. Ehrlich,Jsaac,Georges Gallais-Hamonno,Zhiqiang Liu,Randall Luther,1994:“Productivity Growth and Firm Ownership: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2:1006-38
16. Fan, S., and X. Zhang.Produc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Chinese Agriculture: New Nation and Regional Measur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2, 50(4):819-838.
17. Fare，R.，Grosskoph，S.，Norris，M.，Zhang，Z. Productivity Growth，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pp.66－83.
18. Fare．R，Grosskoph．S，Pasurka．Jr C．A．Pollution Abatement Activities and Traditional Productivity[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7，（62）：673-682．
19. Gary H JEFFERSON,Thomas G RAWSKI,Yuxin ZHENG.Chines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Trends, Measurement Issue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J]. Journal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6, 23(2): 146-180.
20. George YARROW,Mervyn KING,Jacques MAIRESSE, et al.Privatiz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J].Economic Policy,1986:324-377.

21. Henry A LARDY,Frederick W STRATMAN. [M].[S.l.]:[s.n.],1989.
22. Hunter．W．C，Timme．S．G，Core Deposits and Physical Capital：A Reexamination of Bank Scale Economies and Efficiency with Quasi-fixed Inputs[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995（27）：165-185．
23. Jeffrey．A．C，Paul．J．S，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 in Banking：Evidence from a Generalized Translog Cost Func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1994（33）．
24. Kang CHEN,Gary H JEFFERSON,Inderjit SINGH.Lessons From China's Economic Reform[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2,16(2):201-225.
25. Krugman, Paul R, and Maurice Obst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Theory and Policy. 5th ed.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2000.
26. Li, Shaomin;Li, Shuhe and Zhang, Weiying. The Road to Capitalism: Compet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0,28(2),pp.269—292.
27. Lin,Justin Yifu, Fang Cai and Zhou Li,Competition, Policy Burden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fo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88(2),pp.422—427.
28. M SHIRLEY,P WALSH.Public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 the Current Debate[R].2000.
29. Megginson, W., Netter, J.M. From State to Market: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Privat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9, (2001), pp. 321-389.
30. Mix Economied in Banking[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1（28）：117-148．
31. Ping CHEN.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Evidence of Economic Chaos[J].System Dynamics Review,1988,4(1):81-108.
32. Pulley．L．B，Braunstein．Y．M，A Composite Cost Function for Multi-Product Firm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Economies of Scope in Banking[J]． Review of Economicsand Statistics，1992（74）：221-230．

33. 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 DE SILANES,Andrei SHLEIFER, et al.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Valuation[J].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1999,7403
34. Robert． Solow，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February 1956．
35. Roman FRYDMAN,Cheryl GRAY,Marek HESSEL, et al.When Does Privatization Work? the Impact of Private Ownership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114(4):1153-1191.
36. Rosenthal, S.S., Strange, W.C. The Determinants of Agglomera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 ,2001（50）,pp.191—229.
37. Simeon Djankov, Peter Murrell.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Transition: A Quantitative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0(3), 2002(9), pp. 739-792.
38. Simeon DJANKOV, Peter MURRELL.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Transition: a Quantitative Survey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40(3):739-792.
39. Stacey R KOLE, J Harold MULHERIN. The Government as a Shareholder: a Cas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1[J].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97, 40(1):1-22.
40. Stigler．G, The Economies of scale[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58．
41. Su, Jian and Jefferson, Gary. A Theory of Decentralized Privat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Working paper,2003,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Brandeis University.
42. Theodore GROVES,Yongmiao HONG,John MCMILLAN, et al.Autonomy and Incentives in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1):183-209.
43. Theodore GROVES,Yongmiao HONG,John MCMILLAN, et al.China's Evolving Managerial Labor Marke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873-892.

44. Thomas G RAWSKI.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ese Industry: Problems of Measurement[Z].1986.
45. Tseng．K．C，Bank Scale and Scope Economies in California[J]．American Business Review，1999（117）：79-85．
46. William L MEGGINSON,Jeffry M NETTER.From State to Market: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Privatiz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1,39(2):321-389.
47. William L MEGGINSON,Robert C NASH,Matthias RANDENBORGH.The Financial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Newly Privatized Firms: an International Empirical Analysis[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4,49(2):403-452.
48. Wing Thye WOO,Wen HAI, Yibiao JIN, et al. How Successful Has Chinese Enterprise Reform Been? Pitfalls in Opposite Biases and Focu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4,18(3):410-437.
49. Zhuang, Juzhong and Chenggang Xu, Profit-sharing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the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Panel Date, Economics of Planning,1996(29),pp.205—222.
50. 阿林·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2)．
51. 白永秀，严汉平.试论国有企业定位与国企改革实质[J].经济学家，2004年第3期，第37—42页.
52. 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仝月婷.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J].《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第29—40页.
53. 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第4—13页.
54. 曾维君．企业交易成本的构成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9(05)：148．
55. 陈时中.经济增长中的因素分解问题[J].经济系统技术进步测算方法,1986.
56. 陈钊.经济转轨中的企业重构：产权改革与放松管制[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57. 大冢启二郎等.中国的工业改革：过去的成绩和未来的前景[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8. 丁晓正，胡正荣．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广电产业发展进程中的战略目标取向及其对策[J]．视听界，2005．
59. 董辅礽等,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制度与效率[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
60. 杜丽，王锋．中国商业银行范围经济状态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2（10）：31-38．
61. 樊纲，王小鲁，张立文，朱恒鹏.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J].《经济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9—18 页。
62. 耿明斋，李燕燕.国有资本生存边界与管理模式[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年.
63. 谷书堂，谢思全.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经济纵横》，2002 年第 9 期，第 2—6 页.
64. 顾乃华，李江帆.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6（1）.
65. 桂世镛.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J].《经济研究》，1997 年第 11 期，第 3—8 页.
66. 郭凯，姚洋.国有企业改制的成因：对五个假说的检验[J].《世界经济》，2004 年第 12 期，第 1—10 页.
67. 郭克莎.我国产出结构与投入结构的变动关系考察[J].经济学家,1993,1:68-80.Bain．J．S，Industrial Organization[J]．New York ，John Wiley.，1959．
68. 郝大明.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效率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6,7(期缺失):61-72.Kathryn L DEWENTER,Paul H MALATESTA.State-owned and Privately Owned Firm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ofitability, Leverage, and Labor Intens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1):320-334.
69. 胡家勇.一只灵巧的手:论政府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
70. 胡一帆,宋敏,张俊喜.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绩效研究[J].经济研

究,2006,7:49-60.
71. 解明.经济转轨中国有资本比重的最优路径选择——一个动态模型[J].《经济学季刊》，2007 年第 6 卷第 2 期，第 561—580 页.
72. 黎德福，陈宗胜.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是否存在快速的效率改进［J］.经济学（季刊），2007（1）.
73. 李京文，钟学义著．中国生产率分析前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
74. 李敏波，王一鸣.双轨制、价格市场化与总量投资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7 年第 7 卷第 1 期，第 93—110 页.
75. 李维安. 现代公司治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6. 林毅夫，蔡昉，李周.企业的改革的核心是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载由徐澳庆、文贯中主编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年，第 49—75 页.
77. 林毅夫，蔡昉，周李.国企改革的核心是创造竞争的环境[J].《改革》，1995 年第 3 期，第 17—28 页
78. 林毅夫，李志赟.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J].《经济学季刊》，2004 年第 4 卷第 4 期，第 913—946 页.
79. 林毅夫，刘培林.企业自生能力与国企改革[J].《经济研究》，2001 年第 9 期，第 60-70 页.
80. 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J］.经济学（季刊），2002（2）.
81. 刘大成著．效率和生产率分析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82. 刘怀德.论国有经济的规模控制[J].《经济研究》，2001 年第 6 期，第 62—69 页.
83. 刘佳勇．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企业网络效率边界分析[J]．学术争鸣，2009(05)：21．
84. 刘小玄,李利英.企业产权变革的效率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5(2):4-16.
85. 刘小玄，郑京海.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1985—1994[J].《经济研究》，1998 年第 1 期，第 37—46 页.
86. 刘小玄.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1995 年全国工业

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0（2）.

87. 刘小玄.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0,2(17)
88. 刘小玄.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企业行为和市场均衡[J].《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2 期，第 61—71 页.
89. 刘小玄.中国转轨经济中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J].《经济研究》，2003 年第 1 期，第 21—29 页.
90. 刘银国等. 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 [J].《经济学动态》2004 年第 7 期
91. 刘宗华，邹新月．中国银行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基于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检验[J]．数量技术经济研究，2004(10)．
9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81．
93. 庞皓．计量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100．
94. 彭国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收敛分析［J］. 经济研究，2005（9）.
95. 平新乔.论国有经济比重的内生决定[J].《经济研究》，2000 年第 7 期，第 16—23 页.
96. 钱德勒．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97. 塞风等著．生产率与支柱产业的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98. 史清琪,秦宝庭,陈警.衡量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作用的主要指标[J].技术进步的评价理论与实践.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
99. 孙永祥.所有权, 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机制[J].经济研究,2001,1(9).
100. 孙正林，王要武，刘红娜．规模经济：延长中小企业生命周期的理性选择[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03）：24．
101. 唐欲静. 国有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建议 [J].《经济学动态》2001 年第 6 期
102. 田国强.一个关于转型经济中最优所有权安排的理论[J].《经济学季刊》，2001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45—69 页.

103. 汪应洛，安义中著．生产率工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
104. 汪应洛.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分析及组织效率的改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0).
105. 王金营.中国经济增长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需求［J]．中国人口科学,2002,(2).
106. 王珏,陈文通.国有企业改革新探[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107. 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基本理论及在政府管制实践中的应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08. 王曦.经济转型中的投资行为与投资总量[J].《经济学季刊》，2005 年第 5 卷第 1 期，第 129—146 页.
109. 王永庆. 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反思及再认识[J].《经济要参》2002 年第 17 期
110. 文红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比较与启示——以上海、湖北、四川为例［J］.经济问题，2005（2）.
111. 吴敬琏等.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 年.
112. 吴延兵.R&D 存量、知识函数与生产效率［J］.经济学（季刊），2006a（4）.
113. 吴延兵.R&D 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6b（11）.
114. 熊俊著．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115. 徐传湛，郑贵廷，齐树天．中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问题与金融改革策略透析[J]．经济研究，2002(2)．
116. 徐现祥，王贤彬，舒元.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分布的演进（1978——1998）［J］.经济学（季刊），2004（3）.
117. 徐晓东,陈小悦.第一大股东对公司治理, 企业业绩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2003,2(00):2.
118. 许小年.以法人为主体构造公司治理机制和资本市场[J].改革,1997,5:1.
11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1972．
120. 颜鹏飞,王兵.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基于 DEA 的实证分析［J］.经济

研究,2004（12）.
121. 杨其静.国企改革：在摸索与争论中前进[J].《世界经济文汇》，2008 年第 1 期，第 55—63 页.
122. 杨瑞龙.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23. 姚洋，章奇.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J]. 经济研究,2001（10）.
124. 姚洋.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J].经济研究,1998,12(29):16-21.
125. 姚洋.非国有经济成分对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04（12）.
126. 叶华光．微观视角下厂商范围经济的形成机制分析[J]．交通科技与经济，2008(03)：119．
127. 叶生洪．规模经济新论[J]．当代财经 2007（02）：10．
128. 叶裕民.全国及各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分析[J].经济学家，2002（3）.
129. 易纲，樊刚，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 年第 8 期，第 13—20 页.
130. 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 经济研究，2003（8）.
131. 俞立平.企业性质与创新效率［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5).
132. 俞乔，陈剑波，杨江，张纬.非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2 年第 1 卷第 3 期，第 502—520 页.
133.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91．
134. 臧旭恒．.产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135. 张春霖.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J].《经济研究》，1999 年第 8 期，第 3—13 页.
136. 张焕明.扩展的 Solow 模型的应用——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性差异与趋同［J］.经济学（季刊），2004（3）.
137. 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J].《世界经济文汇》，2003 年第 2 期，第 17-24 页.

138. 张卓元，路遥.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J].《财经论丛》，2003 年第 1 期，第 1—7 页.
139. 赵伟，马瑞勇，何元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分解［J］. 统计研究，2005（7）.
140. 赵自芳，王争著．中国民营企业的生产率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6.
141. 郑海航，张卓元主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30 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42. 郑京海，刘小玄，Arne Bigsten.1980—1994 期间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技术进步和最佳实践[J].《经济学季刊》，2002 年第一卷第 3 期，第 521-540 页.
143. 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J].《经济研究》，1999 年第 5 期，第 55-60 页。
144. 郑玉歆等．中国工业生产率变动趋势的估计及其可靠性［J］. 经济研究 1995，（12）.
145. 支道隆.核算全要素生产率[J].《统计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45—48 页.
146. 邹新月，邓亭．基于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商业银行范围经济实证研究[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9（1）：74-82．
147. 邹至庄.中国价格改革是提高效率的杠杆[J].价格理论与实践,1984,6:17.
148. 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致 谢

能够完成顺利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习，我需要感谢的人很多。然而，如果说我的论文能够多少有一些“知识增量”性的贡献，那么我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我的两位导师高桥五郎和于同申教授。

我与 2011 年 4 月年开始跟随高桥老师学习，高桥老师是一位博学笃行、风度翩翩的日本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经常带领学生到中国各地进行调查和访问，十分关心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的发展，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可以深深的感受到他对中国的热爱，这些都让我对他更加尊敬。他的讨论课也成为我踏入爱知大学学习的第一个台阶。在我回国继续学习的这段时间里，高桥老师经常通过邮件督促和询问我的学习，并对我提出的问题耐心指导，在高桥老师的领路下，我不仅学到了一流的理论知识，更是有幸参与了多次机会难得的专题讨论。而在这个过程中，高桥老师总是能够发现和提出好的研究问题；能够运用理论观察和剖析现实世界；这些都给我的论文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高桥老师的帮助、启发以及严格要求，对我论文的形成，对我思维的发展，乃至对我个人的成长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我的博士论文完成之际，我要深深表达对高桥老师谢意。

其次，我要感谢我在人民大学的导师于同申教授，从 2008 年到 2013 年五年的人大学习生活，于老师作为我的指导老师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习、生活和思想，除了在课堂上向我们传授知识以外，课余时间还会与我讨论学习和学术问题，指导我的研究内容，对那些我把握不准确、思考不清楚的问题给予点拨，让我从数次的理论困扰中获得更新的知识，正是在这点点滴滴的积累中我才集聚了大量的观点和清晰的思路，才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

再次，我还要感谢爱知大学的李春利老师、松岗老师等，李老师十分的亲和，每次在学校与他碰面，他总是很愉快的跟我们打招呼并停下来认真、关切的询问我们的学习是否顺利，生活是否适应，让我们内心感到十分温暖；松岗老师虽然不是我的指导老师，但她对我们这些其他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却十分的

耐心和关爱，在课堂上会和我们每一个学生都亲切交谈，对于我们的一点点小进步她都开心不已，在课余时间和节日里她总是带我们去吃一些日本的特色小吃，和她在一起我们总是欢声笑语，心情愉悦！

最后我还要十分感谢爱知大学的塚田老师、村田老师、铃木老师以及井上老师等，这几位老师在我们初到日本时帮助我们安顿饮食起居，在酷热的天气下全天陪伴我们办理各种手续和证件，带领我们熟悉附近的环境，在我们在日本求学的日子里，生活上遇到困难也总是第一时间给村田和铃木老师打电话，他们总是耐心积极的帮助我们解决，在此对这些帮助过我的老师说声感谢！

还要感谢三年来一直陪伴我的同学们，尤其是在日本共同学习和生活的同学和朋友们，是他们的相伴、鼓励让我的求学路不再孤单、枯燥，人生的道路正是有了这些良师益友们的相伴才能更加快乐和辉煌。

最想感谢的还有我的家人，是父母的辛苦养育才成就了我的今天，将近30年的汗水和心力的付出已让他们两鬓斑白，他们的鼓励让我能够一次次勇敢地面对压力和挫折，支撑着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丧失坚持的信念。父母给予我的支持与关爱是我一生都回报不完的，如今我终于要完成学业，走向社会，我将会更加努力和勤奋，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陈慧慧

2013年5月12日于品园